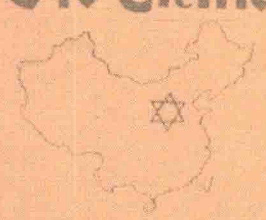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4卷

专家视点

主　编　潘　光
副主编　张健荣　陈心仪　张忆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4卷

专家视点

Sources on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Vol.IV

Academic Perspectives

主 编 潘 光

副主编 张健荣 陈心仪 张忆南



内容提要

本卷汇集了“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课题组专家和国内外同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和文明的影响”“欧洲犹太难民选择上海为避难地的内因外由”“中国报刊对德国纳粹反犹暴行的揭露与谴责”“犹太难民来上海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计划外的逗留:1941年波兰犹太人如何在上海沦为难民”“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社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上海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活动”“《上海犹太纪事报》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厚友情”“来沪犹太难民人数考”“来到中国其他城市的犹太难民”“犹太难民斯特恩一家在哈尔滨的流亡生活”“1945—1947年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归化问题和产业处理探究”“‘梅辛格计划’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为什么犹太难民能够在上海幸存下来”“‘来华犹太人’—永远的热点”等17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四卷,专家视点 /
潘光等主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13-16559-6

Ⅰ.①来… Ⅱ.①潘… Ⅲ.①犹太人—难民—史料—
中国—现代 Ⅳ.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9240号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四卷):专家视点

主　　编:潘　光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郑益慧
印　　制:上海春秋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52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6559-6/K
定　　价:98.00元

谨以此书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1937.7.7）

淞沪会战爆发80周年（1937.8.13）

犹太难民来华避难80周年（1937-1939）

前　言

7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它们对每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的拒绝，等于是扼杀了一个生命。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人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其总人数达到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等城市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中国、上海当作他们的"诺亚方舟"，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当600万犹太人在欧洲被屠杀之时，来华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艰难岁月，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目前，仍然健在的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强烈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做出的一大"善举"和贡献，受到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我记得20多年前，在欧洲

举行了许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但只有一个活动直接与中国有关，那就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研讨会。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并做主题发言，见到了许多当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老人。会后几天，奥地利议会决定设立基金，对纳粹暴政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给予赔偿。现在，每年都有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来到我们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

1994年，上海市和虹口区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园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一千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进入21世纪，上海正式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不仅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各国犹太名流，其他领导人如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来上海时也来该馆访问，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也纷纷来到纪念馆“上课”。

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和“避难地”的代名词。上海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人民互相支持的难忘历史成了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的一个持续发展的热点，关于这个题材的论文、著作、小说、电影、戏剧、展览会不断涌现，因为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有人公然出来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来华犹太难民这个主题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越发突出。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还通过研讨会、展览会、系列讲座、媒体和影视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然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我们对该历史事件的基础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特别是对许多还健在的犹太难民尚未进行采访，对一些第一手资料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深入剖析。

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我担任首席专家，我们的研究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6年多来，我们以争分夺秒的精神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前犹太难民的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及档案资料。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我们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为推出质量更高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5年，我们推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使用的完全是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走进中国和抵达上海、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力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将已收集到的大量与来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报刊、记忆、人物、评析等各方面资料整理出版，为课题最终成果的完成作好准备。正当我们在2015年推出若干“犹太难民与上海”著作之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决定开

始实施“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这样，我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今后的一系列著作都将纳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之内。《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便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共分四卷：第一卷是文件报刊资料；第二卷是记忆资料，包括口述和文字记忆；第三卷是关于犹太难民中杰出人物的资料；第四卷是本课题组专家和其他国内外学者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和评析的汇集。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四卷）：专家视点”主要汇集了我们课题组专家和国内外同行多年来研究来华犹太难民的重要观点和评析，包括：“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和文明的影响”“欧洲犹太难民选择上海为避难地的内因外由”“中国报刊对德国纳粹反犹暴行的揭露与谴责”“犹太难民来上海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计划外的逗留：1941年波兰犹太人如何在上海沦为难民”“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社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上海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活动”“《上海犹太纪事报》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厚友情”“来沪犹太难民人数考”“来到中国其他城市的犹太难民”“犹太难民斯特恩一家在哈尔滨的流亡生活”“1945—1947年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归化问题和产业处理探究”“‘梅辛格计划’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为什么犹太难民能够在上海幸存下来”“‘来华犹太人’——永远的热点”等17篇。

需要指出的是，《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四卷）：专家视点》不可能包括所有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重要论述，也不可能涵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中所有的热点、难点和疑点。有些

热点问题至今仍处于见仁见智的讨论之中，一些难点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有些疑点问题则需要发掘更多的材料加以佐证。可以相信，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还会出现更多的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独到见解和创新视点。

还要指出的是，包括本卷在内的《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四卷只是发表了我们收集的资料中的一小部分，将来我们当然还要把其他所有资料奉献给读者，也许不是通过出书的形式，而是要建立一个资料库或数据库。为此，我们正在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各级档案馆、上海市政协等相关单位进行商议和协调。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历史上那些难忘篇章仍然闪烁着诱人的光彩。包括我们课题组成员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长期以来辛勤工作，收集、整理、研究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记忆中的活资料，就是要为后世保存重要的历史记忆，使子孙后代能记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奋斗。

但愿我们这本书以及我们的工作能够通过宣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歪扶正的感人业绩，以及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观，为努力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潘 光

2016年9月15日 中秋节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目　录

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和文明的影响

潘　光

本文所说的纳粹大屠杀 (Holocaust) 主要指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杀戮。由于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反犹思潮和行动早在公元前就已产生，在中世纪的欧洲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有组织的行动。到了近代，一波接一波的反犹恶浪又在俄国和东欧肆虐，使犹太人“不仅遭到一个无权的民族所遭受的一般的经济和政治压迫，而且还遭到剥夺他们起码的公民权的压迫。”[1]然而，与纳粹大屠杀相比，所有此前的反犹活动都显得相形见绌。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虽已过去了70多年，但仍然是令人难以忘却的：对受害者及其亲属是这样，对那些还活着的加害者也是如此；对为了处理遗留问题而争执不休的政治家和官员们是这样，对试图搞清一些历史之谜的专家学者们更是如此。本文从历史角度对这场大悲剧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深远影响作一探析。

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转移

纳粹的暴行究竟使多少犹太人丧生？对这个问题至今

1_列宁：“告犹太工人书”，《列宁全集》第8卷，第463页。

仍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中。20世纪30年代中，全世界约有1 800万犹太人，其中1 200万生活在欧洲。这就是说，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三分之一、欧洲犹太人的50%！这不仅是犹太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正是这样一场大屠杀，实际上摧毁了欧洲犹太社区，结束了犹太史上的“欧洲中心”时期，使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转移到美国和巴勒斯坦。

在这一劫难中，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犹太社区都在大屠杀中遭受灭顶之灾，有些国家的犹太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如波兰的300万犹太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不复存在，德国境内那时也很难再看到犹太人。早在纳粹开始反犹行动之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便开始逃离欧洲。即使在战时，这股“逃离欧洲”的潮流也没有停止。到了战后，为数不多的犹太幸存者自然也不愿再生活在这块令他们遭受无尽苦难的土地上，纷纷移居欧洲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北美和巴勒斯坦。战前欧洲犹太人占全球犹太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但到战后初期，如不把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算在内，欧洲犹太人数量已不及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0%。因此可以说，由于纳粹大屠杀所引起的犹太人数量剧减和犹太人口大迁移，长达一千多年的犹太民族主体生活在欧洲的时期已经结束，欧洲作为犹太精神文明中心的地位也已不复存在。

当时，北美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已占全球犹太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已上升到70%左右[1]。显然，犹太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和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已逐渐转移到北美和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一转移意味

1_ Stephen W. Massil, *The Jewish Year Book, 1996*, 5756-5757, London, 1996, pp.182-183.

着：就整体而言，犹太民族的发展、犹太文明的复兴、犹太国家的重建和振兴，将越来越取决于北美和巴勒斯坦的事态发展和历史演进。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及此后这个全球唯一犹太人占主体的国家再度崛起，战后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国内及世界犹太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都证明了这一点。

犹太民族认同感的增强和
锡安主义运动新高潮的出现

纳粹大屠杀使犹太人为生存而互相支持、团结拼搏，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促使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再掀高潮，从而为犹太民族国家的重建和犹太文明的复兴进程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当希特勒在欧洲掀起反犹狂潮之时，犹太世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全力救助欧洲受难同胞，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美国犹太社团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早在1933年，一些锡安主义领导人就与纳粹德国经济部达成了秘密协议，商定让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些人可将资产存入德国的一个特别账号，用来为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购进这些商品的巴勒斯坦商人再掏钱补偿德国犹太移民的损失。[1] 就锡安主义运动而言，营救欧洲犹太人的重要目的在于组织他们移居巴勒斯坦。第五次阿利亚[2]期间涌入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激增，这正是在纳粹反犹恶浪中锡安主义运动积极组织救助行动的结果。不过，巴勒斯坦接纳外来移民的容量毕竟有限，特别是在阿犹冲突日趋激化和英国当局不断加强限制的情况下，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到了1939年，“5・17”白皮书[3]发表后，

1_ E. Kedourie and S. Hain, *Zionism and Arabism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London, 1982, p.89.

2_“阿利亚”指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故地的运动。

3_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巴勒斯坦政策白皮书，其中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实施严格限制。

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不得不转而采取“非法”手段将欧洲犹太难民偷运至巴勒斯坦。

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不同，世界各地犹太社团和犹太组织展开营救行动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帮助犹太人离开纳粹欧洲去任何愿接纳他们的地方，而并不是一定要去巴勒斯坦。他们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建立临时办事处，以提供资助的方式帮助犹太难民获得离境许可证，再获得某国的入境或过境签证。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建立了许多地下通道，将一批批犹太难民转移出纳粹占领区。对于在一些国家滞留或已发现暂时栖身处的犹太难民，他们也千方百计给予帮助，使之能渡过战时的最困难时期。如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后，一大批波兰犹太人逃到了立陶宛。1940年，他们想法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但每人必须付出约200美元才能通过苏联去日本。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等组织立即全力以赴，募集了一笔钱支持他们，使他们得以在德国入侵苏联前陆续离开。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在里斯本的办事处成了战时救助欧洲犹太人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甚至在遥远的上海也设立了办事处，以救助在那里避难的近3万名犹太难民。

遭受劫难的欧洲犹太人也并非只是坐等外援或束手待毙，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纳粹的暴行。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里，突如其来的反犹狂潮使他们不知所措，最普遍的反抗方式只有两种：逃离和自杀。到“碎玻璃之夜”后反犹狂潮席卷纳粹统治区，犹太人已忍无可忍，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犹太人参加盟军和游击队，走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线。据统计，有

168.5万犹太人参加了美、苏、英、波、法等国军队及各地的游击队，如按希特勒的犹太人定义（三代中有一个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达300万[1]。同时，还有许多犹太人积极参加了地下斗争，奋战在秘密战场上，为盟军收集情报，建立秘密交通线，破坏德军设施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处在隔离区和集中营内的犹太人虽然缺吃少穿，身体虚弱，手无寸铁，却依然宁死不屈，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和暴动，打击了纳粹及其帮凶的气焰，在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仅在东欧，就有20个隔离区和5个集中营爆发了中等以上规模的起义和暴动[2]。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华沙犹太隔离区的大起义。华沙这几万犹太平民居然能抵抗武器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这么长时间，并且使之遭受了上千人的伤亡，实在是又一个马萨达式奇迹。

纳粹大屠杀从肉体上消灭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却从精神上促成了犹太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当所有的犹太人都为着民族的生存而殊死拼搏之时，阿什肯那兹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正统派、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隔阂，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歧见，俄国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使欧洲犹太人不再是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法国人、苏联人，等等，而仅仅是犹太人，从而使许多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德国犹裔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24岁时就改宗基督教。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研制出化学武器，他被任命为重要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但纳粹上台后照样受到迫害而被迫辞职。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一

1_ Issac Kowalski, *Anthology on Jewish Armed Resistance* 1939–1945, New York, 1984, p.15.

2_ Martin Gilbert, *Atla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1993, p.102.

个犹太人。”[1]德国著名犹裔画家马克斯·利伯曼一直反对锡安主义，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德国人，为此他曾与希伯来语大师毕阿利克争论过。纳粹上台后，他也遭受迫害，思想开始转变。他在给毕阿利克的信中写道：“在这个艰难的时代，由于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利，因此我和我的犹太教友团结一致的感情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你也许还记得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对话。当时我力图解释我为什么要与锡安主义保持距离。今天我的想法不同了。我好不容易从一生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了。”[2]

阿巴·埃班的一段话最能反映经历纳粹大屠杀劫难的欧洲犹太人的心情：“希特勒把他们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自己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的600万同胞才被残酷地杀害了。虽然他们也知道有些国家中的犹太人已经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们经受的痛苦太多，再也不愿冒风险了。巴勒斯坦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太疲劳了，不能在有一天也许又有人会喊‘犹太人滚出去’的地方开始新生活。至于巴勒斯坦的生活是否有保障，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3]这不仅是欧洲犹太人的想法，而且已为全球犹太人所认同。到1945年，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聚集到了犹太民族主义和锡安主义的大旗下。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纳粹大屠杀造成的这一后果。

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纳粹大屠杀震撼了全人类，使全球人民同情犹太人，支持锡安主义的潮流急剧高涨，从而为以色列建国及犹太民族和文明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

1_迈克尔·A.迈耶：“反犹主义和犹太认同意识”，载于《民族译丛》1990年第3期。

2_同上。

3_[以] 阿巴·埃班著：《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414—415页。

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屠杀，各国政府起初只是在口头上加以谴责，并不愿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去救助犹太人。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专门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有32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会上每个发言人都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示同情，但除多米尼加外，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1939年，英国发表的“5·17”白皮书实际上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巴勒斯坦的大门。拥有庞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刘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1]。

为什么各国政府对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如此冷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仍处于大萧条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因而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一些国家内部的反犹势力更是特别反对犹太难民入境；其二，面临咄咄逼人的法西斯战争机器，西方大国奉行一种绥靖政策，因而也不希望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与德国搞僵关系；其三，在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下，一些未被德国侵占的小国（战争爆发后成为中立国）如瑞士、瑞典等也不想在犹太人问题上招惹是非，以免得罪德国，瑞士虽因大批犹太人将钱存入其银行而获利，却不愿接受犹太难民；其四，一些亚、非、拉美国家由于自身经济困难而无力安置犹太难民，如多米尼加虽表示愿接收犹太难民，但无经济援助却难以安置他们。

尽管各国政府的态度令人失望，但各国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不少中下级官员都对犹太难民的处境

1_A. Grobman & D. Landes, *Genocide,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 Los Angeles, 1983, pp.298—299.

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国际红十字会及各国的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特别是在战争状态下，由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仍能进入交战双方控制的地区，因而他们在营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方面往往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基督教会历来对犹太人抱有宗教偏见，但当纳粹反犹暴行愈演愈烈之时，许多主教和教士公开站出来声援犹太人。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教堂往往是隐藏和保护犹太人的有利场所。战争爆发后，活跃在各地的游击队也都积极参与了营救犹太人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想方设法救助犹太人。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是最早通过发放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使用他颁发的签证逃离纳粹占领地区的犹太难民有数千人[1]。日本驻立陶宛考那斯的领事杉原千亩（Chinue Sugihara），在紧要关头给近2 000名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难民签发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纳粹的捕杀。瑞典外交官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以中立国代表的身份来到匈牙利，以颁发外交护照等方式救出了上万名匈牙利犹太人。一些德国人也暗中支持和帮助犹太人，描写德国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现在已是家喻户晓。

不仅在欧洲，在北美、东亚、大洋洲、拉丁美洲甚至南非等地，正义之士也都纷纷挺身而出，声援和救助犹太人。如在中国，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向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强烈谴责希特勒的反犹暴行。上海这座同样也遭到战火摧毁的东方大都市，从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共接纳了欧洲犹

1_参见蒋作斌主编：《国际义人何凤山》，岳麓书社2007年版。

太难民近3万人，除去部分人后又离开上海去第三国，仍有2.5万人一直留在上海直至战争结束[1]。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 指出，当时上海一市接收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收难民数的总和还多[2]。拉丁美洲小国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等也都接纳了相当数量的犹太难民。

战后，以色列议会曾通过一条法令，规定以色列政府应代表犹太人民感谢所有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或非犹太家庭，并授予他们勋章和奖金。截至1990年5月1日，总共有8 611人因此项法令而接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勋章和奖金[3]。虽然他们可能只是当年救助过犹太人的成千上万非犹太人中的一小部分，但已足以显示当时非犹太世界对纳粹暴行的反抗和对犹太民族的支援是多么强烈。

随着广大民众声援犹太人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当纳粹“最后解决”的真相于1942年通过瑞士传送到西方之时，各大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一些领导人在更加强烈地谴责纳粹暴行的同时，也感觉到应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然而，一些早几年可以采取的行动在战争状态下已难以做到。1943年初，各国在百慕大再次召开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会议，但会上提出的许多措施均无法落实。1944年，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提出可以停止将犹太人送往死亡营，交换条件是要给德国1万辆卡车。锡安主义领导人试图促成这一交换计划，然而盟国领导人认为在战时给敌方这么多卡车是不可能的。此后，犹太领导人又提出轰炸奥斯维辛的建议，但也被盟军当局以“技术原因”而拒

1_参见潘光主编:《永恒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年版。

2_A.Grobman & D.Landes, *Genocide,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 pp. 298—299.

3_前引Martin Gilbert, *Atlas of Jewish History*, p.104.

绝。到战争的最后阶段，除了加速进军外，已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拯救死亡营中的犹太人。1945年春，随着盟军解放一个又一个集中营，纳粹大屠杀触目惊心的后果终于暴露在全人类面前，使世界为之震惊，全球范围同情犹太人进而支持锡安主义的潮流迅速高涨，形成难以阻挡之势。

在此前后，在这样一种同情犹太人的大气候中，各大国政府对犹太人问题的政策均发生质的变化，即从一般同情犹太民族转变为支持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10月公开宣称："我知道犹太人曾经在多么长的时间内多么热切地争取并祈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我相信美国人民支持这个目的，如果我再次当选，我将帮助实现这一目的。"[1]同时，共和党的竞选政纲也明确提出："为了给数以百万计的被暴政逐出家门受苦受难的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避难之处，我们要求巴勒斯坦向他们开放，实行不受限制的移民和拥有土地，以便把巴勒斯坦建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2]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一直谴责锡安主义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从1928年起在国内禁止锡安主义的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于1943年访问巴勒斯坦，与犹太代办处和锡安主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战争后期，苏联宣传机器猛烈抨击纳粹的屠犹暴行，而对锡安主义的批评已不多见。1947年5月14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言。他用了大量时间来追述犹太人民遭受的"非常的不幸和苦难"，并且正式表态支持"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3]。这是苏联第一次明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苏联态度的转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

1_《纽约时报》，1944年10月13日。

2_George Kirk,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ar*, London, 1954, p.318.

3_国际关系研究所：《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3—60页。

源，而纳粹大屠杀造成的感情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突出表现在两点上：其一，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在二战中死于纳粹屠刀之下，因而苏联人民对同样遭受屠杀的犹太人普遍表示同情；其二，苏联犹太人经过纳粹大屠杀劫难后，民族认同意识大大加强，普遍支持锡安主义。显然，苏联领导人在决定调整政策时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总而言之，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逐渐消散之时，世界各国都难以否定这样一个要求：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找到一块安身之地，为饱受苦难的犹太人建立一个他们能在其中安全生存的家园。如果没有一个国家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也许就是唯一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纳粹本想要将犹太人逐出世界民族之林，但结果却使人类社会认识到：必须尽快使犹太民族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

为犹太民族的自我教育留下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大屠杀在犹太民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和烙印，对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留下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1945年5月，当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巴勒斯坦、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时，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升起了镶有黑边的旗帜，以悼念在纳粹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随着有关纳粹大屠杀的细节和内幕越来越多地被披露，每个犹太家庭都发现有亲人或朋友在这场大劫难中丧生。这成千上万的人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被杀害，可以想象在他们同胞的灵魂深处留下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创伤。以色列政府于

1951年通过法令确定犹太历尼散月（大约在公历4月）27日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现在每到这一天，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点燃蜡烛，以纪念1933年至1945年期间惨遭纳粹杀害的600万兄弟姐妹。纳粹大屠杀期间许多其他悲剧性事件发生的日子，现在也成了缅怀死难者的纪念日。每年11月9日，人们都要纪念1938年那个“碎玻璃之夜”的受害者，许多人在那天会到德国犹太人的墓前献上一束花。到了4月19日及其后的几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举行仪式纪念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的勇士们。1970年，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在华沙犹太区起义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表示忏悔。1993年纪念起义50周年之时，在华沙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时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主持了“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HMM）的开馆仪式，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它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建立的。为了不忘纳粹大屠杀的悲剧，德国政府决定将1月27日定为“纳粹统治受害者悼念日”。正是在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0/7号决议，决定将1月27日定为一年一度的“缅怀纳粹大屠杀遇难者国际纪念日”（International Day of Commemoration in Memory of Holocaust Victims）。

在纪念受害者的同时，有正义感的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加害者讨还血债。70多年来，许多犹太志愿者，特别是那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支持他们的各国友人为收集纳粹罪证，追捕纳粹战犯而不遗余力，取得了巨大成绩。仅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这一个组织就采访整理出几万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和目睹者提供的证词，并追寻到了数千名纳粹

战犯的踪迹。1960年，以色列派出特遣队到阿根廷抓获臭名昭著的屠犹凶手阿道夫·艾希曼，将其押回以色列公审后判处死刑。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在继续这一报仇雪恨的事业。对他们来说，纳粹大屠杀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九泉之下的死难者讨回公道。

纳粹大屠杀这场浩劫也在犹太文化思想的发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70多年来，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纳粹大屠杀的小说、电影、戏剧，其中大多数虽由犹太作家、艺术家所创作，却不但在犹太人中受到欢迎，也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陌生。如《华沙一条街》《马门医生》《苦海余生》《纳粹大屠杀》《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黑皮书》《朗读者》等作品，都震撼了具有良知的人们的心灵，说明这个悲惨事件已成为犹太文学艺术乃至世界文学艺术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还有人认为，纳粹大屠杀也对犹太人的思想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其在长期以来的反犹氛围中形成的“被包围感”和“受迫害感”大大加强，对自身安全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常会不由自主地采取主动出击的行动去消除对自身的威胁。许多以“保卫犹太人”为宗旨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及其过激的行动，一些犹太激进分子有时采取恐怖手段打击对手，以至今日以色列安全政策中的“安全区”概念和国防战略中的“先发制人”原则，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遭受纳粹大屠杀摧残的犹太人做出一些“矫枉过正”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纳粹大屠杀产生的最能体现“坏事变好事”的后果就



被纳粹党徒砸毁的犹太人商店

是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永存的反面教材。在今日的以色列，已经形成了以耶路撒冷“耶德·瓦谢姆”(Yad Vashem，希伯来语，意为“纪念与记忆”）纳粹大屠杀历史纪念馆为核心的全国纳粹大屠杀教育网络；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犹太社团中，也形成了同样的网络。在较大的犹太社区，特别是在大中城市的犹太社区，人们都可以找到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或教育中心，即使在最小的犹太社区，你也可在犹太会堂或社区中心发现一个纳粹大屠杀教育室。每个犹太孩子一懂事就会被带到这里接受教育。每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人们都要汇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这里还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探讨纳粹大屠杀产生的原因，如何从这一大悲剧中吸取历史教训，以及防止悲剧重演的途径。实际上，纳粹大屠杀教育已成为现代犹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犹太民族存在，纳粹大屠杀就不会被忘记，纳粹大屠杀教育就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纳粹大屠杀本身，而在于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纳粹大屠杀悲剧过后的两年半，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国家。又过了半年，本-古瑞安于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大声宣布：“特此宣告在以色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

想要“消灭”犹太民族的希特勒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重建和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民族的大劫难中往往孕育着民族的大复兴，这大概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结　论

与纳粹大屠杀相比，所有此前的反犹活动都显得相形见绌。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首先，纳粹大屠杀摧毁了欧洲犹太社区，结束了犹太史上的"欧洲中心"时期。其次，纳粹大屠杀大大增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促使锡安主义再掀高潮，从而为犹太民族国家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次，纳粹大屠杀震撼了全人类，使全球人民同情犹太人、支持锡安主义的潮流急剧高涨，从而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最后，纳粹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留下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本文作者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本书主编，本文原发表于《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第三辑《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此次刊发作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欧洲犹太难民选择上海为避难地的内因外由

周国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纳粹疯狂反犹，造成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当时上海接纳的犹太难民超过3万人，除数千人去了他国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约有2.5万名犹太难民避难上海，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数还多[1]。为什么当时欧洲犹太难民不去别的地方而选择上海作为避难地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兴趣。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需要从当时上海的特殊地位、国际环境以及历史和文化角度进行多方位的探讨。

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的国际背景

当时，面对大批犹太人的出逃，世界各国所做出的反应却十分令人费解。许多国家除了口头上的同情之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援救行动。随着犹太难民人数的增加，不少国家甚至逐渐采取了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的政策，就连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毫无例外。

1_A.Grobman and D.Landes, ed., *Genocide,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 Los Angeles, 1983, p.298.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场空前的危机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使各国政府穷于应付国内问题，而无暇他顾。当时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倾向，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一些国家面对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和大批犹太难民的外逃，依然无动于衷，反而把犹太难民看作是可能增添麻烦的包袱。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会议，与会国对犹太难民都表示同情，但没有采取救助犹太难民的具体措施，甚至在对犹太难民"部分开放"这个问题上也未达成一致意见。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只是"文明政府用以掩盖它们无能为力的门面"[1]。此外，对纳粹淫威和战争威胁的一种恐惧心理，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对犹太人的态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战争威胁与日俱增。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为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竭力推行绥靖政策，对侵略者处处妥协退让。至于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如瑞典、瑞士等，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更是小心谨慎，唯恐得罪德、意、日。由于希特勒已经把反犹看作是德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以致任何偏袒犹太人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德国不友好的表示，这就使许多中立国家都不敢碰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上面谈到的只是两个全球性的原因，而对各国来讲，又有不同的情况。下面试对与犹太难民问题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分别进行剖析。

首先，看一看英、法等西欧国家及其属地对犹太难民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英、法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特别沉重。据统计，在那场危机中，英、法工业生产指数以危

1_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1979, p.167.

机前的最高点和危机中的最低点比较，分别下降了23%和36.2%。英国失业情况最严重，到1932年已接近300万人。[1]西欧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国内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对此，西方国家竭力向殖民地附属国转嫁危机，从而将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推入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重振国内经济成为西欧各国政府及其属地的当务之急。为此，各国政府普遍奉行紧缩通货、节约开支、平衡预算的方针。因此，他们不愿意因接受犹太难民而背上新的包袱，对犹太难民都采取拒之门外的政策。英、法等国属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南非联邦原来对欧洲人移入没有任何限制，但从1936年起，转而拒绝犹太人移入。[2]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也对犹太移民实行了严格控制。众所周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是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所赞同的。但在1939年5月，英政府却发表白皮书规定：在以后五年中，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人数不得超过7.5万人；五年后，将不再允许犹太人移入，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移民移入。[3]同时，白皮书对非法移民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英国之所以这样做绝非偶然。众所周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英国支持锡安主义的政策一直不满，反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英国政府为了联合阿拉伯人对付德意对中东的进逼，不得不全面调整巴勒斯坦政策。

其次，也来分析一下美国对犹太难民的态度。美国当时已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理应多接收一些犹太难民，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美国对犹太难民进入也奉行严格的限制政策。美国对犹太难民实行这样的政策，与当时孤立主义在美国泛滥，并直接影响其对外政策密切相

1_沈永兴等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2_前引A.Grobman and D.Landes编书，第298页。

3_J.C.Hurewr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Princeton, 1956, p.225.

关。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对外应实行一种“不干涉”的自我保护政策，以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和国际冲突中去，强调外交首先要服从国内需要。在这一孤立主义外交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当局当然不愿意背上犹太难民这一包袱，更不愿因此而与希特勒发生冲突。另外，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也对政府采取的限制犹太难民入境的政策产生了一些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反犹活动非常猖獗。当时，一些美国人把国内经济衰退的责任推在犹太人身上，理由是犹太人在金融事业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声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发明”的制度，大肆渲染犹太人将对美国社会产生危险。一些美国人受此煽动，掀起了反犹鼓噪。南方各州的一些白人政治家要求限制迁入和详细审查所有来叩新大陆之门的犹太移民。有些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反犹暴行。这种反犹主义思潮同样也反映到美国的政坛上。当时，在美国政界替犹太难民说话成了一件相当冒险的事，为欧洲犹太人的利益呼吁常被那些具有反犹情绪的人视为“不爱国”的行为。

最后要谈一谈欧洲中立国家及部分亚非拉国家对犹太难民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后期，欧洲中立国家对犹太难民的态度要比英、法等国好一些。它们一般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较为同情，并能够主动提供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但对难民问题的解决依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它们虽然接受了一些犹太难民，但数量十分有限。据统计，从1933年至1945年，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国所接受的难民，总共也不过几万人而已。中立国家之所以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不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既是由于战前和战时国内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大量外来移民，也是由于怕得罪德、意。实际上，欧洲和世界

局势的复杂性及中立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国家的行动。它们只能在处处考虑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帮助犹太难民，这种帮助也只能在暗中进行。因此，这些帮助必然是有限的。人们也曾提出了将犹太难民集体移居到一些亚非拉国家去的想法，如马达加斯加、肯尼亚、阿根廷、菲律宾等。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一是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如要为犹太难民建立新的生活区需要大笔经费，而这笔资金是很难筹集的；二是那里生活水平低，民间习俗、文化环境都与犹太宗教、民族特性格格不入，因此许多犹太难民并不愿意去。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面临绝境的犹太难民想到了中国，特别是上海。

历史上来华犹太人的安居乐业

处在困境中的犹太人想到了中国和上海，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一直友好相处。犹太人到中国至少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他们在中华大地上一直受到中国人的善待，开封犹太人甚至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中国，上海则成了犹太人在中国的最大聚居地。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对中国怀有好感。

犹太人至少在唐代就已进入中国，宋元时期犹太人来华达到高潮，当时仅开封的犹太人就有五千之多。开封犹太人被允许自由地信奉犹太教，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能的。开封犹太人拥有自己的犹太会堂，他们严格按照犹太教教规行礼拜，礼拜时面朝圣地耶路撒冷。在政治、文化方

面，开封犹太人享受与汉人平等的权利。犹太人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与汉人平等竞争，不少人考取秀才、甚至成为进士。犹太人还可参与政治生活，担任重要官职。在经济领域，犹太人也未受到排挤和任何歧视，许多人靠经商致富。中国人与犹太人的友好同样也反映在社会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婚姻关系上。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开封犹太人后裔的55户中，男性都娶汉族女性，女性都嫁汉族男性。[1]这反映了历史上中犹人民的通婚已习以为常。开封的犹太人也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他们对中国的儒学非常崇拜，认为自己的“一赐乐业教”与儒教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尊天祟祖，重视伦理道德。开封犹太人非常尊敬孔子，每年春秋两季都去文庙参与祭孔典礼。他们也按照汉人的习惯祭祖。在逐渐儒化的过程中，开封犹太人也开始采用儒家婚娶丧葬之礼，改用中国姓氏。经过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安居乐业的开封犹太人终于逐步融合于中华民族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当开封犹太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过着一种安宁、愉快的生活之时，欧洲的犹太人却受到排挤、迫害甚至屠杀，这与中国人对犹太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友好情谊形成了鲜明对照。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中国，大都聚居在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1840年后，上海是犹太人来华的主要聚居地，先是英籍塞法迪犹太人前来上海经商办实业，后来又有大批俄国犹太人涌入上海谋生，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形成了一个5 000多人的犹太社团。他们拥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养老院、商会、政治团体、报刊乃至公墓。上海犹太社团兴旺发展的时候，欧洲再次出现反犹恶浪，这就又一次向世界

1_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17页。

各地的犹太人提供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诬陷、迫害、驱逐、屠杀，另一边是友好相处、安居乐业、发财致富。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乃至远东的国际大都市，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侨民，这也为欧洲犹太难民提供了合适的谋生条件和生活环境。正因为此，在20世纪30年代又一场空前灾难降临之时，犹太人马上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大都市上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古至今有这么多的犹太人在中国定居，但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欧洲基督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当然，一些白俄、日本法西斯分子、纳粹党徒和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曾在上海、哈尔滨等地搞过反犹活动，但那不是在中国土地上自发产生的，被称为“输入的”或“强加”的反犹动作，也没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其二，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历经磨难。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一些地方的反华行动与在欧洲蔓延多个世纪的反犹恶行极其相似。相同的经历和磨难使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1920年4月24日，中华民国的创建人孙中山先生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埃兹拉的信中写道：“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其三，中犹两大文明之间具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中犹文化的可融通性

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屡遭排斥迫害，而在中国则受到如此友好的对待呢？这绝非是欧洲人比中国更加排外，而是因为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与犹太文化有许多碰撞冲突的地方，而中国文化却与犹太文化有许多相互融通之处。从文化上对这个问题做深层次分析，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尤其是上海成为犹太难民避难地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文化，但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能始终维护本文化主体精神而一脉相承的，则只有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犹太文化从萌芽至今已逾4 000年，虽历经盛衰，与各种文化碰撞、冲突、交汇、融合，但其主体犹太教却一以贯之，始终是维系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纽带。同样，中华文化虽屡遭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主体儒教却保留着最初的特征。而在这同时，其他许多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却失去了原有的特征，如历史悠久的古罗马文化和古埃及文化就先后被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融合。当然，这只是中犹两大文化最根本的共同点。如具体研究中犹两文化之内涵，会发现它们还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共同之处，也正是反犹主义难以在中国人中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封犹太人在1489年树立的石碑上写道："我们的宗教与儒家学说只有很小的区别。两者都在言行上尊重天道，敬重祖先，忠于君王，孝敬父母，善待妻室。两者都重天伦，敬官长，广交友。"(原文为"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

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1]

笔者以为，中犹文化的可融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重视家庭伦理，是中犹两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中国人和犹太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家庭伦理。在中国，重视家庭的观念早在奴隶社会后期就已萌生。秦汉时期这种道德规范更加系统化。《孝经》开宗明义讲：“孝为百行之首”，把孝看成是一切德行之根本。“三纲五常”中的“三纲”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就是家长统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孝”和“顺”。这种家庭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长期沿袭，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同样，犹太人也自古就重视家庭伦理，历来有孝敬父母的传统。“摩西十戒”把孝敬父母当作一条道德标准加以确立，希伯来律法则把敬重父母进一步规范化，这种道德规范千百年来一直沿袭，被犹太家庭奉为经典。维持家庭和睦，注重长子作用，也是中犹家庭伦理中一个重要的相通之处。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家庭意识一般都很强。无论是在中国人还是在犹太人中间，三世同堂和四世同堂的情况都十分普遍。在中犹家庭观念中，长子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犹太人历来注重长子的作用，长子的权利在圣经中就被加以肯定。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长幼的区别也很突出。长子的地位仅次于父亲，所以封建伦理“孝悌”并提，就是要人们树立尊敬父兄的道德风尚。

(2) 重视教育的作用，是中犹文化价值观接近的又一表现。犹太人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千百年来，不管处境如何恶劣，他们的重教传统始终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注重教育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

1_陈垣和叶瀚:《开封一赐乐叶教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页。

在《劝学》中就系统地阐发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后，历代政府注重教育一直兴盛不衰。当然，除了中犹两民族外，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很重视教育。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是，中犹两民族的教育价值观中还有许多具体的相同之处。下面试举两例。一是重视知识教育。犹太人十分重视实际知识教育。他们有一句名言"知识是最可靠的财富"。在犹太家庭中，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可以不惜倾家荡产。犹太人中的识字率不论古今都一直很高，即使在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时代，犹太人中文盲也很少。在中国，知识也一向被当作万能的法宝，古人云"人有知学，则有力量""书乃随身之宝""家有万金，不如藏书万卷"，都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道理。二是重视德育。犹太教育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旧约：利未记》号召人们"要爱人如己"[1]。这种以善为根本的宗教观念，成为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希伯来儿童从小就接受这种德育教育。中国重视德育的传统也由来已久。孔丘可谓是中国古时推行德教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提出的德育内容，可以用"仁""德"两个字来概括。孔丘的这种思想在我国的影响很大，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基本上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伦理教育。

(3) 善于经商理财，是中犹两民族经济文化的相同之处。犹太人是有名的理财家，他们的经商才能早在欧洲中世纪就已很有影响，当时"犹太人"和"商人"几乎成了同义词。同样，中国人的经商才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很大，海外华侨、华人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在东南亚，华侨、华人就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在中国国内，温州人、上海人和潮州人也都曾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这些共性，自然为欧洲犹太难

1_《旧约：利未记》第19、10页。

民来上海避难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

战时上海所处的特殊环境

上海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也是犹太难民得以进入上海，并能在上海幸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上海自开埠之后，一直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城市，特别是对欧美人来说，进出上海一直十分方便。1843年后，近一个世纪，上海的外国租界更是"国中之国"，任何外来的移民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许许多多的难民和政治流亡者也把上海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处。如日本占领朝鲜后，许多朝鲜流亡者就避难上海，并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与外部的联系只能通过海路维持。当时，中国政府机构已撤出上海，无法对上海地区继续行使其职权。日本占领军当局一度还来不及在上海扶植傀儡政权，也无法对上海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对租界更难以插手。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在一段时间里处于"大门洞开"的特殊开放状态，以至外国人从水路进入上海根本无须办理通常所需的一切手续。特别是1939年9月前，外国人进入上海不但不需要签证，而且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预先找到工作和出具警方提供的品德证明，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大都市。[1]这对于逃离纳粹控制区的欧洲犹太难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犯人"，往往没有签证甚至没有护照，以"非法途径"逃离欧洲，而且几乎都身无分文。据1938年12月抵沪的一批犹太难民称"我们187人中，有不少

1_笔者访问旧上海海关关员戚维新先生谈话记录。

本为当地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1]。在当时的情况下，像这样的难民难以进入需办理正常入境手续的国家，更不要说进入严格控制外国人入境的国家了。只有上海，也只有在当时特殊条件下的上海，才为这些欧洲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综上所述，希特勒的疯狂反犹，“文明世界”对犹太难民关上大门，历史上来华犹太人的安居乐业，中犹两大古老文明的众多相同之处，以及上海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开放状态，使上海这个东方的“冒险家乐园”成了逃脱纳粹屠杀狂潮亡命东来的成千上万犹太难民的避难所，从而在上海的历史上，也在中犹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上写下了辛酸而又令人难忘的一页。

（本文作者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原发表于《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第二辑《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 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此次刊发作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1 《申报》，1938年12月5日。

中国报刊对德国纳粹反犹暴行的揭露与谴责

李长林

德国纳粹头目1933年初取得政权之后，随即迫不及待地在国内掀起了反对犹太人的活动。到1939年以后，希特勒的统治已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行暴力统治后，又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国家，德国占领当局强迫被占领国接受纳粹的反犹政策，在这些地区残酷地迫害、屠杀犹太人，一些傀儡政府与德国纳粹头目狼狈为奸，充当反犹帮凶。面对德国纳粹掀起的反犹恶浪，深受法西斯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同情苦难的犹太人民，声援他们的反抗斗争，不断地揭露、谴责纳粹的反犹暴行。

关于这些情况，中国学者在有关论著中，论述非常简略。美国学者柯伟林在其所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则完全忽略了有关情况，做出不符合实际的论断，如认为："中国人没有几个反对德国的纳粹民族主义政策。"[1]在中国，"德国的反犹主义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人注意。"[2]"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中国人像国际社会那样反对纳粹的种族政

1_［美］柯伟林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第191、193页。

2_同上。

策和种族学说。”[1]柯氏这些论述不符合实际，事实是中国舆论界和政界部分人士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持谴责态度。柯氏忽略了有关事实，书中的有关论述所引用的材料仅以对反犹主义没有异议或加以赞赏的为限。[2]而对持另种立场即谴责纳粹的反犹主义的言论毫无引用，柯氏的有关论述所根据的是一面之词，因此他的论述是不确切的。我们对柯氏的有关论述，做出如此的评价，有下列大量事实为据。

中国人民对德国纳粹反犹暴行的揭露与谴责，就见诸报刊上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三种形式：报道信息、发表评论和撰写专文。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和文章一一列举，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加以介绍和评析。

报道信息

报道反犹信息的传媒有《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其中尤以《新华日报》数量最多，从1938年到1944年共130多条，1938年最多，共70多条。这些报道包括纳粹进行的反犹暴行（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数字），也涉及一些国家各界人士对反犹暴行的抗议活动和犹太人民的反抗活动以及犹太难民来中国上海的情况。这些报道反映了反犹暴行的不间断性和变本加厉的残酷性以及地区的广泛性。虽然主要是报道德国纳粹的暴行，但也涉及意大利、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情况。

这些报道既有简短的消息，也有长篇的纪实报告，其中长篇报告尤其引人注目，共有四篇。第一篇是威廉·都德作、蓝钢节译的《德国反犹目击记》，载于《新华日报》1938年1月14日第四版。此文作者系美国驻德大使，原载于美国《民族》月刊1938年8月号。1938年10月10日出版的

1_［美］柯伟林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第191、193页。

2_如《外交评论》对《纽伦堡法》的反映（见《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91页）；再如《前途》仿效纳粹种族排外政策的号召：（见《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92页）。



本埠猶太僑民
奮起助英作戰
願組織一猶太軍隊
兩黨領袖慷慨陳詞

生而受苦
不若戰死

如有機會
甚願從戎

青年俄人
紛紛報名

洋米運滬無阻
切麵業請根據廠盤發粉

旅館傢佔離損
罰五千元

南京路虹廟東

百貨商場
大減價
大贈品

汗衫
游泳衣

福利公司

半價賤賣

花旗銀行

當令夏貨
不計成本

《申报》报道犹太难民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第二十号上，以《犹太人在德国》为题也转载了此文（译文稍有不同）。《新华日报》在发表此文时，加有按语说“这不加渲染的记录，告诉了我们法西斯的恐怖，实在是人类的污点”。第二篇是《犹太人民代表大会告全世界犹太人书》，发表在《新华日报》1942年6月1日第四版，这篇文告是1942年5月24日在苏联召开的第二次犹太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布的。文告声讨了德国反犹的种种罪行，号召犹太人民拿起武器积极开展打击德国纳粹的军事斗争。第三篇是《滔天罪行，纳粹绝灭犹太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情报司发表声明》（《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4日、25日连载），这份声明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纳粹的反犹暴行。第四篇是威廉·楚克曼写的《华沙犹太人暴动记》，发表于《新华日报》1943年7月30日第三版（节译自1943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新群众杂志》）。此文记录了1943年4月19日到5月华沙犹太人进行反抗德国纳粹的武装起义。以上四篇文献对研究纳粹反犹暴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在消息报道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解放日报》1941年10月间关于东方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支持与发动东方各民族广泛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主持了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会上犹太著名科学家爱泼斯坦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成员。大会召开前，记者专访了犹太民族与会代表叶华·桑德帕尔格女士，叶华原是德籍犹太人，1935年8月加入苏联国籍，并与中国著名诗人萧三结婚，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1日第三版刊登了叶华女士的谈话。在谈话中她历数纳粹反犹的种种暴行，呼吁面对蔓延于大半个欧洲的反犹浊流，犹太民族要团结起

来，彻底消灭法西斯，首先要消灭德国法西斯。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叶华当选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发表评论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碎玻璃之夜”德国纳粹袭击犹太人暴行发生后，《新华日报》迅速作出反应，11月13日第三版发表了题为《德国法西斯又掀起反犹运动》的短评。短评写道：“我们同情那些法西斯虐杀之下的牺牲者，同时也希望一切有正义感的人赶快一致联合起来，消灭暴虐的刽子手。”

紧接着，《新华日报》又在11月14日第一版上发表题为《德国反犹运动》的社论，社论指出反对犹太人本是德国法西斯政纲的一部分，驻法大使馆秘书被杀只是借口而已。反犹运动有其深刻的根源——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企图以反对犹太人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社论认为德国纳粹疯狂的排犹只能加强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它的反抗，从而加速其崩溃。《新华日报》在发表这篇社论的那一版上还刊登有刊头语——希特勒把德国弄成世界反动的宪兵，抢夺领土、发动反犹运动，这种政策不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德国大资本家的阶级利益与利润。

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主办的《中央月刊》第一卷第十六期（1938年11月24日出版）发表有履冰写的《德国之反犹之反响》一文，该文对“碎玻璃之夜”德国纳粹袭击犹太人的暴行做了评论，在列举当时纳粹颁布的反犹法令之后指出：反犹乃是德国国社党的既定国策之一，在德国“种种反犹运动日趋恶劣而普遍”。文章中用相当篇幅记述了

英国舆论界和美国政要对纳粹反犹暴行的抗议。

纳粹反犹运动也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人士的关注，1939年2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在中国西南地区制定犹太人寄居区的提议中说："最近欧洲因法西斯势力之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勒并奥后，屡戮奥犹变本加厉。最近更籍口驻法大使秘书为犹太人杀害，发动大规模之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亘古未闻。"孙科在提议中又说："就国策言，联合援助弱小民族为总理遗教所指示。"[1]

撰写专文

早在1933年德国纳粹刚刚掀起反犹活动之时，中国一些知名人士就对反犹暴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宋庆龄在1933年5月13日率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代表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就德国当局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提交了抗议书[2]。5月14日，宋庆龄又发表题为《抗议希特勒暴行、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的迫害》的文章，指出："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一个征象"，"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和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反犹暴行予以坚决抗议。[3]抗议书提交后，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机关报《以色列信使报》于6月2日以《文明世界反对希特勒主义》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刊登了埃兹拉主编写给宋庆龄的感谢信，埃兹拉在信中感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犹太人的有

1_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

2_这封抗议书刊于《申报》，1933年5月14日。

3_《抗议希特勒暴行·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的迫害》，辑入《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3页。



《以色列信使报》报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议纳粹反犹暴行

力声援,并希望这一抗议行动能唤醒德国"冬眠的灵魂"。

著名社会活动家邹韬奋旅居欧洲期间,根据自己的目睹与耳闻,1934年6月5日写有《种族的成见和梦想》一文,文中揭露了纳粹排犹的谬论。他首先引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把犹太人列为破坏者应该加以排除的谬论,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所谓保全日耳曼优秀血统的种族主义偏见。邹韬奋接着揭露了根据种族主义偏见在德国出现的怪事,为了贯彻禁止德国人与有色人种或犹太人结婚的法令,"现在德国的公务员,如三代祖宗中含有犹太血或有色人种的血,饭碗就在打破之列。因为他的祖宗里有的'勿视相',和犹太人或有色人种发生性关系,在当时尚未入世的儿子、孙子乃至曾孙,好像都要替他负责似的!最近见德国所公布的《农法》,里面所定的农民得享的种种权利,就说明只限于德国公民,须自1800年以来,家族中不含有犹太人或有色人的血统者,现在是1934年,距1800年是一百三十四十年了,做子孙的要替百年前的祖宗的性关系负这样大的责任,而且是无法负责的事情,真可说是含冤莫白!"[1]

张铁生在1936年1月10日出版的《新中华》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的《柏林面面观》一文,对纳粹反犹暴行做了下述的揭露:柏林文化也变成了武文,凡不能当顺民的艺术家无论雅利安人或犹太人不仅排出于御用组织之外,并且连职业也发生恐慌,当然最倒霉的还是历充赎罪羔羊的犹太人,因为希特勒说"资本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决不曾有一点艺术,就是耶路撒冷的庙宇也是由外国艺术家造成的",所以就是弹风琴的犹太人同唱诗班也不能在柏林立足了。

吴清友写的《犹太民族问题》刊于1936年2月25日出版的《新中华》第四卷第四期上,文章的第五部分集中揭露

1_邹韬奋:《种族的成见和梦想》,辑入《萍踪通讯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138页。

了德国纳粹反犹的种种暴行。列举了国社党党纲中的反犹条款和纽伦堡法的反犹法令以后，吴清友还根据德文报纸的有关内容，记述了纳粹反犹谬论：纳粹头目斯莱辄宣扬什么德国儿童在动物中喜欢参观白鹅泅泳，听小鸟歌声；而犹太儿童则喜欢参观野兽，由此可见“犹太人本性为野牲民族，与园中凶兽无异”。斯莱辄还恶毒地断言：“犹太人是一种没落的民族，罪恶是他们的职业。”“犹太人对于白种人的关系，正如瘟疫、肺结核病、梅毒对于人类卫生一样。”[1]吴清友尖锐地指出纳粹这些反犹谬论完全是德国执政者的种族偏见、阶级传统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为其扩张殖民地、建立第三帝国服务的反动观点。

曾到过德国的中国记者王搏今在《卍字旗之威力下》[2]中记述了他在柏林所见的纳粹排犹暴行及本人的感受。在文章中列举了德籍知名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之后写道：“犹太人对于这个国家增加了极大的光辉”，“如今骄悍的卍字旗在飘拂着，使这些名人减少了光彩”。他们或在身后被焚书，或身陷囹圄，或流亡他国。接着王氏又揭露了纳粹反犹引起的丑行：根据纳粹的法令规定一个人的前三代中若有一滴犹太人的血，就不得把笔为文，于是报纸上就增加了许多有趣味的广告，有一个作家的广告说：“我的法律上的祖父虽然是犹太人，但当我的祖母生我父亲的前后，正恋着一个纯日耳曼血统的男人，所以我的真正的父亲是纯日耳曼的血统。”据说这位作家给他的祖父加上了乌龟的头衔之后，才能有写作自由，所以犹太人不一定不能在德国工作，只要无耻就成。至于那些有廉耻的作家只有压抑他的才华，最近死去的犹太人老画家就这样抑郁而终，因为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不但不能有犹太血统的文，也不能有犹太血统

1_斯莱辄即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系德国纳粹《前锋》杂志主编，他发表有大量反犹言论。

2_刊于《新中华》第四卷第四期（1936年2月25日出版）。

的画。王氏又指出："柏林，这是一个物质上清新而精神上窒息的城市。"王氏还针对纳粹上列反犹行径写了一首诗：

卖父求安其灭耻，
焚书杀士竞售欺；
可怜光猷垂先哲，
一路低昂卍字旗。

吴湘渔在1936年10月10日出版的《新中华》第四卷第十九期上发表的《种族与种族的偏见》一文，批判了德国纳粹鼓吹的种族主义的谬论。文章针对所谓非雅利安血统的犹太人低劣说，写道：我们从种种事实来看，犹太种族世代有才智之士闻名于世，据英国铁尔培（Awyatt Tiby）1936年出版的《欧洲天才之分布》一文中说："在欧洲大陆如果我们把犹太人人数假定为九百万人，而大陆人假定为四万万两千万人，我们就可以看出犹太人出名的比例较基督教人高。"铁尔培同时指出犹太人投身于教会和在政治上出风头的机会较欧洲其他种族要少。换句话说，如果犹太人与欧洲其他种族有同等机会，那出名人的比例还要来得更高。从纽伦堡法看来，已不是反对犹太人的低劣而是反对犹太人的思想，这正如国社党人类学家高西拿（Ckossin）在《日耳曼人原始》一书中所说：诺特的灵魂可以有时与非诺特的肉体结合，而一个不需要的非诺特的灵魂，可以藏于一个好的诺特的肉体中。[1]吴湘渔接着指出上述言论反映了"国社党无法自圆其反犹理论，于是创造这种玄学的解说，这表示反犹的把戏不过是一种籍人种的偏见对内实行压迫罢了"。

思慕（即刘思慕）写的《犹太民族的悲哀》（刊载于1936

1_种族主义者宣扬所谓"诺特（Nord）种族为长颅族，聪明优秀"。

年6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4卷6号上)，文章除了概括地介绍犹太民族特性、犹太人的分布、犹太复国主义之外，着重评述了德国纳粹的反犹暴行，也涉及波兰、匈牙利的反犹运动。在这一部分作者揭露了德国纳粹反犹运动的种族主义根源及其煽动种族主义的目的——“使国民仇视犹太人而忘记他们的真正敌人，资产阶级”。文章还分析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和德国国社党政纲中反犹的内容，着重指出把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视为一体的这种鼓吹是国社党毫无根据的“得意之作”。思慕又揭露了1935年德国纳粹颁布的《公民资格法》和《血统法》(合称《纽伦堡法》)排挤犹太人的规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犹太人低贱”的处境。

贺益文写的《犹太民族问题》，刊于1939年6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三十六卷第十二号上。文章的第二部分专述在德国纳粹统治下犹太人悲惨的命运，记述了反犹运动的发展过程及苛虐犹太人的种种规定。社会生活方面共10条，经济权益方面共9条，文化生活方面共9条，还揭露了反犹运动其他方面的表现。文章又有一部分专门谈到了急待解决的上海犹太难民问题，记述了自1934年以后犹太人移居上海的经过。文章还转述了1938年11月25日上海《字林西报》上刊载的犹太难民访问记，被访者揭露了德国难民营中犹太人困苦的境地。文章注意到在上海发生的反犹运动，即署名为“上海排犹三K党”散发的排犹传单。中国新闻界重视这份传单的散发，《解放日报》在1941年4月28日第三版上也曾披露了有关消息。贺益文写的这篇文章又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从事的排犹活动。文章最后部分强烈呼吁中国人民应以推己及人的心态对待来

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余万难民有待救济，"我们应当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来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

《新华日报》1942年2月21日第四版发表有仲颖写的《纳粹虐杀犹太人的罪行》。此文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揭发纳粹虐犹是德国纳粹既定的方针。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即给犹太人定下了莫须有的罪名，并认为只有消灭犹太人，第三帝国才能在世界上取得胜利。虐犹方针在第三帝国的军歌和党徽中也有反映，接着作者又列举了虐犹法令的具体规定。文章第二部分揭露了纳粹虐犹的两项毫无根据的理由：一是犹太人是最污秽的民族；二是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共产运动的指挥者，作者对这两项理由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驳。文章第三部分指出纳粹给犹太人定下的莫须有罪名实是一种借口，是为了转移本国人民对大资本家的不满情绪。文章第四部分揭发虐杀犹太人触目惊心的种种罪行。

《中央日报》也发表有两篇专文，一篇是陈澄之写的《不幸的犹太民族》(刊于1938年12月19日该报第四版)，文章列举了意大利、巴西、但泽利伯维尔、德国、卢森堡、瑞士反犹的种种表现。在文章末尾作者写道："还有许多关于犹太人不幸的遭遇，假使把那些记载收集起来，简直可以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另一篇是佚名写的《犹太人无功于德国吗?》(此文刊于《中央日报》1941年6月30日第三版)，副标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销声匿迹，歧视情形虽德国人亦为之不平。文章展示了犹太人在德国的惨状，文章还对纳粹宣扬的犹太人无功于德国的谬论进行了批驳，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八万名犹太人参加了德军，上了战

场。犹太人出身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作出了重大的科学贡献，为德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作者又根据自己在德国的见闻，揭露了公众场合中歧视犹太人的种种表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对德国纳粹反犹暴行的揭露与谴责永载史册，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深受苦难的犹太人民的同情和援助，鼓舞了犹太人民反对德国纳粹的正义斗争，构成了中犹人民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对反犹暴行的揭露与谴责也为我们研究反犹暴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深入广泛挖掘有关史料，并充分加以利用是今后史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文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感谢他向编者提供了这篇论文，此次刊发编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犹太难民来上海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

潘　光　王　健

关于欧洲犹太难民来上海的路线、时间、人数及到上海后的安置情况，国内外一些著述的说法很不一致。综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笔者分五个阶段来考察这几个问题。

第一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入侵上海。

在这几年里，纳粹德国开始排犹，大批德国犹太人被迫出走，但由于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没有对犹太人关门，所以来到上海的德国犹太人数量并不多。其中大都是与上海有些联系的，或有亲戚在上海，或曾在上海生活过，或其工作过的德国企业与上海有关系等。1933年，首批抵沪的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1]此后直到1937年夏，抵沪德国犹太人的总数很难精确统计，因为其中不少人又从上海转往其他地方。据估计，如不包括将上海作为中转站的人，这个数字在1 000～1 500人之间。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来沪的犹太人还不能算难民，只能算侨民。不过，由于希特勒的排犹开始于1933年，1933年后来沪

1_马斯 (A.Mars)："浅论上海的犹太难民" (A Note on the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载于《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 第1卷 第31期 (1969年10月)，第286页。

的德国犹太人显然是受到迫害或威胁才被迫离开德国来沪避难的，因此他们事实上就是难民。这些人大都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医生、律师、教师和企业家，随身带有一部分积蓄，因此较易在上海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居犹侨的中等水平，一般都居住在租界。由于当时欧亚两洲均无重大战事，他们一般都循正常的海路航线从德国直接到上海。

第二阶段，从1937年8月到1939年8月上海有关当局宣布对涌入的犹太难民实施限制措施。

这两年是来自德国及其他中欧、东欧国家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到1938年11月9—10日的“碎玻璃之夜”后达到高潮，并且随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向欧洲其他国家扩展，使得中欧地区的犹太难民纷纷外逃以求生存；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各国对犹太难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严格，而上海却因战乱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大门洞开。这一时期离开纳粹德国统治地区来沪的犹太人的境况十分悲惨，据1938年12月抵沪的一批犹太难民称：“我们187人中，有不少本为当地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1]还有不少人，是通过所谓的“非法”手段逃离德、奥等国的，如偷越国境、偷搭外轮、持短期签证进入别国再设法逃离欧洲等。他们来上海的路线大致有三条：大部分人先进入意大利，然后在意港口搭船来沪；一部分人则先进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再在那里的大西洋港口搭船来沪；还有少数人坐船经多瑙河抵巴尔干国家，在那里登

1 《申报》，1938年12月5日。

上海轮东来。关于该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说法十分不一致，有说15 000人左右，有说17 000 ～ 19 000人，也有说20 000人左右的。据我们综合各类资料分析，前两个数字主要来自各难民安置点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有不少难民并没有去难民营，而是直接投奔亲友，或自行租房安顿下来，还有些难民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了其他地方。如将这些难民都算上，估计该阶段抵沪的犹太难民总数在20 000人以上，为21 000 ～ 22 000人。

这批难民人数多，抵沪时身无分文，生活十分困难。上海犹太社团和国际救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帮助安置救济。1934年，早期来沪的德籍犹太人成立了“救济基金会”。这个组织曾积极救助了第一批从奥地利来的犹太难民。但是，随着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救济基金会”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为此，1938年8月8日，由塞法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Granting Relief to European Refugees，简称IC)成立，委员会由匈牙利籍犹太人保罗·科莫尔(Paul Komor)担任领导，因此又称为科莫尔委员会。亚伯拉罕家族和托依格家族开设了公共厨房，维克多·沙逊爵士捐出河滨大楼作为接待站，阿哈龙犹太会堂也被用作接待站和难民厨房。为了加强救济活动的合作与协调，1938年10月，由犹太巨富嘉道理家族出面召集上海犹太社团人士和国际救济组织官员举行协调会议，成立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Committee for Assistance of European Refugees in Shanghai，简称CFA)。在这个委员会的董事会中，有塞法迪犹太人的代表如门德尔·布朗、D.E.J.亚伯拉罕和鲁本·D.亚伯拉罕父子，俄罗斯犹太人的代表H.根斯布格尔、迈

耶·阿许根那齐拉比、刘易斯·格林伯格、H.卡默林和早期来沪的德籍犹太人代表伯纳德·罗森贝格博士和库特·马克斯博士。由于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不久转入了其首任司库米歇尔·斯皮尔曼（Michel Speelman）之手，因此通称斯皮尔曼委员会。到1938年底，委员会共筹到约8 000美元。1939年1月，维克多·沙逊爵士捐助了一笔15万美元的特别款项作为"复兴基金（Rehabilitation Fund, IC）"[1]。嘉道理、海亦姆、约瑟夫等犹太富商也出资设立基金，帮助难民办一些中小实业，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2]从1939年1月起，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和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多个犹太难民营[3]。国外犹太人的捐助也源源而来，其中美国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捐款最多，"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CEM）[4]也作出了较大贡献。1938年，"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一年后又将远东分部从哈尔滨迁到上海，为上海犹太难民提供联系、咨询、贷款等各种服务。同年，"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成立，此后在援助上海犹太难民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救济上海犹太难民的大多数经费都是由它捐助的。此外，各国旅沪侨民，中国教会和其他一些非犹太救援或慈善团体，如伦敦会、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美国育婴堂等也都捐房捐款帮助犹太难民。

这一阶段抵沪的犹太难民，绝大多数在虹口地区安顿下来，因为那里地处公共租界、日租界和华界的交叉地带，经过战乱后市面萧条，物价一般比上海其他地区低30%，房

1_上海档案馆存档：U1-4-2971。

2_《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1939年1月12日。

3_上海档案馆存档：U1-4-0277。

4_HICEM这一简称是HIAS（希伯来侨民援助会）和JCA（犹太拓殖会）两词的组合。该会在美国称HIAS，在欧洲和其他国家称HICEM。在远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会称DALJEWCIB（远东犹太情报署的简称）。

租则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低75%[1]。除少数难民自行租屋居住外，大多数难民都住进了临时租用或搭建的难民收容所，一般30～50人挤在一间房里，最拥挤的有100～200人住一间的。难民们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到处打零活，干杂差，如送煤球、修电器、烤面包、卖报等。一些犹太难民又发挥经商才能，成了活跃在虹口一带的街头小贩，有的还开起了小店铺。后来，随着来沪难民人数减少，其中有些人境况有所改善，也有迁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居住的。

第三阶段，从1939年8月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

随着来沪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正常的租界生活遭到巨大冲击，租界管理也日益混乱，这引起了租界居民的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如当时租界里就流传由沙逊家族投资的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考虑解雇白俄雇员，改聘犹太难民，造成俄侨的恐慌。租界当局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上海犹太社团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于是，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团纷纷要求予以适当的限制。1939年5月25日，犹商沙逊和海亦姆也表示："如果难民的涌入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的话，我们将感到满意。"此外，由于难民大量涌入虹口，使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也使居住在此的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军当局达成协议，宣布护照上有"J"字的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须预先申请上陆许可，而获得上陆许可的条件是：每人交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

1_金斯伯格（A.Ginsbourg）：《上海犹太难民》（*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出版，上海1940年版，第7页。

孩100美元)；有近亲在上海居住；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居民结婚。[1]此规定实施后，欧洲各轮船公司均拒绝向没有上陆许可的犹太难民出售赴上海的船票，已在途中的犹太难民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不过，由于二战爆发后拥有欧洲最大犹太社团的波兰沦入纳粹手中，致使逃离欧陆的犹太难民急剧增加，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也千方百计地援助这些犹太难民，因而仍有不少犹太难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同时，英国由于对德宣战而驱赶德侨，也导致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地区、新加坡等来到上海。[2]可笑的是，按照希特勒的法令，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据统计，这一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数量虽然锐减，但仍有2 000 ～ 3 000人，其中不但有来自德、奥的，还有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该阶段犹太难民的来沪路线和安置情况与前阶段相似。

第四阶段，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

之所以将这一年作为一个阶段，主要原因是1940年6月后犹太难民的来沪路线有了较大的变化。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接着法国便战败投降，此后英国和德、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战火还蔓延到了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西亚。这样，欧洲犹太难民从海上来沪的传统路线全部被切断了。同时，由于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希腊等巴尔干国家先后沦入纳粹魔掌，波罗的海三国面临纳粹威胁，后又被并入苏联，而德国占领军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始有计划的排犹，

1_前引马斯文，第291页。

2_前引金斯伯格书，第7页。

使欧洲犹太人外逃的潮流更为汹涌，但成功的比例也日益降低。这一阶段仍有不少人希望来上海，但只能转而走陆路——穿越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上海。走这条路线的犹太难民大都来自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往往历尽千难万险，花几个月时间才到达上海。这一阶段抵沪犹太难民的确切人数特别难确定，因为这方面的资料非常缺乏，但笔者估计他们的人数大约在2 000人。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3月，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支持下，上海的东欧和俄国犹太人成立了“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EASTJEWCOM或EJC)，专门救济来上海的东欧犹太难民(主要是波兰难民)。波兰流亡政府也在上海成立了“波兰在华战争难民组织”，并选出一个五人执行委员会。与前几个阶段相比，由于这一阶段来沪犹太难民人数大减，所有在沪犹太难民的食宿条件均有所改善。

第五阶段，从1941年6月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欧洲犹太难民从陆上来上海的路线也被切断。此后，再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陆前来上海。然而，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和日本的犹太难民，由于战火四起、各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而无处可去，结果又辗转来到上海，所以这一阶段仍有近2 000名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的犹太难民。值得一提的是1 100余名波兰犹太难民来沪的曲折经历，他们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卢布尔经学院等犹太经学院的师生400多人。他

们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后陆续逃往立陶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逃离欧洲的办法：以前往荷兰殖民地库拉索为由取得进入日本的过境签证，然后再设法从日本去美国。经过艰苦努力，并得到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的全力支持，他们居然获得了去日本的过境签证。后来，他们又获得苏联政府的离境许可（立陶宛此时已并入苏联），在苏联旅行社的安排下（每人付200美元）坐火车横越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再从那里乘船抵日本神户。在神户滞留了半年多，他们无法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后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特派代表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等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上海的许可，于1941年下半年分批来到上海。他们是珍珠港事变前来到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这批波兰犹太难民人数虽不多，但文化素质高，不少是拉比和经学院师生，因此后来在上海犹太社团的宗教生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杉原千亩因违抗不得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命令而被日本外务省解职，在困境中度过了余生。直到1985年，以色列正式将“国际义人奖”授予这位“日本的辛德勒”[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与外界的海上联系已全部被切断，犹太难民从海上进入上海已无可能。同时，由于欧亚大陆均处于战火之中，犹太难民从欧洲经陆路来上海也几乎不可能。因此，此后直至二战结束，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虽不能说一个没有，也一定是极为罕见的。

（本文作者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和副主任。本文摘自潘光、王健著《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此次刊发作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1_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5月13日。

计划外的逗留：1941年波兰犹太人如何在上海沦为难民

安德鲁·贾库伯维茨（Andrew Jakubowicz）

引　言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海是超过15 000名德国和奥地利逃难者的避难所，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1941年夏末有1 000多波兰犹太人抵达这个城市。本文回顾了1941年八九月间，他们来上海的起因、被抵制直到最后实现的过程；既注意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注意到他们的国籍，这两者一方面使他们面临的危险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幸存至关重要。

1941年3月，4 000多大屠杀受害者乘船从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经敦贺抵达日本神户。其中超过两千人有日本过境许可，终点印章为荷兰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库拉索岛和苏里南，这些人几乎都是身为波兰公民的犹太人。他们的短期过境许可很快就过期了，虽然有逾千人设法找到了进一步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勒斯坦和南美洲国家的通道，但其余人的情况却岌岌可危。日本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将他们送回欧洲（这实际上等于宣判了他们死刑），而此时其中一些人已动身前往“满洲国”，即日军占领

的中国东北。

尚未离开日本的波兰犹太人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也是最大的群体，是犹太经学院的拉比学者和他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密尔（当时在波兰东部，现属白俄罗斯）的犹太经学院。他们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犹太教正统派学术群体的幸存者，讲意第绪语和俄语。第二类操波兰语，多为波兰中西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更为世俗的商务人士和专业人士。第三类人既能讲一些波兰语、也可能会说意第绪语和俄语，这些人在政治活动方面颇为活跃，如参加各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在左翼社会主义运动（比如"崩得"）中十分活跃。

神户危机

1941年7月，日本从法国维希政府[1]那里接管了印度支那南部法国殖民地的控制权。此后不久，美国宣布禁止从日本到北美的所有航运，封锁了从日本港口到任何同盟国、实际上就是到西半球的海上通道。神户的波兰犹太人瞬间丧失了他们原本寄托最大希望的离日途径。这一渠道被关闭后，美国接着又禁止美元资金转移到日本。这样一来，难民丧失了经常性的经济来源。于是，通往自由之路和经济支持均告终止。

在神户，兵库县知事Saka Chiaki面对大批过境签证早就过期的外国人，他们无法离开，也没钱购买食物或支付房租。虽然其中一些人做做小生意，但整体来说，由于没有来自外国的现金转账，他们财政状况不佳。他们中近一半是来自犹太经学院的宗教学者，缺乏世俗的谋生技能，尽管他们仍能通过日内瓦与他们在美国的支持者往来。1941年8月11日《北华捷报》刊登了美联社来自东京的一篇报道，标

1_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此后在维希建立的政府实际上是听命于纳粹德国的傀儡。

题是“波兰难民离开日本”。该文称：“尽管只有临时签证、却被允许逗留日本好几个月的近千名波兰难民，必须在9月15日前离开日本。据了解，他们申请新的居留许可将被拒绝。”难民签证确保了他们能离开日本继续前行，但他们又有何处可去呢？他们必须找到美国人没有禁止、日本船仍然可以通航的港口。

8月，三艘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船只由当局担保，大多数难民分三批登船驶向上海，他们没有上海的入境许可，但他们希望能乘船离沪，然后南经菲律宾或荷兰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抵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向西经过香港到印度和巴勒斯坦。这三批难民离开后，仍有数百人滞留神户。

兵库县知事Saka Chiaki于1941年8月30日写信给日本内政部及外交部北美司（登记的收信日期为1941年9月6日），抄送上海和哈尔滨。他希望信中提出的行动方针，能解决最后的僵局。信的内容如下：

关于将犹太人送出日本的相关事宜

到北美、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和南美的航运服务完全中断。因此，即使这些犹太难民持有到其他国家的入境签证，也不可能从日本前往目的国。留给犹太难民的唯一选择是去上海，然后乘坐外商（非日本的）船舶通过香港和马尼拉。但是请注意，在这个时候即使前往上海也只能乘坐NYK的船才行。为了尽量减少针对日本的反情报活动，在神户和关门两地的乘客受到仔细检查，而外国人只能乘坐NYK的船。最后一班定期航船是6月28日离开的，现在很难知道航运服务何时能恢复。如果情况变得更糟，那

么可能连前往上海都无法做到。美国有支持犹太人的团体，但却无法再进行汇款，在神户的犹太人已经失去了获得资金的途径。因此，让犹太人留在日本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去上海是让犹太人离开的最好做法，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到其他地方的签证的话，或者他们马上申请这类签证也可。我已经安排3艘船去了上海。

神户的下一步计划是，当航运可行时，将剩余人员都送到上海。但目前还没有到上海航运安排的具体计划。从9月中旬起，神户港只能乘坐NYK航行的限制可能被取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还可使用由另一家公司东亚开运株式会社运营的船舶太阳丸号，剩余的犹太人也可由太阳丸号[1]送走。

接下来是一组表格，其中第一张表格显示船舶以及已送走的难民乘客的国籍和性别。第二张表格列出每艘船上乘客持有的签证——巴勒斯坦、荷属东印度群岛、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古巴、墨西哥，以及那些没有签证的乘客。第三张表列出难民的名字（从波兰文等音译成日文）、他们进入日本的时间、现住址、职业、姓名和年龄。[2]

Saka的意图一直是让希望继续旅行的犹太人抵达能使他们实现愿望的国际港口，从而使他们能继续前行。不过，对于一些难民来说，从他们抵达上海到12月7/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尽管还有若干星期，使他们能继续前行，但常常要付出家庭分离的代价。

到上海去

因此，1941年8月神户当局和日本政府做出了决定，安排日本轮船运送滞留的犹太人离开日本去上海。然而，

1_尽管“太阳丸（Taiyo Maru）号”隶属日邮，但自1939年10月起就租给另一家在上海运营的公司。1941年10月回到太平洋分公司。

2_摘自日本外务省存档中的一封信函，所提及的由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提供的关于波兰犹太人的信件日期为1941年9月15日，这表明“太阳丸号”会在第二天或不久后离开。

当时尚未明确将他们送至上海后谁会对他们负责，因为他们没有上海的入境许可。那里有一个犹太难民委员会管理1938年和1939年抵达的约18 000名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无国籍难民，也有其他许多犹太社区机构。那里还有波兰居民协会，主要由非犹太人组成。此外，也有由俄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难民组成的“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EASTJEWCOM)，此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救助即将抵达的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犹太难民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种状况下，对各类波兰犹太人（世俗、左派、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等）态度各异、目的各不相同的各组织相互竞争、摩擦，在管理上一团乱麻，越来越难以满足波兰犹太人的期望，也无法解决他们的到来会引发的众多问题。

3月，当犹太代办处和“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的代表楚帕凯维茨和瓦尔哈夫蒂格催促解决他们的问题时，身为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副专员的罗伯逊冷冷地对他的上司政治处专员指出：“整个难民问题一团混乱，原因很简单，有太多的人和组织正在插手，而不是将问题交给一个组织解决……”犹太人可能是万众一心，但在难民救济金的分配上肯定不是统一安排的。

上海的这些情况和难民将面临困境的报告使在美国的犹太经学院支持者非常不安。9月，在递交给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的备忘录中，主要来自犹太教正统派的七名犹太社团领袖敦促委员会“对于波兰难民的问题要和与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问题区别对待，由于目前处于特殊的阶段，所认可的难民机构——波兰立陶宛委员会就是‘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此请求的基础，是基于一种“临时”状况：由于“将这些难民塞进德国难民现有的房屋中、



波兰犹太难民1943年春被迫迁入虹口隔离区

置于当地援助难民委员会的管理下，将使他们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因为宗教、社区和语言等原因，这些难民，大多是犹太学者、神学院学生和宗教人士，难以在这样的社会范围中与其他人和谐相处。”

上海治理与接收波兰犹太难民

上海当地行政机制存在的问题也无助于解决犹太人组织之间混乱不堪的状况。上海是由各个独立的行政机构采取各自为政的方式进行治理的。上海工部局负责主要的公共租界，也即英国租界和美国租界。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列强击败清帝国后争相抢夺通商口岸控制权时，该机构就在最早对外开放的上海出现了。公共租界沿苏州河南岸向西延伸，包括面临黄浦江的外滩金融区、跑马场和主要的外国人居住区和商业区，也包括主要的塞法迪犹太会堂拉希尔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西摩路的英式上海犹太学校（Shanghai Jewish School）以及博物院路的贝斯·阿哈龙犹太会堂（Beth Aharon Synagogue）。公共租界周边一些住宅为主的区域，随公共租界人口的增长也慢慢并入，并称为公共租界的中西部地区。

公共租界南部的法租界也沿着黄浦江向西延伸。这里有俄罗斯犹太人建立的新犹太会堂（New Synagogue）以及犹太俱乐部（Jewish Club）。法国1940年6月投降后，法租界实际上由纳粹控制下的维希官员控制。但即便是在维希控制之前，法国总领事也于1940年5月27日，即法国军队在欧洲溃败于德国的进攻后不久，停止向中欧的犹太人签发入境许可证；这也是为了与公共租界决定于1940年6月采用新的许可证规定保持一致。

再往南包含旧中国城的区域归南京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地方政府管辖（治理该区域的官员在旧清帝国时期也被称为“道台”）。这里的中国行政机构实际上是1932年和1937年占领上海主要区域的日本人的代理人，执行当地日本人的指令。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员和日本领事馆官员在对犹太人政策方面的对立感到迷惑。

日本人在苏州河以北区域通过所谓的“海军陆战队机构”来管理，包括越界筑路区（Wayside）和虹口区域，那里有大量犹太人管理的房产，居住着数千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这部分人主要在1938年之后到达，而日本人试图将他们安排到重新建设的战争破坏地区，在日本的所谓“犹太研究专家”犬冢（Inuzuka）的愿景中，这是对“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贡献之一。进入这一区域的犹太难民处于严格的日本军事管制下，必须要有许可证才能住在那里。当3月“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来到和4月神户来的首批犹太难民抵达后，日本人拒绝东欧犹太人进入，将他们定为“不受欢迎的人”。日本当局选择会说德语的犹太人组成委员会，帮助他们拒绝波兰人进入，并设法驱逐那些已经到达并且没有许可证就在该区域私自定居的犹太人。

当Saka安排的船开始离开神户驶向上海时，《北华捷报》1941年8月6日的头版标题为“有人提议将某些犹太人驱逐出虹口”。报道援引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狭间（Hazama）的话：“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会被驱逐”，以便使“黄浦江北岸犹太难民居住地的生活保持稳定”。他称：将被驱逐的是“没有必需的许可证就进入虹口”的人，而更多的难民即将抵达。

1941年8月下旬，上述所有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8月2日，“镰仓丸号”（*Kamakura Maru*）离开日本开往上海，于8月4日抵达，载有147名犹太难民，其中106名男性、41名女性，85%是波兰国籍。据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特别处记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取道上海前往澳洲和巴勒斯坦。”[1]

8月20日，“浅间丸号”（*Asama Maru*）又从神户运送287名难民去上海，其中40人是女性，87%是波兰人。8月28日，“龙田丸号”（*Tatsuta Maru*）再携349名难民启程赴上海，其中72名为妇女，9.3%为波兰人。上述三艘船总计带往上海783名难民，696名为波兰人，其中585名男性和111名女性。9月第三周，另一艘船舶（很可能是“太阳丸号”）又带来了322名难民。至此，总计从神户运送到上海超过1 100名难民。

“龙田丸号”的到来引发了上海犹太社区的一大危机。“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官员海亦姆（Ellis Hayim）于9月4日致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英国籍秘书兼督察长G.菲利浦斯（Godfrey Phillips），要求工部局能采取积极行动安排即将乘下一班船（他称为“浅间丸号”）到来的350名难民的登陆和住房。海亦姆在信中详述了委员会面临的问题：虹口的日本当局拒绝任何难民在那里登陆，维希法国当局和上海当地政府也拒绝难民进入，委员会在公共租界只有非常有限的住房，主要是若干犹太会堂。这样一来，有住宿的地方，政府拒绝难民入境，而可以进入的地方，住房又非常有限。

下面是“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方面人员与管理海军陆战队事务的犬冢先生之间对话的详细摘要。

1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文件（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日期不详。

犬冢说：

a）凭借过境签证，日本允许波兰难民留在日本两个星期，但现在他们的停留时间逾期了近一年。

b）由于美国宣布冻结资金，难民无法收到原本能使他们在日本维持生计的资金，因此除了送他们离开别无他法。

c）犹太社区与日本当局在某些拟议的商业合作企业并未进行运作和经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犹太难民争取当局的宽容处置。

d）日本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没有许可证，任何人不得在虹口居住。住房问题本身已经非常突出，因此虹口收容更多难民会使情况更加恶化。

犬冢称，他很遗憾无法用他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向他指出：

a）既然日本政府认为难民应被驱逐出日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必须负责进行相应安排，使难民能在犹太人避难区域安顿下来。

b）如果海军陆战队当局不能确保以他们的方式让难民在虹口居住，那么唯一替代方法就是让难民留在带他们过来的日本船舶上，或者将他们带回日本。

c）将不存在住房困难问题，因为我们会把即将到来的波兰难民分配到虹口已有的各种避难所房屋中。

d）通知为350名难民提供住房的时间过短，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理应尽力配合我们才合理。

建议所有的船运公司都不接受到上海的难民乘客，除

非他们拥有登陆许可，但既然NYK船运公司在政府命令下打破了这个规则，那NYK就有责任将难民带回日本。

僵局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最后对于350名左右“龙田丸号”乘客暂时达成一致，但对于犬冢宣布的即将在9月下旬到达的更多难民，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海亦姆对菲利浦斯的最后一句话是：

……在虹口的日本巡逻队不允许难民登陆到码头上。我们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派我们的代表接船，日本当局可以采取他们认为适合的行动。我们将向神户发电报要求神户的委员会通知难民不要离日赴上海，因为根据日本的规定，他们将无处可住[1]。

对9月初犹太宗教学者写给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备忘录的一个补充文件表明，通过使用犹太俱乐部，也得到基督教教堂的帮助，问题在法租界得到了解决。在这些房产里，许多难民将一直住到1943年。该文件称：

在编写备忘录之后，收到消息说涌入上海的难民可以选择进入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这样他们会在日本当局的控制之下，或者选择进入法租界，在那里则由帮助波兰人的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安排。前者必须进行登记，将来有受到拘禁的危险。目前已经处于日本人控制下的难民就面临这样的危险。因此我们强烈反对让这九百多波兰难民再受日本人的控制。他们的安全和福祉在法租界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的帮助下更有保证。

1_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处(*Secretariat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犹太经学院人员被安排在位于市中心的阿哈龙会堂，这里虽然十分拥挤，但在他们的整个逗留期间，一直有住宿和学习的地方。即便如此，有一些难民仍在神户逗留到1941年年底。

当时，最后一班的荷兰轮船已经从上海开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并继续驶往澳大利亚，上面载有少量波兰犹太人。经波兰领事馆的积极斡旋，他们设法订到舱位并获得了澳大利亚签证。犹太通讯社（Th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1941年10月17日从东京报道：

本周驶往美国以运送美国公民回美的日本轮船拒绝接受拥有有效美国签证但持波兰护照的犹太乘客……同时，日本当局继续将已经在神户及日本其他城市滞留的波兰犹太人运往上海。援助在沪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发现很难对所有的难民照顾周全，而大部分难民目前都寄身于犹太会堂和上海犹太俱乐部周边。据估计，仍羁留日本的波兰犹太难民已不超过150名，而他们也会很快被日本当局运送到上海。

1941年11月下旬，犹太通讯社报道了在巴勒斯坦特拉维夫的一次犹太代办处移民问题会议。具体提及波兰犹太人时，该新闻社报道说：

会议上讨论了远东严重的局势导致数以千计的波兰犹太人在上海面临的危险。与会者强调，那边的事态发展使迅速采取行动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另据报道，巴勒斯坦已在上海开设了一个办事处，致力于为这些难民在新劳工

计划下移民巴勒斯坦做准备和安排。

12月8日（当地时间），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接下来的几天，上海被日本军队全部占领。现在，几乎没有几个能获得巴勒斯坦许可证的人能够最终成行了。波兰犹太人的处境更艰难。

结　论

波兰犹太人的经历与无国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迥然不同。首先，他们有一个致力于保护他们的政府；波兰前驻华大使泰德兹·罗莫（Tadeusz Romer）的领事代表直到1942年8月才离开上海；在这之前，他已成立了一个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波兰人在内的波兰居民理事会，以继续负责保护上海的波兰公民。其次，他们从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获得的每日财政补贴远比德国犹太难民获得的多，此外还有从美国经日内瓦给予经学院人员的补贴，以及来自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和“崩得”[1]运动政治人物的其他资金来源。最后，他们还得以长期抵制日本1943年2月要求“无国籍”难民强制搬迁至虹口的命令。

尽管如此，1943年底大多数波兰难民还是被迫搬迁到了虹口的指定区域。同时，密尔经学院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在阿哈龙会堂学习，另有一些波兰犹太难民子女去了位于市中心的上海犹太学校上学。此外，他们曾与从来未被指定为无国籍也未被强迫进入指定区域的“自由”俄国犹太人关系密切。不过，波兰难民中有5人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死亡，因为他们抗议日本人将他们定义为“无国籍”。另外，有5人在1945年7月美国轰炸虹口时死亡。

1_“崩得”是犹太人中的左翼政治组织。

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时，波兰犹太难民幸存者仍有1 000人左右，其中只有2人决定返回波兰，其余的人都选择前往其他国家。他们往往选择继续完成1941年8月他们突然中断的航程。即便如此，上海仍然是他们生存记忆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他们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时期。

（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其祖父等亲属就是1940年至1941年来上海避难的波兰犹太难民，他是长期研究上海的波兰人，发表了许多著述。感谢他向编者提供了这篇论文，全文由郭晴霞翻译、潘光校对，此次刊发编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正和补充。）

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社区

潘 光 王 健

欧洲犹太难民来沪后，起初并没有建立独立的社区组织，而是参加阿哈龙会堂、拉希尔会堂和摩西会堂的宗教仪式。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中欧犹太难民要求准许他们在这些会堂里按照德国仪式单独举行宗教活动。这虽得到塞法迪犹太社区和俄罗斯犹太社区的同意，但阿许根那齐拉比[1]规定他们只能按犹太教正统派的传统进行，使中欧犹太难民深感不便，遂开始计划建立自己的社区组织。

欧洲犹太难民建立独立社区组织

1939年3月，在利奥波德·施泰因哈特、格哈德·戈特沙尔克、伯纳德·罗森贝格博士等人的组织下，中欧犹太难民在百老汇大戏院（今东山电影院）举行了第一次独立的宗教仪式，以纪念"五旬节"[2]。这是中欧犹太难民建立自己独立的社区组织的第一步。但当时出于维持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关系考虑，"五旬节"仪式后建立的宗教组织还只是隶属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一个公共宗教部，由库特·马克斯博士（Dr.Kurt Marx）居中进行协调。

1_阿许根那齐拉比本人属犹太教正统派。

2_五旬节，又称"七七节"或"收获节"，为犹太教七大节日之一。

1939年7月，在格奥尔格·格拉斯博士的领导下，中欧犹太难民成立了犹太文化协会（Juedische Kulturgemeinde），向建立独立的中欧犹太人社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文化协会的组织下，难民们首次独立举行犹太新年仪式。这一仪式的成功举行进一步强化了中欧犹太人的宗教独立意识，要求建立自己的犹太社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9年11月，中欧犹太难民不顾阿许根那齐拉比和“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反对，建立了独立的社区组织——中欧犹太协会（Juedische Gemeinde），本部设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施泰因哈特出任协会主席。虽然中欧犹太协会缺乏资金，并一时无法得到“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支持，但是仍以勃勃向上的精神，团结在沪中欧犹太难民，积极开展宗教和其他社区活动。

中欧犹太协会相继成立了公益部、宗教部、法律部等机构，建立了“仲裁法庭”“妇女联盟”、圣葬社等组织，以处理诸如法律诉讼、宗教活动、教育卫生、丧葬事务等各种具体问题，还出版了报道协会和社区活动的《犹太简讯》。该会的首任拉比是J. 温特博士（Dr. J. Winter）。1939年10月，他离沪去美国后，约瑟夫·蔡廷博士（Dr.Josef Zeitin）继任。其他为难民服务的拉比还有卡尔·H. 索伯（他和蔡廷都是温和正统派）、维利·泰希纳和格奥尔格·坎特罗夫斯基（两人都是自由派），以及属于极端改革派的E. 西尔伯斯坦博士。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经过协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中欧犹太协会仍然发展迅速。

虽然在百老汇大戏院举行的宗教仪式是由自己的拉比主持，并按照德国的方式进行的，但仍有一批自由派难民认为这过于正统。于是，在胡戈·亚历山大（Hugo Alexander）的领

导下，部分自由派难民于1940年逾越节在东海大戏院（今东海电影院）举行了标准的改革派宗教仪式。这批自由派难民后来独立出去成立了中欧犹太自由派协会（Juedisch-liberale Gemeinde），由胡戈·亚历山大任会长，并聘请西尔伯斯坦博士担任拉比。与此同时，中欧犹太协会也在协会内部设立了自由派难民活动的宗教场所，以防止协会的进一步分裂。

1941年6月29日，中欧犹太协会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共有1 000多人参加了投票。选举产生了21名代表，并由他们推选了7人组成的理事会。F.莱塞博士（Dr.Fritz Lesser）和F.卡德格博士（Dr.Felix Kardegg）当选为正副会长，K.来狄许博士（Dr.Kurt Redlich）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并聘请R. D. 亚伯拉罕任名誉会长。中欧犹太协会的理事会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他们中有商人、职员、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和宗教人士。协会有意建成一个符合欧洲犹太社区民主传统，接受会员监督的犹太代议机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改组了中欧犹太协会，以期越过林林总总的救援机构，加强对欧洲犹太难民的直接控制。改组后的中欧犹太协会逐渐由一个自发的社区组织演化成代表全体难民的政治实体，管理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难民事务，成为犹太难民与日本当局联系的代表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欧犹太协会还负责欧洲犹太难民的遣送工作。

欧洲犹太难民的“仲裁法庭”

在协会的各种组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仲裁法庭”的建立。作为侨居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涉及司法问题，理应由中国政府处理，任何一个国家及其公民均不得在中国设置

独立的法庭，即使当初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也是中国政府派出的司法机构。因此，犹太“仲裁法庭”的设立是上海乃至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当时统治上海的是日本军事当局。他们为了减少管理中的麻烦，有意让犹太人自己处理相关法律诉讼，解决犹太难民间的纷争。他们本来就是占领者，对此类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当然也不会在意。其次，在社团内部建立具有宗教性质的仲裁法庭，是离散犹太社区的传统。早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内的犹太社区就有自己的司法机关[1]。比中欧犹太社区更早的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区和俄罗斯犹太社区内部也都设有仲裁法庭，只是没有那么公开，那么完备，不太为外人所知罢了。如D.E.J.亚伯拉罕就是塞法迪犹太社区的民间治安判事[2]。俄罗斯犹太社区在1939年12月给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将在数月后设置社区附属的仲裁裁判所[3]。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和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也都建立了处理司法问题的机构，前者在1939年夏天成立了欧洲侨民仲裁庭，后者不久后也成立了一个调解庭，主要解决非犹太欧洲难民之间的纠纷。

上海中欧犹太难民“仲裁法庭”成立于1940年2月18日，设在唐山路416弄22号内，由裁判官、律师、协助律师、评判员组成，同时组成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仲裁法庭的有关章程和规则，明确法庭的主要任务是调解，没有处罚之权；规定仲裁法庭是四级四审制，第一、二、三审均为调解，第四审为最高庭，由5人组成，庭长为曾担任过德国地方初审法院法官的阿尔弗雷德·拉斯科维茨博士。此外，中欧犹太人还成立了一个律师公会，共有约近百名律师，为

1_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2_宇都宫希洋：《上海犹太铭鉴》（日文），国际政经学会，1937年，东京，第5—7页。

3_满铁调查部：《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犹太问题调查资料第22辑）（日文），1940年，第52页。

犹太难民提供法律服务。这个犹太仲裁法庭在7年多时间里共处理了数以千计的诉讼，直到1947年才被取缔。中国政府有关文件称："旅沪犹太侨民设立仲裁法庭侵犯我国主权，应予封闭"，"嗣后凡犹太侨民等如有民、刑诉讼事件，并仰依法向我国司法机关申诉"。[1]

中欧犹太协会的其他附属组织

中欧犹太协会还设立了圣葬社、"妇女联盟"等附属组织。1937年中欧犹太难民大批来沪后，中欧犹太协会的弗里德里希·格卢克施特恩于1940年8月建立了自己的圣葬社，并于9月在哥伦比亚路购地建立了中欧犹太难民的第一座公墓。随着难民死亡人数的增加，圣葬社又在周家嘴路购地建立了第二座公墓。圣葬社很受难民们的欢迎，入社者人数高达1 800人以上。

"妇女联盟"创办于1940年，由格特鲁德·沃尔夫领导，成员最多时达1 000多人。联盟主要负责照顾老弱病残难民，烹制特殊的安息日和节日伙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联盟的大半资金是由鲁本·D. 亚伯拉罕夫人提供的。

此外，中欧犹太难民于1942年8月成立了互助组织"厨房基金会委员会"，后来简称"厨房基金会"。基金会由一些经济境况较好的犹太难民组成，旨在筹措资金，采取"监护职责"的方法，帮助救济最贫困的犹太难民。中欧犹太难民还成立了犹太领唱者协会，难民中的锡安主义者还成立了诸如"西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等组织。

欧洲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

在犹太难民中有不少左翼人士，有的是德国共产党等

1 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23日。

左翼政党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形成了一个小组。据该小组核心人物岗特·诺贝尔（Gunter Nobel）介绍，他193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上台后，大批德共党员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他也于1937年被捕。此后，他和夫人基尼亚·诺贝尔历经千难万险，终于逃离德国，来到了避难地上海。在此前后，不少德国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也逃离纳粹魔掌来到了上海，他认识的就有上百人。

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环境后，一些互相比较熟悉的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开始经常聚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并交流信息，逐步形成了一个反纳粹地下小组。小组的成员有20～30人，都是犹太难民。小组虽然具有强烈的反纳粹立场，但没能与德国的反纳粹地下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也难以开展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抵抗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习和交流信息。

不过，小组的某些成员自己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如小组的创建人汉斯·希伯（Hans Shippe）是著名记者，德共党员，后来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于1941年11月牺牲在山东的抗日战场。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这几个大字。小组的领导人之一瓦尔特·祖列克（Walter Czollek）也通过参加中国革命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Jacob Rosenfeld）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小组的核心人物汉斯·克尼格（Hans Konig）等5人与苏联建立了联系，其中也包括岗特·诺贝尔的夫人基尼亚·诺贝尔。他们后来为苏联塔斯社工作，积极向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直到1941年6月，该小组的任务仍然是以发展队伍以

及为成员提供教育为主，他们也为从上海返回欧洲后能立即投入到有效工作之中做了充分的准备。德国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政治局势，这一事件促使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左翼团体成员通过口头讨论和写作等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即纳粹在战争开始时的胜利只是其最后崩溃的前奏。苏联塔斯社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广播站。自1941年夏末，塔斯社开始以四种语言（俄语，英语，中文，德语）播报重要信息，例如前线的每日战报，反希特勒同盟领导人的演讲，军事和政治形势分析，战争进程评论等。来自德国的犹太共产党员积极参与了德语节目的录制工作。该小组的汉斯·克尼格还为塔斯社撰写了一些关于政治、军事事件的评论。包括岗特·诺贝尔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也试图向苏联驻沪领事馆申请加入苏联红军以抗击法西斯，但这些请求由于犹太人的敏感身份以及当时复杂的环境而被苏联方面拒绝了。

1943年进入虹口隔离区后，小组继续进行定期聚会，交流盟军取得胜利的好消息。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和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传来，小组成员欢欣鼓舞。8月6日，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在上海流传，几天后日本人便投降了。1945年9月后，纳粹大屠杀的可怕内幕不断从欧洲传来，令小组成员十分震惊。与大多数在华犹太难民不愿再回欧洲定居不同，这些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还是想回德国。他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的新德国，在中国的避难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以小组成员为核心，近300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汇聚在一起，经过反复磋商，决定返回德国。

1947年8月，他们告别了上海和中国人民，踏上了返国之

途。1947年8月21日，295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及其家属抵达柏林。他们是来华犹太难民中极少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返回前民主德国的数百人群体。在柏林车站，他们受到了盛大的、热烈的欢迎。1988年，邓小平同志邀请曾参加过中国革命的德国共产党老同志再访中国，诺贝尔夫妇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访华团。

来自波兰和捷克的犹太难民

波兰犹太难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1941年10月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A.奥本海姆在致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负责人斯皮尔曼的信中就曾指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宗教习惯、性格、语言方面所受的教育与其他难民全然不同，我不想说他们优于或劣于其他人，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因而必须单独组成一个团体。"[1]事实确是如此。波兰犹太难民虽然没有建立正式的社区组织，但他们始终抱成一团，在一起活动时讲波兰语，与德国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之间总是存有无形的界线。当日本当局强迫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虹口隔离区时，只有波兰犹太难民出来抵制，理由是他们与德奥犹太人不同，并非"无国籍难民"，因为波兰流亡政府还在活动。后来他们虽然不得不迁入隔离区，但这次抵制行动显示了波兰犹太人的独特性。波兰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也表现出独立性，体现了真正的犹太教正统派，特别是哈西德派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特色。同时，密尔经学院及其他经学院的400多名学生和拉比们在一向冷清的阿哈龙会堂坚持攻读。结果，著名的密尔经学院没有像其他经学院那样被纳粹摧毁，反而在上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战后在耶路撒冷和纽约布鲁克林重建奠定了基础，以至人

1_Kranzler, David, *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 New York, 1976. 戴维·克兰茨勒著:《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纽约，1976年版，第219页。

们至今仍称颂上海在保护犹太正统派教育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也在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中形成一个小团体。他们大多是“捷克斯洛伐克俱乐部”的成员，忠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意思的是，他们大都保留着旧的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来上海途中经过英国管辖地区时，他们就出示捷克斯洛伐克护照，结果避免了持德国护照引起的误会和麻烦。关于在沪捷克斯洛伐克犹太难民的人数，有着不同的说法。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犹太难民在回忆录中写道：“大约有40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1]不过，近年来捷克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对战时在沪捷克斯洛伐克犹太难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得出结论是人数约为100人[2]。据笔者判断，后一个数字基于深入研究，应该更为准确。

在大批中欧犹太难民中，还有一些人是具有犹太血统和部分犹太血统，但已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同样得到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等组织的援助。同时，这些非犹太教的犹太难民也在各种救济活动中发挥了作用。他们通过与美国基督教救济组织的联系，为上海犹太难民募集了一部分救援资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还建立了几个独立的团体，如上海希伯来布道会、贵格会（公谊会）、天主教难民委员会、中欧新教徒联合会等。

（本文摘自潘光、王健著《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此次刊发作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1_约瑟夫·舒霍夫（Joseph Schulhof）：“中国九年”（Nine Years in China）。舒霍夫是战时从捷克斯洛伐克来沪避难的犹太难民，这是他的个人回忆录，由舒霍夫家属提供给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2_这是捷克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赫列娜·科列科娃（Helena Krejcova）教授访问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时提供的数字。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

威廉 · 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

一

犹太难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维持最起码的生存。他们逃脱了纳粹的集中营和毒气炉，但如今面对着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谋生的问题。

在上海登陆的难民中，很多人实际上身无分文。他们没有亲戚或朋友；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它的居民一无所知——事实上，很多人只是凭一时冲动才决定来上海的。如果不是因为迅速采取的援助行动，我毫不怀疑数百——或许甚至数千——难民将会死去。

按照西方的标准，上海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机构。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在街上乞讨，有的在冬天默默地死于严寒。白俄和葡萄牙人社区有很小的赈济组织来帮助它们自己的穷人。在难民到来之前，几乎没有欧洲人处于贫困之中。

当难民最初开始涌入时，长期居住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来帮助他们，但委员会相对贫乏的资源很快就被用尽了，因此正规的犹太人救济机构，像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及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AS) 等取代它做了很多工作。

最初，委员会曾为难民们寻找住房，但是在"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1]邮轮一次次卸下数百名孤立无助的难民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有财力的难民只得自己寻找住房，较富裕的难民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搞到了房间或公寓套房，较贫穷的难民被迫越过苏州河在日租界[2]的虹口定居，那里的房租更低。虹口在1937年中日淞沪战役中被日本飞机大肆轰炸，1938年年底我们到达上海时，虹口的很多地方已成废墟，几乎空无一人。不久，新的房屋建成以供难民居住。

当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大约是10美元。我的双亲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过着较为奢华的生活，在公共租界有一处公寓套房，甚至有钱去青岛等旅游胜地避暑。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3]后，在过去曾是中国人的学校里获得了一间小单间。我们在这个又小（9英尺×12英尺）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它被美国轰炸机摧毁为止，再搬入一间更小的房间。不用说，我们的房间没有独用浴室或厨房，甚至独用的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也没有自来水笼头。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作"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把它们当肥料卖掉。这幢建筑物也有一个公共淋浴设备，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里使用，大部分人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小盆洗澡。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炉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扇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至少在较贫困的地区）。

1_运送犹太难民来上海的意大利轮船。

2_旧上海并无正式的日租界，虹口只是日本人的一个聚居区。

3_指正常房租外加付的不合理费用。

夏天气候炎热，我们没有空调器和电扇，穿着最少的衣服，但很快就因出汗而湿透，不得不一天换几次。冬天极冷。我们买了一个大肚盆状的小炉子，但燃料昂贵，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使用它。幸运的是，我们的楼里有电，但它只能用来照明，而日本人则经常切断电源实施灯火管制。

食物极其不足且昂贵，常有无数极端营养不良的病人。买新衣实际上已不可能，大多数人不得不穿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衣服，很快就衣衫褴褛，甚至时常可见一些更穷的难民在冬天用破布裹脚，并把报纸塞在衬衣里。

还有数千名难民完全孤立无援，一无所有，委员会——得到来自维克托·沙逊爵士和其他富裕的西方侨民的赞助（包括非犹太人）——建立了难民营。难民营由匆匆改造和重建的学校、仓库、兵营等拼凑而成。几十户人家挤在通风不良的小宿舍里，每个家庭要为自己及其财物划出几平方英尺，不断有划界纠纷，邻居们对一英寸地皮的争执，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的房屋所有人争夺后院篱笆的界线。

随后委员会被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取代，创办了临时厨房，供8 000多人每天一餐，孩子们则多喝一瓶牛奶。

许多难民自己谋生，他们向富裕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兜售从牙刷到鞋带等各类东西，随着他们的人数日趋增加，生意就很难做了，最后只有很少几个人才能够用这种方式谋得足够的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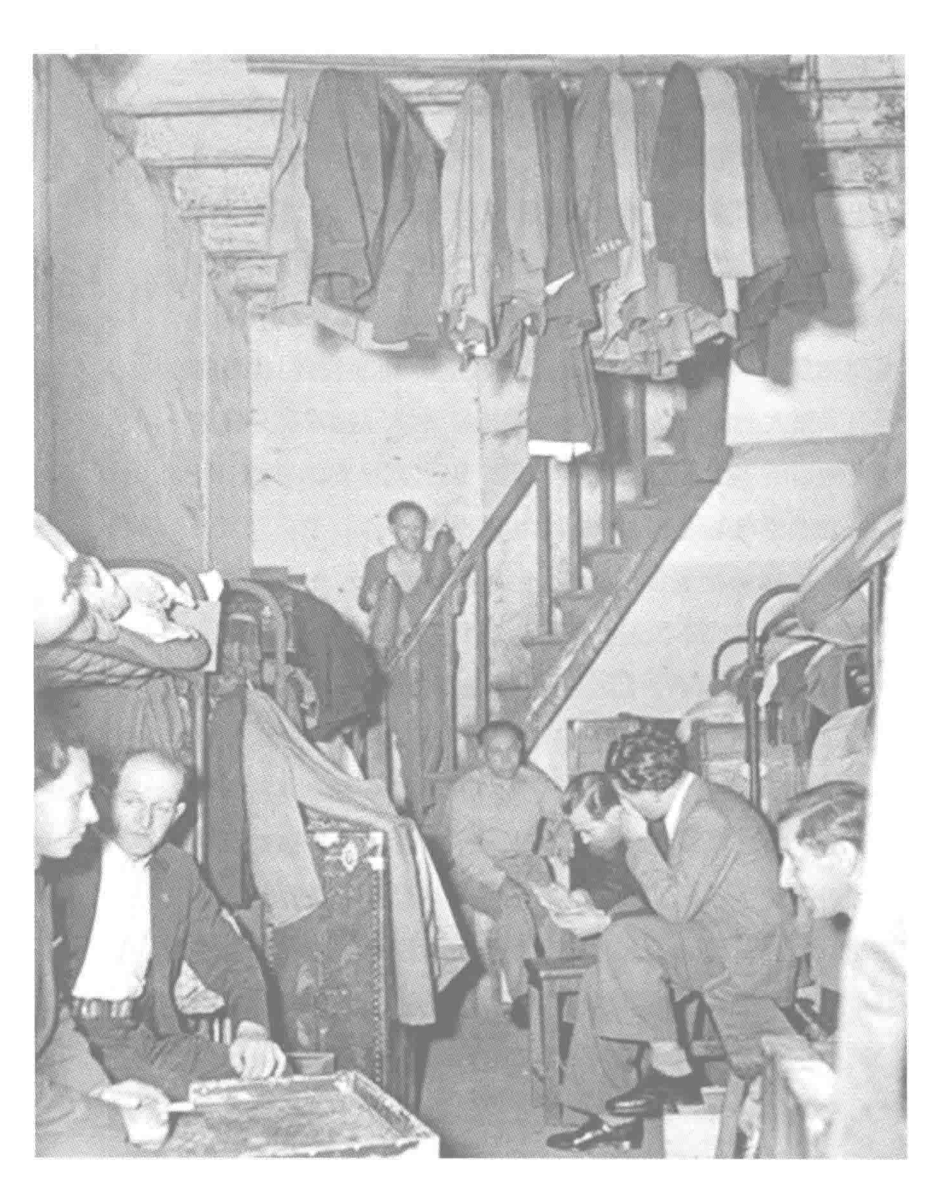
绝大多数难民仍留在虹口，他们修复了数十个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虹口开始呈现出德国或奥地利小城市的外观，数百家店铺开张了，大部分迎合难民顾客的需要，其中有杂货店、药房、面包店、水管铺、锁匠铺、理发店、裁缝店、修鞋铺、女帽商店等。当然也有不可缺少的维

也纳式“咖啡屋”，没有它们，普通的维也纳人会感到难以生存。一些具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工厂，出产诸如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的产品，以及特具欧洲风格的食品——腊肠、糖果、软饮料等，其中不少产品在中国人中也很畅销。

医生包括牙医开办了小诊所，营业相当不错，尽管他们人数过多，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很多医生都是犹太人。工程师和建筑师在重建虹口方面出了很多力，但他们找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无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一些人变成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很多人被迫在难民营里从事社区事务活动。

到1941年年底，犹太难民已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取得惊人成就的社区，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估计至少1/3的人能在上海定居。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恶化了，难民的经济状况再次变得极为困难。日本人接管了整个城市，在花了一年时间学会管理这一复杂的大都市后，决定拘留所有的盟国公民，包括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侨民。他们不知怎样对待犹太难民。一方面，这些犹太人显然是反轴心国的，至少在感情上是同盟国的支持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同盟国的人，不能被安置在拘留营里。战后发现，上海的德国纳粹分子曾就如何处置犹太难民提出了建议，包括使用毒气炉和焚尸炉之类手段[1]。幸运的是，日本人拒绝采用这类措施。如前所述，他们最终决定将所有在1937年以后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集中到虹口的隔离区里。隔离区被铁丝网和哨兵团团围住，全体犹太人都被禁止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监禁乃至处死。难民们处于类似被拘留的不正常状况之中。

1_这里提到的就是纳粹派来上海的梅辛格上校向日本人提出的屠杀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



拥挤不堪的犹太难民住处

几百名在市里有工作或营业机构的难民被准许白天离开居留区，他们必须带上特别的徽章和通行证，每几周更换一次。负责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官员合屋是喜怒无常的虐待狂，他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国王”，是虹口最可畏的人，他对那些要更换通行证的难民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屈辱简直难以描述。

塞法迪犹太人当然像英国公民一样被拘留，但俄国犹太人却争取到过着相对不受干扰的生活，可以不住在隔离区里。据说他们为了得到不受干涉的特别许可，向日本人支付了巨额的金钱，不管怎样，他们住在隔离区外就是幸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美国的汇款被切断了，数千难民处境危险。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驻上海代表只能在俄国犹太人和其他未被拘留的外国人中募集钱款。这些借款——战后它们与大量利息一起被迅速付还——帮助维持了数千名难民的生存，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二

各种救济委员会是犹太人所有政治组织的核心，往往被日本当局视为犹太社区的正式代表。每个难民营有自己选出的官员，也有自己的准警察力量，通称Heim Polizei[1]，职责是维持秩序和纪律。住在难民营外面的难民往往组成自己的小行政单位。我们住过的那所旧学校里的居民，就选出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自己，其他地区的社团也同样如此。还有仲裁法庭，试图在不求助于日本当局的情况下，用友好的方式解决内部纠纷。

然而没有社区政府，当然也没有社区范围内的选举。日本人让难民们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不能妨碍他们的计划。

1. 德文的“家园警察”之意。

日本当局挑选一些著名的社区领袖，利用他们控制整个团体的活动。这些领袖不得不帮助日本人组织专门的犹太人巡逻队，在隔离区内值班放哨，确保他们的同胞不得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离开隔离区。另外，建立了防空袭民防队和担架队，1945年7月遭轰炸时，它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人认为犹太隔离区的存在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益处。他们估计美国人对轰炸隔离区会有所顾忌，因此，他们在隔离区堆积军火，存放油料，安置无线电发射台，驻扎军队等。显而易见，他们太过分了，战争结束前不久，一直小心翼翼避开虹口的美国人最终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多次空袭，许多房屋（包括我们自己的）被毁坏，一些难民（加上数百名中国人）丧生。

三

如前所述，大多数难民来自中产阶级和低薪阶层，他们被迫混在一起。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坚持保留他们的旧头衔，衣衫褴褛的报贩被尊称为“博士”，一位穿着破旧的老人坚持要人们以贵族头衔称呼他。

尽管有相当多的内部摩擦，但大体来说，犹太社区显示出惊人的团结。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经常互相争吵，也时常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瞧不起的波兰籍犹太人。但有吵架和斗殴的双方一般不去求助于日本或中国当局，而是由难民仲裁法庭解决。人们实际上表现得非常克制。远离祖国，正为勉强维持生存奋斗，还遭美国人的轰炸，犹太人依然保持了明显的稳定和平静。

大多数难民认为他们在上海逗留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临时插曲，他们仅仅是为了能够漂泊到美国、澳大利亚，或重返

欧洲而活着。他们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战争，尽管大部分新闻由日本人的宣传机构传播，但他们几乎可以凭本能得知什么时候同盟国又赢得了一场大胜仗。

犹太社区拥有一份日报——《上海犹太早报》，该报登载本地新闻和日本当局准许印行的国际新闻。一些难民拥有收音机，他们经常收听由日本人控制的英语电台，也从上海的一家苏联电台中收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俄国与日本没有交战，日本人被迫允许这家电台广播。收听短波被严厉禁止，但有一些胆大的人仍在偷听，并将好消息秘密传给他人。虹口商业中心舟山路以“小道消息之弄”而著称，自然，最流行的小道消息之一便是“战争结束了”，而且有一天它终于成了现实——战争结束了！但小道消息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7月我们离开上海时，制造小道消息仍是犹太社区的主要行业之一。

四

难民中有一些反希特勒的基督教徒，还有非犹太人妻子和孩子[1]，极少数难民改信了天主教和新教，并从传教士那里领取一些额外的救济金。

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犹太会堂，很难说是他们缺乏宗教热情，或是因为贫困，或两者兼而有之。原因在于，较正统的犹太人可以使用在这个地区的俄国犹太人小会堂，而改革派[2]的信徒在学校礼堂、会议厅等地聚会。总体上来看，宗教好像在社区里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

一个例外是波兰籍犹太人。他们大多数依然是纯粹的正统派，保持着若干经学院和学校，其中有一个经学院据说

1_按正统派犹太教法规，母亲如果不是犹太人，即使父亲是犹太人，其子女也不是犹太人。

2_指反对严格遵循犹太教规的犹太人。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经学院，500名师生作为一个整体从波兰一路过来，到达上海时没有丢失一个学生、教师或书本，甚至连一堂课也没漏掉。他们刚到上海就马上建起了学校，并继续教学，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1]。

五

1938年，上海有许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学校及大学。其中有一所上海犹太学校，由塞法迪和俄国犹太社区共同建立，学校位于市中心，有一个英国籍校长和很多英国籍教师，并严格按照英国方式管理，即使战争期间英国籍教职员工被拘留，不得不由讲英语的俄籍教员代替时也是如此。

来到上海的第一批犹太难民，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上海犹太学校读书。但当数千名难民开始涌入虹口时，显然需要一所难民自己的学校。在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嘉道理的资助下，虹口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大部分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2]。教师全部来自难民，用英语上课，英语很快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二母语。学校具有很高的欧式学术水准，太平洋战争期间，处于日本人监督之下，学校还是保持了这个水准。

除了这所初等和中等合一的学校外，难民们也创办了许多小的成人职业学校。当然，他们从未建立过大学，但据我看，犹太社区如果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准会办到这一点的。

六

对难民来说，可以忍受艰苦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较多形式的娱乐活动。

1_此处提及的即来自波兰的米尔经学院。

2_即霍瑞斯·嘉道理创办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

虹口有三四家中国人开的电影院，专放美国影片，难民们立即光顾。他们不仅渴望娱乐，还渴望有机会学英语。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影片当然被禁，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老片子还是使人得到相当令人愉快的享受。

难民中有许多专业演员，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这些人很快就组织了剧团。音乐家创办了管乐队和管弦乐团，几位歌唱家甚至还组建了一个轻歌剧团，上演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小歌剧。

当然，到处都有咖啡馆和桥牌俱乐部，甚至还有夜总会，其中一个设在虹口最高建筑物之一的屋顶平台上，在酷暑时期是个好去处。然而没有像样的酒吧或街角小酒馆，一直到战后，才有几家开业，以迎合美国大兵的需要。

在这人紧挨着人，十分拥挤的社区里，必然有大量的家庭娱乐，谈话艺术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由于缺乏食物，女主人通常只提供开水，客人们则自带咖啡（或代用品）、茶叶、糖或糖精。

难民们到后不久就组建了足球队，几个月后还建立了三区业余足球联合会，每年举办一次联赛，中国和其他外国球队也参加比赛，热情的观众可达数千。流行运动还有拳击、乒乓球，少数人打网球和棒球。

社区没有公共图书馆，一些有创业精神的难民却搜集了一小批图书，建立了流通图书馆，年轻人——如我个人经历过的那样——把交换连环画搞得十分红火。

七

总的来说，与中国人的关系相当好。当然，发生过中国人骂难民的事情。但我深信，这些中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反

犹主义的煽动，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对白人进行报复，他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统治下曾不得不忍受耻辱。起初，我们家较宽裕时，雇用了一名中国男仆，一名“阿妈”(保姆)，乃至一名干钟点活的黄包车夫，但太平洋战争一开始，这些奢华就完结了。大多数难民从未与上层中国人接触，他们生存的紧迫需要迫使他们平等地与下层的中国人(他们的邻居和顾客)相处。尽管他们与中国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却很少有几个难民真正熟悉他们。尽管许多人确实学会了几句必需的单词和短语，我猜只有不到1%的人学会了正确地讲中文。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学会了如何读写中文。大部分难民在试图掌握英语方面遇到了相当的麻烦，英语在这座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里是更重要的一种语言。与难民相反，很多中国人倒学会了讲流利的德语。虽然历史上中国人总是融合了入侵者和移民，但这次却是他们极大地吸收了难民的风俗和品质，反过来，难民们却没有那么做。不过，难民社区毕竟只存在了几年，所以我认为根据这点无法改变上述论断。

(威廉·肖特曼本人是犹太难民，战后在美国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而且一直积极研究上海犹太难民社区，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本文摘译自威廉·肖特曼的《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报告》〔*Report on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in Shanghai*, January 1954〕，感谢他将这份报告提供给我们。另有部分内容源于本书主编对肖特曼本人的采访。此次刊发编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上海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活动

虞卫东

从1937年到1945年，正是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抗战时期的8年。在这一阶段前期，由于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上海锡安主义队伍骤然扩大，一时间成了远东锡安主义活动的中心。到该阶段后期，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不但使数百万欧洲犹太人惨遭杀戮，也使上海的犹太社团面临严重威胁。作为上海犹太人中较有组织的力量，锡安主义团体成了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上海犹太人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坚，并积极参与了反法西斯斗争。

犹太难民来沪之前的上海锡安主义运动

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三年后，就在上海建立了以伊利·嘉道理为首的支持锡安主义事业的基金组织。1903年，上海犹太人成立了"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由N.E.B.埃兹拉担任秘书长。1904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机关报，英文月刊《以色列信使报》创办，由埃兹拉兼任主编。《以色列信使报》在发刊词中宣称自己是"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的官方喉舌"[1]。这

1_见《以色列信使报》报头栏。

家报纸以宣传介绍锡安主义运动、报道上海犹太社团的活动为主，在中国及远东乃至全世界的犹太人中都颇有影响。

1917年，在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亲英派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决定支持锡安主义运动。是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籍犹太富商，锡安主义活动家罗思柴尔德勋爵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1]这就是标志英美等协约国列强正式承认并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贝尔福宣言"。该宣言的发表使世界各地的锡安主义组织大受鼓舞，"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不久，埃兹拉以《以色列信使报》主编的名义致信中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支持锡安主义运动。他的大胆行动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录于1918年12月4日致信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伊利·嘉道理，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尊重"贝尔福宣言"的精神。该信原文为："本国政府对于贵会之此种愿望（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引者注）与英国政府取一致之态度。"[2]

埃兹拉取得的最大胜利则是收到了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一封复信。孙中山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埃兹拉先生阁下：

我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您的来信和《以色列信使报》。我希望您能确信，我对这场运动——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一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

1_ J.C. Hurewr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Princeton, 1956, p 26.

2_ 锡安主义中央档案馆（Central Zionist Archives）：文献Z4/2039号，耶路撒冷。

个光荣的地位。

孙逸仙

1920年4月24日于上海[1]

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更多俄罗斯犹太人经海参崴、哈尔滨、天津等地辗转来到上海，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的队伍迅速扩大。这样一来，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内部的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大增，以前由塞法迪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改变。俄国锡安主义分子在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内部一直具有相对独立性，后来逐步组成了阿斯肯那齐锡安主义团体“卡迪玛”(Kadimah)[2]组织。相对“卡迪玛”而言，塞法迪锡安主义分子的团体往往由于埃兹拉的声望而被称为“埃兹拉”组织。1928年，来自另一个塞法迪犹太家族的R.E.托依格夫人(Mrs.Raymond Elias Toeg)接替嘉道理担任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次年，托依格夫人和埃兹拉应当时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灵柩重新安葬仪式，这颇具象征性地显示了锡安主义运动在上海乃至中国已具有公认的地位和影响。

从1929年到1937年，由于受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内部歧见和争吵的影响[3]，上海锡安主义运动也经历了一个内部分化、改组的时期。来自俄国的锡安主义分子因其特殊的经历而比较倾向于修正派。1929年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名叫“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的团体，可能是世界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分支。到1931年，世界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的青年组织“贝塔”(Betar)[4]在上海建立了分支，上海的锡安主义修正派运动才开始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在上海“贝塔”的积极努力下，上海万国商团内于1932

1_根据英文原信译出。可参阅《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6—257页。

2_卡迪玛(Kadimah)，既有“向东方”之意，又有“前进”之意，原系欧洲锡安主义青年学生的组织，后不少阿斯肯那齐锡安主义组织也采用此名。上海的卡迪玛组织也称为上海锡安主义组织(Shanghai Zionist Organization)。

3_主要指锡安主义内部修正派与正统派之间的争论。

4_贝塔(Betar)是“特鲁姆佩尔道联盟”(Berit Trumpeldor)的缩写。原是纪念早期犹太军事指挥官特鲁姆佩尔道的团体，后发展为世界各地锡安主义修正派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文体活动和军事训练。

年正式建立了犹太分队，主要由受过军训的“贝塔”成员组成。当锡安主义修正派在上海逐步发展力量的时候，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其他一些派别（组织）的分支也在上海纷纷出现。如宗教锡安主义组织“精神中心党”(Mizrachi)，从反对复国转向接受复国的以色列正教党(Agudat Israel)，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锡安工人党(Poalei Zion)，左翼锡安工人党等都属此列，但它们的分支大多在上海只是打出旗号，并无什么积极活动。

犹太难民积极参加上海锡安主义活动并建立自己的组织

1933年后，就有从希特勒德国来的犹太移民陆续到达上海。从1937年到1941年，涌入上海的德国、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国家的犹太难民形成难以阻拦的潮流，总数近3万人。在来沪的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是锡安主义分子或同情者，其中不少青年人还是“贝塔”的成员或持修正派观点。即使那些原来不赞同锡安主义思想的人，在经历了纳粹如此野蛮的迫害、驱赶和屠杀后，也逐渐接受了锡安主义的一些主张。因此，犹太难民中的许多人一到上海就参加了锡安主义组织或各类锡安主义活动，既希望依靠锡安主义团体的力量来维持生存，又为了在精神上寻求寄托。

由于他们大都是阿斯肯那齐犹太人，所以一般都参加了阿斯肯那齐锡安主义团体的活动。上海的“卡迪玛”组织本来一直以俄语为主，英语为辅开展活动，但1937年后由于大批德奥犹太难民的加入而成立了一个德语分部。该分部成员均系德奥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分子，负责人是B.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和O.莱温(Ossie Lewin)[1]。同时，“贝

1_Kranzler, David, *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 New York, 1976. 戴维·克兰茨勒著:《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纽约，1976年版，第244页。

塔”也为新加入的讲德语的青年们建立了一个分部，该分部设在虹口华德路犹太会堂内，主要以德语开展活动，成员有300多人。[1]

1939年9月9日，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锡安主义组织——“西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AZO “Theodor Herzl”）。创建人有J.瓦赫特尔（Jacob Wachtel）、O. 科里茨考纳（Otto Koritschoner）等。该组织总部设在虹口，并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建立了分部，仅在一年之内就发展会员2 000多人[2]，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塞法迪锡安主义团体和俄国锡安主义团体。

来自波兰的1 000余名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间陆续到达上海，其中有100余名锡安主义分子。他们几乎代表了锡安主义运动内部的所有派别，有些人如伊鲁托维奇（L.Ilutovich）、伯格曼（S.Bergman）、多伯基勒（Y.Dobekirer）等都是波兰和东欧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活动家。除了这100多人外，其他波兰犹太难民也普遍同情锡安主义运动。这股波兰锡安主义力量注入上海锡安主义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实力。

犹太难民锡安主义组织的分分合合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使锡安主义运动内部由来已久的歧见进一步激化，主要围绕两个问题：① 是否要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联合英国；② 在世界大战条件下如何推进锡安主义运动。

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同样因这些问题产生了争论，而且还在如何看待日本当局、怎样在上海的特殊环境里开展锡安主义活动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由于这些歧见，“西

1_《贝塔在中国1929—1949，贝塔50周年纪念文集（1923—1973）》（*Betar in China* 1929—1949, *Commemorative Anthology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Betar* 1923—1973），以色列，1973年版，第87页。

2_前引克兰茨勒书，第244页。

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于1941年发生分裂，一部分成员退出该会，另外组织了“锡安人”(Zion Zioni)和锡安主义协会(Zionist Association)两个团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租界，将英、美等国公民作为“敌侨”对待，这对以英籍犹太人为主的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使其处于瘫痪状态而难以开展活动。

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后，德、奥籍锡安主义分子也陷入了困境，但又使他们团结起来。在进入所谓的隔离区后，“西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锡安人”和锡安主义协会又联合成一个组织，起名为锡安主义组织(上海)(Zionist Organization Shanghai)，选举P.帕纳斯(P. Parnes)为主席。由于当时日本与苏联没有打仗，俄罗斯犹太人的锡安主义组织仍能在上海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

中国抗战期间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主要活动

在这8年里，包括犹太难民锡安主义组织在内的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力救助犹太难民。由于各锡安主义团体均有严密的组织、固定的成员和较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在救助来沪犹太难民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犹太难民初抵上海时，塞法迪锡安主义分子立即号召整个犹太社团行动起来救助受难同胞。如前已提到，上海各界首次讨论救助犹太难民事宜的会议，就是由伊利·嘉道理之子霍瑞斯·嘉道理于1938年10月召集的。嘉道理家族还捐了大笔钱款在虹口办了一所专门免费接收难民子女的学校。俄国锡安主义团体虽然不如塞法迪团体那样财大气

粗，但它们人数多，活动能力强，做了大量细致、繁杂的具体工作。前述1941年在上海建立了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俄国锡安主义分子在其中就起了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建立后，俄国锡安主义团体更利用其合法地位发挥了其他锡安主义组织所无法发挥的作用。当然，德、奥、波犹太难民自己的锡安主义团体建立后，在组织难民团结互助、共同奋斗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其二，办了一批宣传锡安主义的报纸杂志，为上海犹太社团（特别是犹太难民）提供了精神食粮。1937年后，上海犹太社团人数剧增，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犹太人办的报纸便应运而生，其中办得比较出色的是几种锡安主义报刊。由D.拉宾诺维奇创办并任主编的《我们的生活》（*Our Life*）周刊，以俄、英、意第绪语三种文字出版，1941年后在上海犹太人（特别是俄国犹太人）中影响较大，一直积极宣传锡安主义思想。由O.莱温任主编的《上海犹太纪事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也是一份影响较大的持锡安主义观点的报纸，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行，在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中颇受欢迎。其他如《黄报》（*Die Gelbe Post*）、《上海周报》（*Shanghai Woche*，后改为《8点钟晚报》— *8 Uhr Abendblatt*）、《上海邮报》（*The Shanghai Post*）、《言报》（*Das Wort*）、《我们的世界》（*Unser Welt*）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锡安主义色彩。1943年7—10月，在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还出现过秘密印刷的德语刊物《新闻》（*Davar*），在犹太难民中宣传锡安主义和反法西斯思想。

其三，组织或参加与国际锡安主义运动协调一致的政治活动。如1937年年底派代表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远东犹

1_《上海犹太纪事报》在二战后改名为《上海回声》（*Shanghai Echo*）。



上海锡安主义组织创办的英俄文双周刊《斗争》

太人大会的各项活动。又如1940年贾波丁斯基逝世，上海各锡安主义修正派组织均举行了悼念活动，并利用此机会宣传贾波丁斯基[1]的思想。不过，在日本占领租界后，上海各锡安主义组织与外部锡安主义运动的联系基本中断，同时因形势所迫也难以再开展政治色彩较浓的活动，于是不得不将活动重点转向文化体育领域。

其四，在上海犹太青年中积极组织文体活动，增强了犹太社区的凝聚力。如前所述，上海"贝塔"一直致力于组织犹太青年参加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大批难民涌入后，参加"贝塔"此类活动的人逐渐增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活动的军事色彩越来越浓。1941年12月日军占领全上海后，特别是1943年2月建立虹口隔离区后，以俄国锡安主义分子为主的"贝塔"及其德语分部仍能坚持组织这方面的活动。不过，为避免招致日本当局的怀疑和干预，军事训练不得不秘密进行，在公开场合则主要举办体育比赛（如足球、网球、游泳等）和文娱活动（如周末舞会、业余音乐会、演出意第绪戏剧等）。有一段时期，"贝塔"还为难民中的青壮年举办职业培训、文化补习，特别是组织他们学习犹太文化宗教知识和希伯来文、意第绪文。这些活动，无疑加强了使处于艰难困苦中的犹太社团能够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尾　声

1945年7月17日，美国飞机在轰炸上海日军设施时误炸了虹口犹太难民区，锡安主义组织（上海）在虹口"匈牙利餐馆"的总部也被炸毁[2]，这可能是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在整个战争年代遭受的最后一次打击。一个月后，日本宣布

1_贾波丁斯基是锡安主义修正派的领袖。

2_参见格伦伯格（F.Gruenberger）："上海犹太难民"（Shanghai Jewish Refugees），载《犹太社会研究》第12卷（*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12），第344页。

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从1945年到1949年，由于巴勒斯坦形势的急剧发展和以色列国的建立，也由于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大多数犹太人陆续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上海锡安主义运动逐步将活动重心移出上海（以及全中国），转向以色列、美国等主要犹太人聚居国，并最终结束了在上海和中国的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是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发表多篇研究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文章，感谢他向本书提供这篇论文。此次刊发作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并增加了小标题。）

《上海犹太纪事报》[1]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

饶立华

作为一份报纸,《上海犹太纪事报》在犹太隔离区的社会作用怎样?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作用是如何发挥的?通过对《上海犹太纪事报》的内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犹太纪事报》是犹太隔离区民族性的集中体现,是犹太难民自治的舆论代表,是犹太难民瞭望外部世界的信息窗口,同时是犹太隔离区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隔离区犹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 (Communication) 与社区 (Community) 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上海犹太纪事报》作为难民报纸——犹太难民社会的大众传播——是犹太难民社区社会性和整体性的自觉表现,它的存在加强了犹太难民的民族意识,弘扬了民族传统,使犹太难民形成具有社会整体性的完全意义上的犹太社区。

1_《上海犹太纪事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又称《上海犹太早报》,由上海犹太难民创办的德文报纸。原是一张周报,1939年5月5日改为每日出版的早报。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11月改名为《上海回声报》(*Shanghai Echo*),一直办到1949年上海解放,是历时最长的德文犹太报纸。奥西·莱温 (Ossie Lewin) 任该报主编。

从传播的角度看，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一共通的意义空间从狭义上讲是指传受双方使用共同的语言，从广义上讲，是指传受双方有大体一致的生活经验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当成千上万的德、奥犹太难民逃到上海，这一特定的社会人群不仅使用同一种语言——德语，而且由于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共同语言的社会共同体，这一社会共同体最本质的特征，是犹太民族意识。

犹太人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犹太教创立之初就规定，向上帝祈祷的最少法定人数为10人，当10个人共同祈祷时，上帝就在人们中间。犹太教认为，在上帝眼中，犹太民族是一个整体，犹太人在祈祷时不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我，而是使用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如果有人违背了上帝的“约法”，上帝的惩罚往往降临到全体犹太人头上。在两千年的流亡历史中，因为一个犹太人被认为有罪而祸及整个犹太区的情形屡见不鲜，包括1938年11月9日的“碎玻璃之夜”，德国纳粹在全德国对犹太人大打出手，就是以德国犹太青年格林斯潘开枪打死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为理由发动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压迫力的互相作用，使民族意识和民族责任感成为联结犹太人的坚韧的道义纽带。

在犹太难民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上海犹太难民报刊生气勃勃。难民报纸的出版，在犹太难民社区形成浓郁的犹太氛围，产生具有很强约束力的群体规范和群体价值——难民社区不成文的律法和行为规范，成为犹太难民社区的“社会语言”。在隔离区时期，由于居住集中，联系紧密和外界压迫力的作用，情形更是如此。隔离区中的《上海犹太纪事报》不遗余力地激发犹太难民的民族感情，呼唤民族觉

醒，呼唤民族意识的回归，在犹太难民心理脆弱、心灵疲惫的时刻，以传统的民族英雄主义激发犹太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如果没有《上海犹太纪事报》，没有《上海犹太纪事报》立足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所阐发的“命运共同体”的社区舆论，隔离区的自治和隔离区中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使人叹为观止的救济工作是难以维持的。

在犹太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摧残的历史时刻，犹太民族性的最高表现是对民族复兴理想的憧憬和追求，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上海犹太纪事报》在犹太复国政治形势晦暗不明，犹太难民面临沉沦边缘的时刻，以坚定而富有感召力的声音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主张；报道巴勒斯坦、世界各地和隔离区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针对犹太难民的特点——德、奥犹太人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清算“同化运动”对犹太民族性的有害影响；通过对法西斯反犹理论和反犹政策的报道警示犹太人放弃幻想，认清犹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战场遥相呼应，鼓舞和激励犹太人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成为上海犹太难民流亡生活中犹太民族复兴理想的一面旗帜。

《上海犹太纪事报》作为犹太难民民族性的集中体现，成为隔离区思想和精神上的中心，极大地增加了犹太难民社区的凝聚力。

第二节　隔离区犹太难民自治的舆论代表

在隔离区时期，由于统一的领导机构——重新组建的犹太协会的出现，在隔离区内形成了犹太难民的自治，《上海犹太纪事报》作为犹太难民社区的信息总汇和神经中枢，



Jahreswende - Schicksalswende

Gott im Herzen und hoffnungsfroh in die Zukunft blickend, zieht das juedische Volk ein in das neue Jahr. Ueber alle Weltteile zerstreut, eint sie am Rosch Haschanah der gleiche Gedanke: Gottes Walten fuer ein guetiges Geschick zu erflehen.

Durch ein grausames Schicksal wurde unsere Generation zum Volk der neuen Wuestenwanderung, aber dieser dornenvolle Wanderweg wird ebenso wie einst in die Freiheit fuehren und in allem Gebraus der Zeit erhebt sich die gebieterische Forderung, Standhaftigkeit und Hoffnung zu bewahren.

Dass diese Hoffnung berechtigt ist, beweist unsere juedische Geschichte, die eine Kette leidvoller Ereignisse bildet. Aber niemals konnte unser Geschick so duester, wie unser Volk so schwach und unser Feind so maechtig sein, als dass wir uns nicht wieder erhoben zum Zeichen jener goettlichen Macht, die Israel ewig sein laesst.

Dieses Bewusstsein, diese Hoffnung praegen die heilige Weihe des heutigen Rosch Haschanah und erneuern im aufgewuehlten Gemuet die seelische Substanz des Ausharrens auf ein besseres Geschick und ein gluecklicheres Los.

Aus der Unruhe des Zeitgeschehens darf jedoch keine Verhaertung des Herzens erfolgen, sondern es muss das Gefuehl der Gemeinsamkeit und der Verantwortung unser Bewusstsein staerken und uns zu einer starken Hand zusammenschweissen, die erfolgreich zur Bewaeltigung unserer Probleme operieren kann.

Daher wollen wir beim Eingang in das neue Jahr diesmal keinen Rueckblick werfen, sondern Ausschau halten nach einer Vollendung unserer positiven Kraefte. Ein neues Jahr steht vor uns, hoffentlich ein besseres, ein lichtvolleres, aber es enthaelt seine Forderungen an jeden Einzelnen von uns, Forderungen sozialer Natur, Forderungen, die unseren Gemeinschaftssinn betreffen und uns zur positiven Mitarbeit, wie es das Gesamtinteresse der Emigration erfordert, aufrufen. Diese Forderungen treten dem persoenlichen Egoismus entgegen und gerade Rosch Haschanah ist so sehr dazu angetan, sich Rechenschaft darueber abzulegen und jeden krassen persoenlichen Egoismus im Sinne der Gesamtinteressen unserer Gemeinschaft zu korrigieren. Die Haltung des Einzelnen seiner Gemeinschaft gegenueber ist geradezu ein Barometer der Moral und wer sich von einer ersprießlichen Mitarbeit ausschliesst, der macht sich an dem Unglueck des Schwachen und Betroffenen mitschuldig. Lediglich das Bewusstsein von Zusammengehoerigkeit und Gemeinsamkeit, das Weiterbestehen von Bindungen und Beziehungen und das Zusammenstehen im Kampf um eine gemeinsame Sache bilden die blinkenden Waffen, die die schwierigsten Wege einer Gemeinschaft ebnen und in allen schweren Sorgen unserer duesteren Gegenwart hineinleuchten.

Gerade in der heutigen schweren Situation, deren schicksalhafte Bedeutung fuer die Juden niemandem zweifelhaft sein kann, obliegt jedem von uns ein vollgeruettelt Mass von Pflichten gegenueber der Gemeinschaft. Nur mit Erfuellung dieser Pflichten vermoegen wir selbst aus unserer Verzweiflung einen neuen Wert zu schaffen und uns aus unseren Enttaeuschungen wieder zu erheben. Selbst wenn es nicht gelingt, fuer alle Probleme eine Loesung zu finden, so liegt schon in jenem Akt der Mithilfe die persoenliche Bewaehrung eines jeden, der den Druck der Gegenwart lindert und unsere Gemeinschaft immer um Handbreite vor dem sozialen Abgrund zurueckreisst.

Das es so weit mit uns kommen konnte, entspringt der Tragoedie dieser Zeit, die die gesamte Menschheit erfasst hat, und dass wir trotzdem in diesem umwaelzenden Moment der Weltgeschichte nicht versagen und verzagen wollen, entspricht der traditionellen juedischen Bewaehrung in grauenvollen Zeiten, wo hoechste Not den Gemeinschaftssinn staerkte, die Seelen einte und sie zusammenstehen liess im Kampfe um eine gemeinsame Sache.

Diese Tatsache muss auch im Chaos unserer Gegenwart das Losungswort jedes einzelnen Juden sein, an dem er sich aufrichten und Mut und Trost schoepfen kann. Nur auf dem festen Fundament eines gemeinschaftlichen Zusammenstehens koennen wir mit guenstigen Aspekten in das neue Jahr treten.

Ossi Lewin

《上海犹太纪事报》在1943年犹太新年之际发表文章“新年交替 命运改变”，显示对胜利即将到来的乐观情绪

在隔离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动员、组织、管理和服务多种功能,成为犹太难民社区自治的舆论代表。

作为在社会异常变动的强压下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就个人来说,犹太难民之间的差异——职业、阶层、文化背景和社会经历——超过任何自然形成的社会团体,命运的剧变使陌生人走到了一起。"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被共同的命运联在一起!"《上海犹太纪事报》通过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阐述和对隔离区现实生活的生动报道,不断阐发和表达犹太难民是一个有着共同历史、共同信仰、共同境遇和共同苦难的"命运共同体"的社区舆论。

主编奥西·莱温在《新年——命运的转折》一文中这样阐释"集体—团体—共同体"的意义:"个人对集体的态度恰恰是道德的尺度,谁不参加有益的合作,谁就对弱者的不幸负有连带责任。只有这种休戚相关的意识和共同的斗争才能锻造出闪闪发光的武器,在最艰难的时刻为团体铺平道路,在暗淡无光的时刻照亮我们的道路。在今天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没有人再怀疑这一点对我们犹太人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对集体承担很大的义务。只有履行了这些义务,我们才能在自我怀疑中创造新的价值并使自己从失望中再次崛起。"[1]

《上海犹太纪事报》的另一位主笔曼夫瑞德·罗森菲尔德在《英雄主义——犹太人的人生观》一文中阐述:英雄主义是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集体主义——对民族的忠诚和爱——是英雄主义,只考虑自己则是机会主义。他这样阐述群体的性质和意义:"每个群体中既有英雄主义者,又有机会主义者,关键当面临生死抉择时哪种精神起支配作用。回顾历史,人们很难找到纯粹机会主义群体。机会

1_《上海犹太纪事报》,1943年9月29日,第3版。

主义完全与群体的性质相冲突，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既不能构成群体也不能在滑向机会主义的过程中长久保持群体，对其他群体来说它是一个能轻易到手的战利品，一个被强者鄙视的驯服的玩物。只有联合成民族、宗教团体，或者某种他们愿意为其理想献出生命的团体，人们才能长久生存。……机会主义从来没有能够统治犹太人的灵魂，凡是它出现的地方，历史都盖上了沉沦的烙印。"[1]

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犹太难民的共同命运——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上海犹太纪事报》不遗余力地强调犹太协会作为犹太难民社区自治的领导机构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指出"一个可靠的机构是我们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犹太协会是犹太难民自己的"独立的利益代表"，是犹太难民"整体利益"的代表，犹太协会的重组"证明难民已经有能力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上海犹太纪事报》呼吁犹太难民对自治组织的合作，指出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与犹太协会合作是犹太难民的义务，要求犹太难民"最大程度地服从组织，在行动和思想上符合整体利益并为其服务。……唯有如此——每个犹太流亡者意识到这种密切相关的共同命运并相应地采取行动，他才可以要求犹太社区和组织为他服务。"奥西·莱温在《呼唤合作》一文中指出："借这个机会我要着重指出，尽管有人批评，但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犹太协会经过几个月有计划的工作已经建立了一个健全而强有力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现在完全有资格作为犹太流亡者的代言人被人们所认同。过去这个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其根源正是缺乏团体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一个犹太集体的代表组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2]《上海犹太纪事报》不遗余力地强调犹太难民社区的整体性，强调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和

1_《上海犹太纪事报》，1943年8月15日，第7版。

2_《上海犹太纪事报》，1944年1月23日，第2版。

整体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这个大轮子上的一根轮辐”，强调在犹太难民社区的自治中，“不仅流亡者对它的领导者要有必要的信任，领导人也要像对自己的宿命一样信任流亡者。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每个成员要把‘团结一致’这个词在他的邻居和同事那里转化为真实的行动。”[1]

《上海犹太纪事报》在作为自治的领导机构的代言人的同时，也是犹太难民公开发表个人意见的公共讲坛。个人意见的自由表达是“命运共同体”舆论和犹太难民社区自治的民主精髓。《上海犹太纪事报》并不隶属于犹太协会，作为面向整个社区的信息平台，《上海犹太纪事报》既传达自治组织的管理信息，又反映犹太难民个人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读者来信——犹太难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议、批评、表扬、不同意见的讨论，通过署名文章个人观点的系统阐述，通过广告中个人意志和个人情感的真挚表达，通过人们之间的互相致意和问候，加强了犹太难民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相交流和互相理解，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公共舆论在犹太难民自由地公开表达的个人意见的和声中有力地显示出来。

信息互动——包括意见和观点的交流——是隔离区自治的必要条件，在隔离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救济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等，《上海犹太纪事报》都发挥着舆论的沟通和协调的作用，信息互动和社会互动无处不在。如果没有《上海犹太纪事报》——每天出版的日报——这一面向整个隔离区的信息平台和舆论中心所形成的信息和观点的互动，17 000人的犹太难民社区的自治是难以想象的[2]。

《上海犹太纪事报》的努力使“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成

1_《上海犹太纪事报》，1944年1月30日，第1版。

2_这个数字指的是进入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并非在整个上海的犹太难民。

为犹太难民的共识，这一共识使犹太难民以新的姿态——具有统一意志、统一领导的社会共同体——迎接命运的挑战，这从犹太协会发出的公告和呼吁中，从犹太协会的建设计划和计划的实行中，从厨房基金会免费提供的饭菜统计数字中，从犹太难民对社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中，从青年再教育培训班的课程安排中，从为恢复和激励犹太难民的身心而进行的免费文艺演出中，从气氛热烈的集会中，从“冬季援助”街头募捐的热烈场面和捐款的数额中，从仲裁法庭独立的法律判决和执行中，从犹太“保甲”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从盛大的犹太新年祈祷仪式和遵守安息日的运动中都可看出。犹太难民团结一致的行动显示出“命运共同体”这一社区舆论的客观内涵——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合理性——和强大力量。

犹太难民社区的自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189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形成的《巴塞尔纲领》这样规定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任务和方法[1]：

(1) 不断鼓励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

(2) 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成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

(3) 加强犹太民族感情和民族觉醒。

(4) 采取准备步骤，来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的目的所必需的。

这一纲领在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实现——以色列国建立——之前是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指导性纲领，这一纲领明确规定“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成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上海犹太

1_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第131页。

难民社区的自治符合这一纲领的精神。

在隔离区中，犹太人的自治就是犹太人的自救。正是犹太协会的有效工作，把所有的犹太难民组织和联合起来，依靠国际犹太组织的救援和犹太难民自己积极有序的工作，保证了17 000人的难民社区基本的生活需要，使犹太难民社区在整体上保持了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健全。对于犹太人来说，在犹太民族面临历史上最深重的危机之时，生存就是胜利，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道义上的支持，在犹太难民组织的领导下，17 000名犹太难民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在战乱和流离中守望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并以各种方式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第一线——巴勒斯坦提供援助，当战争结束，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实现时，5 000名上海犹太难民迁往巴勒斯坦[1]。

《上海犹太纪事报》在民族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刻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承担起了这一责任，成为犹太难民社区自治的有力的舆论工具。

第三节 隔离区犹太难民瞭望世界的信息窗口

虹口犹太隔离区不仅意味着对犹太难民人身的隔离，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隔离。从犹太难民在隔离区的实际处境来说，语言不通、行动受限、经济窘迫、通信中断，使他们成为与外部环境隔绝的信息匮乏的人群。

与此同时，犹太难民又是对信息的需求如饥似渴的人群。他们是一个处于命运剧变之中、对世界和自身命运充满焦虑、对外部信息极为关注的群体。

《上海犹太纪事报》作为隔离区时期唯一的难民报纸，是隔离区的犹太难民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信息通道，是

1_这里指的是二战后部分上海犹太难民移居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国。

使其免于由于信息隔绝而精神窒息的信息窗口。

李普曼在其著名的新闻学著作《公共舆论》中曾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大洋中的一个岛屿，住着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讯，邮轮每60天来一次，1914年9月他们从船长处得知6个星期以来德国和英国、法国激烈交战，而在这个岛屿上，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亲密相处，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信息的缺乏使人们生活在虚拟的环境之中。

隔离区由于《上海犹太纪事报》的存在而没有成为信息的荒岛。在隔离区，犹太难民被严格禁止收听短波收音机，《上海犹太纪事报》作为隔离区唯一的新闻报纸几乎成为犹太难民了解外部信息的唯一正式来源。《上海犹太纪事报》的国际报道、本地报道和亲友消息为他们带来了隔离区外的信息，尽管在日伪严格的新闻控制之下，《上海犹太纪事报》的国际报道和本地报道受到很大限制，但每天出版的报纸使隔离区中的犹太难民多少了解外部的世界。

犹太难民关注欧洲的战事，那里是他们的家园，有他们的父母亲友，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返欧洲；犹太难民关注美国的消息，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是犹太难民社区救济经费的主要来源，许多犹太难民的最终梦想是去美国；犹太难民关注巴勒斯坦的形势，那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第一线，是犹太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犹太难民关注上海，他们的命运已经和上海连在了一起……“他们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战争，尽管大部分新闻由日本人的宣传机构传播，但他们几乎可以凭本能得知什么时候盟国又赢得了一场大胜仗。”[1]他们盼望着盟军获胜，但是不知道能否活着看到这一天，在隔离区，制造小道消息成为“犹太社区的主要行业之

1_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5年版，第112页。

一”，隔离区的商业中心虹口舟山路因此以“小道消息之弄”而著称[1]。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犹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犹太难民敏感的神经和探知的触角关注整个世界，并借此思考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寻求民族和个人的出路。

《上海犹太纪事报》作为难民报纸，了解犹太难民的心理需求和关注热点，在日伪严厉的战时新闻控制和消息来源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地提供犹太难民渴望了解的信息。作为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上海犹太纪事报》努力透过日伪的新闻控制和宣传设置的屏障，以敏锐的眼光和嗅觉，以中立的编辑方针、客观报道手法、比照编排和提供事实背景等方式报道战争和国际形势，使犹太难民透过日伪的宣传能够了解战争的进程和外部世界的变迁，在隔离区中发挥着监测环境的重要功能。

对于犹太难民极为重要的是，《上海犹太纪事报》和国际红十字会、国际救援组织一起，成为维系犹太难民和流散世界各地的亲友联系的信息通道，对隔离区中的犹太难民来说，离散亲友的消息意味着安慰、欢乐和勇气，是犹太难民流亡生活中珍贵的精神寄托。

在现代社会，报纸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对于陷入困境的人群，报纸更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必要的信息量是保证人的正常神智的基本前提，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更是如此。在世界大战的动荡和离乱中，在言语不通的异国他乡，在日本法西斯的军事控制之下，一份每天出版具有相当信息量的日报是使犹太难民对社会环境做出基本判断和采取正确的生存策略的必要前提。如果说作为隔离区自治的舆论代表，《上海犹太纪事报》更多地发挥了喉舌作用，作为隔离区和外界的信息联系，《上海犹太

1_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5年版，第112页。

纪事报》则更多地发挥了耳目的作用，是隔离区中的犹太难民了解观察外部世界的信息窗口。

第四节　隔离区犹太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上海犹太纪事报》是隔离区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海犹太纪事报》以犹太人的精明和务实充分认识到发展经济对于犹太难民社区的意义，指出“建立适应目前环境的经济生活，保证大批人最低的生活需要，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尊严，还关系到我们的生存！”

与此同时，《上海犹太纪事报》也充分认识到报纸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在1943年8月29日发表于“以经济领导社区”号外上的《交往和联系是生产力》一文，对报纸在隔离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的阐述：

交往和联系是生产力

交往这个词在《创世记》中不太好，那时只有亚当和夏娃，这个词指的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但是它包含了一种很深的智慧，几千年来，人类每天都在认识和检验它的正确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人是“群居的生物”，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社会的人”就更好理解了。人为了生存要依赖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和交往，独居在动物界都很少见，作为人来说更不可能了。

人们在古代就意识到，生产活动形成了交往和联系，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生产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确，交往不只带来好处，它也是陋俗的催化剂

和兴奋剂。罗马文化之所以蜕化,就是因为它只因袭了希腊生活的形式,而没有继承希腊文化的精髓。不论对群体还是个人,交往确实存在危险,"滥交败坏风俗"这句话说得不错。

然而,人们没有因为交通事故而取消铁路,也没有因为交往的缺点而限制交往。交往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动力,对交往的需求是人心灵中最强大的内在力量,剥夺人的交往,例如单独监禁,被看作是最严厉、普遍使用的有效的惩罚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媒介具有重要的意义,书和报纸作为主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传播媒介具有重要的作用。德国谚语说:道路构成交通。我们也可以说:报纸形成交往。报纸发出倡议、推荐、警告,它的广告直接服务于物质交换。哪里有交往,哪里就有生活,哪里存在传播媒介,哪里就有活跃的交换和生产。对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如此。交往具有创造性,他们创造新的价值并使原有的价值增值。

这一期《上海犹太纪事报》带了一个好头。它超出一般报刊的范围而成为经济交往的一部分。它至少使新关系的建立和在搬迁的动乱中失去的老关系的恢复成为可能。在我们安顿下来之后,《上海犹太纪事报》把建立犹太区内新的经济关系当作自己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流亡者要适应这种新的关系。通过搬迁而形成新的关系和交往,这正是难民管理局的意图。如上所述,我们希望交往不仅被看成是一种聚会,不是为交往而交往,更多的是为了创造新的机会。流亡者住在一起可以更方便、更简单地交往,如果流亡者在更大的程度上互相照顾,就会产生新的经济机会。同胞聚居的区域在任何时代都是卓有成效的。对外来移民尤其如此。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并正确利用它。这一期《上海犹太纪事报》对此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提示。

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在预言家Jereznia的指引下到巴比伦定居："盖房子并住在那儿，种葡萄并用它……"这适用于所有时代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同样也适用于隔离区的难民。相互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肯定会加强他们的能量并创造价值，这是未来富裕生活和为上海的繁荣作出贡献的保证。如果我们正确地观察，生活和运动有什么区别呢？交往就是运动，生活和交往是一回事。经验总是告诉我们，哪儿有交往，哪儿就有生活，哪儿的交往中断，哪儿的生活之火就会熄灭，正是因为交往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导致中世纪的物质和文化都低于古代，也正是因为缺乏对交往的需求，北美的印第安人几千年来没有可值得称道的文化。

交往创造着并持续着，被滥用的交往在相互影响中经常产生诽谤，但在总体上交往是有益的和符合道义的，交往是人类生存的生产性力量。

曼夫瑞德·罗森菲尔德

《上海犹太纪事报》，1943.8.29，星期日，第6版

可以看出，《上海犹太纪事报》的这篇文章引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唯物史观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德语的"Verkehr"有交通、交往、流通、性爱、活动等意。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从总体上包括了"Verkehr"的各种含义，即社会交往——既包括物质交往，也包括精神交往——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前提。《上海犹太纪事报》准确地理解和领会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作出了自己的阐述："书和报纸作为主要的物质

的和精神的传播媒介具有重要的作用。德国谚语说：道路构成交通，我们也可以说：报纸形成交往。报纸发出倡议、推荐、警告，它的广告直接服务于物质交换。哪里有交往，哪里就有生活，哪里存在传播媒介，哪里就有活跃的交换和生产。对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如此。交往具有创造性，他们创造新的价值并使原有的价值增值。”

基于对“交往是生产力”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和报纸对于商业交换和物质生产的作用的认识，《上海犹太纪事报》以建立犹太难民社区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为己任，正如《上海犹太纪事报》自己所说：“这一期《上海犹太纪事报》带了一个好头。它超出一般报刊的范围而成为经济交往的一部分。……《上海犹太纪事报》把建立犹太区内新的经济关系当作自己的责任。……相互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肯定会加强他们（犹太难民）的能量并创造价值，这是未来富裕生活和为上海的繁荣作出贡献的保证。”

从“以经济领导社区”的号外中，从《上海犹太纪事报》注销的关于隔离区经济建设的计划、建议、呼吁和整体设想中，从所有难民公司和企业按行业和职业注册的广告所提供的“经济指南”中，从《上海犹太纪事报》注销的有关经济的富有创意和启发性的文章中，从每天大量注销的广告中，可以看出《上海犹太纪事报》建立经济的“联系和交往”的努力和功效，看出犹太人杰出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只要有一线可能，犹太人就会做生意。当隔离区出现了这种可能，《上海犹太纪事报》就提出了“以经济领导社区”的口号。对于这一行动的特殊意义，《上海犹太纪事报》这样解释：

我们尝试着在指定区域里做生意，通过建立经济组织，

我们表现出了一种不可战胜的生活勇气。我们告诉他们，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也会用犹太人不竭的精神力量和不懈的努力，争取犹太人的生存希望。在今天，这叫做生意！[1]

作为隔离区的信息总汇，《上海犹太纪事报》是一份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报纸。

第五节　隔离区犹太难民生存信念和意志的纪念碑

通过对《上海犹太纪事报》的内容分析可看出，生存是隔离区犹太难民社区生活的主题。无论是“以救济为中心”，还是“以经济领导社区”，无论是“力量来自欢乐”——隔离区中使犹太难民免于崩溃和沉沦的生气勃勃的文化生活，还是“最好的事情”——为了青年，为了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得以延续的教育，以及“不朽的希望”——在对宗教的虔信中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意义的追求，都体现了犹太人坚强的生存信念和意志。

在《上海犹太纪事报》的每一天每一版字里行间都可看出“生存”二字。

在这部命运交响曲中，作为民族复兴理想的旗帜，《上海犹太纪事报》奏出了犹太复国——民族生存信念的最强音；作为隔离区犹太难民社区自治的舆论代表，《上海犹太纪事报》发挥了宣传、组织、管理和服务多种功能，使犹太难民团结在隔离区的领导核心犹太难民自治组织周围，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互助互救，生死与共，作为指挥者和协调者，奏响了面对厄运同舟共济的主旋律；作为隔离区的信息总汇，《上海犹太纪事报》在流亡经济这一生存之战中表

1_《上海犹太纪事报》，1944年1月30日，第1版。

现出杰出的经济意识和经营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犹太民族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志的体现；就是其对日本军事当局的态度——就其本性来说属于精神分裂的政治立场的矛盾性，也是这一生存主题在时势的压迫下曲折低回的一种变奏。

生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整个犹太民族命运的主题。

当上海犹太难民在隔离区中为生存而战时，他们的欧洲同胞在德国的集中营中直接面对死亡，上海犹太隔离区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建立的遍布欧洲无数犹太集中营中的一个东方翻版。从1941年开始，德国纳粹大规模地杀害犹太人，600万犹太人相继死去。即使如此，在德国纳粹的死亡营里，犹太人的生存意志并没有被摧毁：

1943年8月2日，特雷布尔卡死亡营率先打响了暴动的第一枪。在暴动中犹太人打开了武器库，见人影奔来就大喊一声事先约好的口令“死亡”，若对方回答“生存”就塞给他一支枪和几排子弹，一时间，“死亡！生存！”的呼喊响彻整个营区。

1943年10月14日，索尔堡死亡营发生大规模暴动和逃亡。

1944年10月7日，奥斯维辛死亡营发生暴动。

由此上溯两千年，一部犹太流亡史的主题何尝不是“生存”二字。两千年中，生存还是死亡，是犹太民族始终面对的问题，他们无数次地被驱逐、被剥夺、被杀戮，不断地迁徙流亡，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他们的“隔都”被视为是“在一切其他形式中都已绝迹了的文明的一个变成了化石的遗物”，但是，尽管如此，犹太民族没有消亡。对此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到今天犹太人还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着，而腓尼基人和非利士人却早已经面目不辨了。他们的古代叙利亚邻居早已经回炉重新炼制了，变成了新的民族，取得了新的名称，而以色列人却不为这种冶金术——历史上所实现的无数次统一国家、统一教会、民族大迁移的严酷考验——所损伤。[1]

历史的冶金术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上海虹口隔离区是犹太民族两千年流亡史上的最后一个隔离区，在这场生存之战中上海犹太难民是最后的胜利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结束，他们撕扯下隔离区的标志，在大放光明的上海街头握手拥抱、跳舞狂欢。当他们最终迎来了以色列的新生，看到大卫之星飘扬在两千年魂牵梦绕的民族家乡的上空，他们内心深处最响亮的声音一定是：以色列人活着！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能够活着是多么美好！

公正战胜邪恶、理智战胜疯狂、生存战胜死亡，《上海犹太纪事报》记录和表达了上海犹太难民在流亡中的团结、尊严、理想和意志，是上海犹太隔离区一座生存信念和意志的纪念碑。

（本文作者是研究旧上海犹太报刊的专家。她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写出了博士论文“流亡者的报纸——《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正式出版时，书名改为《〈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流亡者的精神家园》，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摘编自该书。此次刊发，编者对正文、标题和注解作了少量修改和补充。）

1_[英]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厚友情

潘 光 王 健

犹太难民来到中国，就必然要与中国人接触和交往。在他们来到之前，中国人与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而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在纳粹大屠杀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大背景下，更具有互相援助、同甘共苦的特征。

犹太难民到来之前中国境内的中犹关系

1840年后在沪港两地形成的塞法迪犹商集团带有浓厚的英国色彩，高居于一般中国人之上。这其中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塞法迪犹太人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在那些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绅士们眼中仍是“异族异教”之人，因此他们不得不努力融入英国文化，以冲淡英国上流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其二，在中国，他们的英国身份倒使他们可以获得所有英国人都能得到的特权，这是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经商致富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们一般都积极参加英国社团的各项活动；其三，他们也与中国人交流，但主要接触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为洋化的买办、官

僚和富豪这三类人，而很少有机会与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中下层民众打交道。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大多数在华塞法迪犹太人平时都讲英语，很少有人认真学习中文，会讲国语或地方语言如上海话、广东话的更是极为稀罕。塞法迪犹太人办的文化事业如报刊、杂志等，也都是面向他们自己那个小小的社区的。1925年，一位英国犹太活动家在访问了香港犹太俱乐部后写道："这个俱乐部的摆饰颇具伦敦西区社会或政治俱乐部那种舒适的特点。在一间大而装修得很有品位的屋子里，摆放着一架大钢琴，可以休憩，欣赏音乐或讲演；还有一间很少让人忽略的台球室，及一个由穿白衬衣的能调配各种鸡尾酒的中国调酒师照管的吧台。"[1]在这里你不但看不到中国特色，也很少发现犹太特色。

当然，凡事都不可一概而论。在塞法迪犹商集团的上层中，不多的例外之一就是哈同。此人确实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娶了中国女子为妻，这在塞法迪犹商中是极为少见的。到了中年以后，他更是笃信佛教，醉心于佛教研究，也喜读中国的文史书籍。他不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还积极支持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经他大力支持而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包括王国维、罗振玉、邹景叔、章一山、费恕皆、徐悲鸿等名家。据哈同的女儿回忆，哈同家吃饭时也有两套饭菜，一套是中国式的，另一套是犹太式的，家庭成员可以各择其好；哈同本人一般吃犹太式的，但有时也来尝尝中国菜肴。[2]就连哈同去世后的丧礼也有两个，一个是按犹太教的方式，另一个则完全以佛教的方式进行。[3]

需要提一下的是，虽然在华塞法迪犹太人与中国文化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但由于他们财力雄厚，出于对中国文化

1_伊斯雷尔·柯亨 (I.Cohen)：《一个犹太旅行者的记述》(*The Journal of a Jewish Traveller*)，伦敦，1925年版，第116页。

2_笔者采访诺拉·哈同 (Nora Hardoon) 记录，1999年6月22日于上海。

3_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5年，第130页。

的尊重及宣传自身、广交朋友的目的，也经常出资支持中国的文教福利事业。除了哈同家族外，嘉道理家族也在上海、香港、广东等地兴办了不少主要面向中国学生的学校。

深受反犹主义迫害的来华俄国犹太人一般都不将俄国视为自己的祖国，而希望在中国长久居留下来。比如，出生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瑞娜·克拉斯诺 (Rena Krasno) 在描写俄国犹太人对上海的感情时写道："他们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没有离开的打算。"[1]天津的俄国犹太人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打算离开天津。有谁愿意离开这么好的地方？再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地方？"[2]哈尔滨等地方的俄国犹太人也都有相同的感情。因此，与塞法迪犹太人相比，俄国犹太人在了解中国社会、熟悉中国文化方面更加积极和主动，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接触和交往也更为密切。

在华俄国犹太人大都从事小本经营或担任中下层职员，这就使他们有机会与中下层的中国老百姓经常接触。他们一般很少炫耀自己的俄国身份，这也使他们与普通中国人之间减少了隔阂。曾在中国北方从事肠衣生意多年的俄犹商人本·列瓦柯 (Ben Levaco) 回忆道，为了收购原料，他走遍了东北、内蒙古、华北的许多城镇和乡村，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有时就与中国伙伴一起睡在大车店的炕上了。[3]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教授的俄国犹太人金诗伯 (S.Ginsbourg) 还记得，他父亲在满洲里一家为中东铁路加工木材的公司当职员，整天四处奔波，走遍了方圆几千里的林区，几乎天天与中国人打交道。[4]由于与中国人打交道多，俄国犹太人中学习中文，能讲国语乃至地方语言的要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哈尔滨犹太社团领袖A.考夫曼之子T.考夫曼 (T.Kaufman)

1_瑞娜·克拉斯诺著：《上海往事(1923—1949)，犹太少女的中国岁月》(中英文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2_福尔曼 (Leora Shluger Forman) 和斯沃茨 (Monica Morris Schwartz)：《中国天津的俄国犹太人 (1900—1950)》(*The Russian Jews of Tientsin, China, 1900—1950*)。两位作者是当年居住在天津的俄国犹太人，这是她们在芝加哥大学的讲演稿。

3_笔者采访列瓦柯记录，1992年4月20日于上海。

4_金诗伯：《我在中国的六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告诉笔者，当时在哈尔滨有不少俄国犹太人能讲带有浓重东北味的国语[1]。出生在天津的俄国犹太人S.缪勒（Sam Muller）至今仍能讲一口标准的天津话，据他回忆，当时天津俄犹中会讲天津话的不在少数[2]。

虽无精确统计，但俄国犹太人与中国人通婚的要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这也是俄犹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一个表现。有趣的是，在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几乎所有的俄犹孩童都是由被称为"阿妈"的中国保姆带大的，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哺育。在阿妈的影响下，他们往往把中文当成了母语，而且到长大后还深受影响。两位来自天津的犹太人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出生于中国的犹太小伙子，此人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正在学习中文。他说："我想学好了中文再回到中国去找我的阿妈，或许她还会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我的。"[3]

由于比较贴近中国社会，许多俄国犹太人不由自主地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进而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金诗伯描述了自己看京剧《霸王别姬》的感受："剧中处处采用夸张的手法，还在幕启之前，就已是锣鼓铿锵、号角齐鸣；演员的动作手势都富有戏剧性；服装富丽绚烂，又宽又长的袖子甩进甩出，奇形怪状的脸谱，白的、黑的、黄的、红的、花的，无色不有。但在这一切中，都闪烁着一种美——在音乐中，在表演中，特别是在王妃的剑舞中。……梅兰芳的动作雍容大度、精妙优雅，简直使我忘记了他是男扮女装。"[4]他的这种感受在俄国犹太人中是比较普遍的：不了解中国文化，但努力尝试去了解它；逐步感受到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无限的美好，因而为其所吸引。俄国犹太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也是一例。他喜爱并努力研究中

1_笔者采访特迪·考夫曼记录，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

2_笔者采访S.缪勒记录，1999年8月11日于上海。

3_前引福尔曼和斯沃茨讲演稿。

4_前引金诗伯书，第85页。

国音乐，又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尝试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因而他的许多作品都带有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不少俄国犹太人迷上了中国戏剧（如京剧和越剧），相信中医，练习中国太极拳和气功，爱吃中国菜，还给自己起了中国名字。这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情况，在塞法迪犹太人中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当然，俄国犹太人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他们客居的国家和城市。他们带来了富有俄国风味的犹太音乐，将俄罗斯犹太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如俄罗斯犹太裔钢琴家亨利·马戈林斯基将俄罗斯民族乐派奠基人格林卡的传世之作《伊万·苏萨宁》介绍到中国。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翻译家还首次将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海姆·比阿利克（Haim Bialik）等人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品译成英文乃至中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许多俄罗斯犹太音乐家、舞蹈家在中国院校里辛勤教学，培养出了一批批中国学生。如新中国最早在国际重要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傅聪，就是在俄罗斯犹太钢琴家阿达·勃朗斯坦夫人的悉心指导下脱颖而出的[1]。

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

就与中国人民的交流而言，欧洲犹太难民与俄国犹太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相同的是，两者所处的生存环境都使其能够广泛接触中国的中下层百姓，因而与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贴近。不同的是，俄国犹太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有一种长远观点，准备长期在中国文化圈中生活下去，而为生存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只把上海视为临时避难地，因而在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交往中总有一种

1_傅敏编：《傅雷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56页。

临时心理。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俄犹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发生在全中国范围，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欧洲犹太难民是在患难中接触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这一文化交流主要发生在1938年至1945年的上海。

刚到上海，大多数欧洲犹太难民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不会说中文，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对这个东方大都市及其居民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是在走投无路的艰难状况下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的。他们住进了中国人的房子，到中国医院里看病，开始吃不太合口味的上海式食品，有的还穿起了中式服装，在各个方面都试着按中国人的方式去过日子。犹太难民弗兰克·塞莱格 (Frank Theyleg) 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到上海，我就尽量使自己'当地化'。我开始吃几乎所有的中国食品，并无不良反应。"[1]现住纽约的威廉·肖特曼回忆道："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炉与花盘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 (至少在较贫困的地区)。"[2]这些描述，将当时犹太难民努力适应中国穷苦百姓所过的贫寒生活的情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不过，当他们逐步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开始试图在这个客居地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围。犹太难民乔治·赖尼希 (George Reinisch) 在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们虽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化，但也极力保留他们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3]在犹太难民聚居的上海虹口地区，难民们搬砖砌瓦，修复了数十个在"八一三"战争中被毁的街区，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由难民经营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开张，其中有饭店、杂货

1_前引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148页。

2_笔者采访威廉·肖特曼 (William Schurtman) 记录，1996年6月16日于纽约。

3_前引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40页。

店、药店、面包铺、理发店、裁缝店、鞋帽店、服装店等，当然也有维也纳人不可缺少的奥式露天咖啡馆。后来，一些难民甚至建起了小工厂，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及欧式食品——腊肠、糖果、软饮料等。这些商店和工厂开始主要是面向犹太难民的，但后来在中国百姓中也发现了广阔的市场，一些欧式商品越来越受中国人欢迎。虹口地区一时间德文招牌林立，好像是德国或奥地利的一个小镇，甚至被戏称为“小维也纳”。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犹人民的接触更趋密切。在虹口一带许多中国人学会了讲德文，也有一些犹太难民学会了讲中文，甚至上海话。前面提到的塞莱格回忆道：“我向任何一个碰到的中国人求教所见的事物的中文叫法，去看中国电影，还学写中文字。我获得了成功。在电话里，人们认为我是中国人，我大体上已能看懂中文报纸。”[1]由于能讲流利的汉语，他还与中国朋友合伙做生意，并且取得了成功。当然，像塞莱格这样精通中文的在犹太难民中可能并不很多，但大多数难民都能用简单的国语或上海话与中国人交流，他们的子女则在与中国孩子共同玩耍时学会了纯正的上海话。

1943年2月日本当局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后，犹太难民经历了他们居留上海期间最困难的两年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与周围中国百姓的交往，反而使这种交往在患难中更为紧密。犹太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 (Lilli Finkelstein) 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个妇女还交上了

1_前引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148页。

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1]战时与犹太难民一起居住在虹口的王发良老人回忆道：“那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日本人迫害我们中国人，我们与犹太难民同处患难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到战后他们离去时，我们之间都有些难分难舍了。”[2]肖特曼认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3]顺便提一下，虽然中犹人民在那困难的岁月里同甘共苦，但犹太难民中与中国人通婚的很少，这一是因为犹太难民大都是举家逃难来沪的，二是因为他们的临时避难心理。

在犹太难民中有诸多人才，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了上海，介绍给上海人民和其他中国人民。如他们首次在上海演出了意第绪戏剧，演奏了意第绪音乐，使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中欧犹太文化的风采。至少有13位犹太难民音乐家受聘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任教[4]，培养出了许多中国学生，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音坛上的名家高手。难民中的众多医学教授和医生也将欧美最先进的医学理论和技术带到了中国，并在大学中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生。

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犹太难民们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起初他们不太适应的中国传统与文化。像俄国犹太人一样，许多人迷上了中国戏剧，喜爱中国菜，学说中国国语或地方话，还起了中国名字并刻一个中国式姓名图章。犹太难民画家弗里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中文名：许福）画了一幅漫画，用的标题是“我爱中国人”，这反映了

1_前引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163页。

2_笔者采访王发良记录，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

3_前引采访肖特曼记录。

4_汤亚汀：“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载《音乐艺术》1998年第4期。作者的新作《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又记述了犹太音乐家在上海其他大学任教的情况。

大多数犹太难民的心声。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王珠回忆道：他在维也纳任职时，经常会见曾在上海住过的犹太难民，他们都能用上海话与他交谈；当他招待他们吃饭时，这些犹太人提出要吃过去在上海常吃的大饼、油条、豆浆，再加上红乳腐和酱瓜；他们有时也请大使夫妇去家中坐坐，但事先总要用地道的上海话声明：家里“嘎小嘎脏，勿好意思的”[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的年代，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在远东大都市上海与普通的中国百姓的这段交往，真是一种“患难中的文化交融”，在中犹关系史上谱写了难忘的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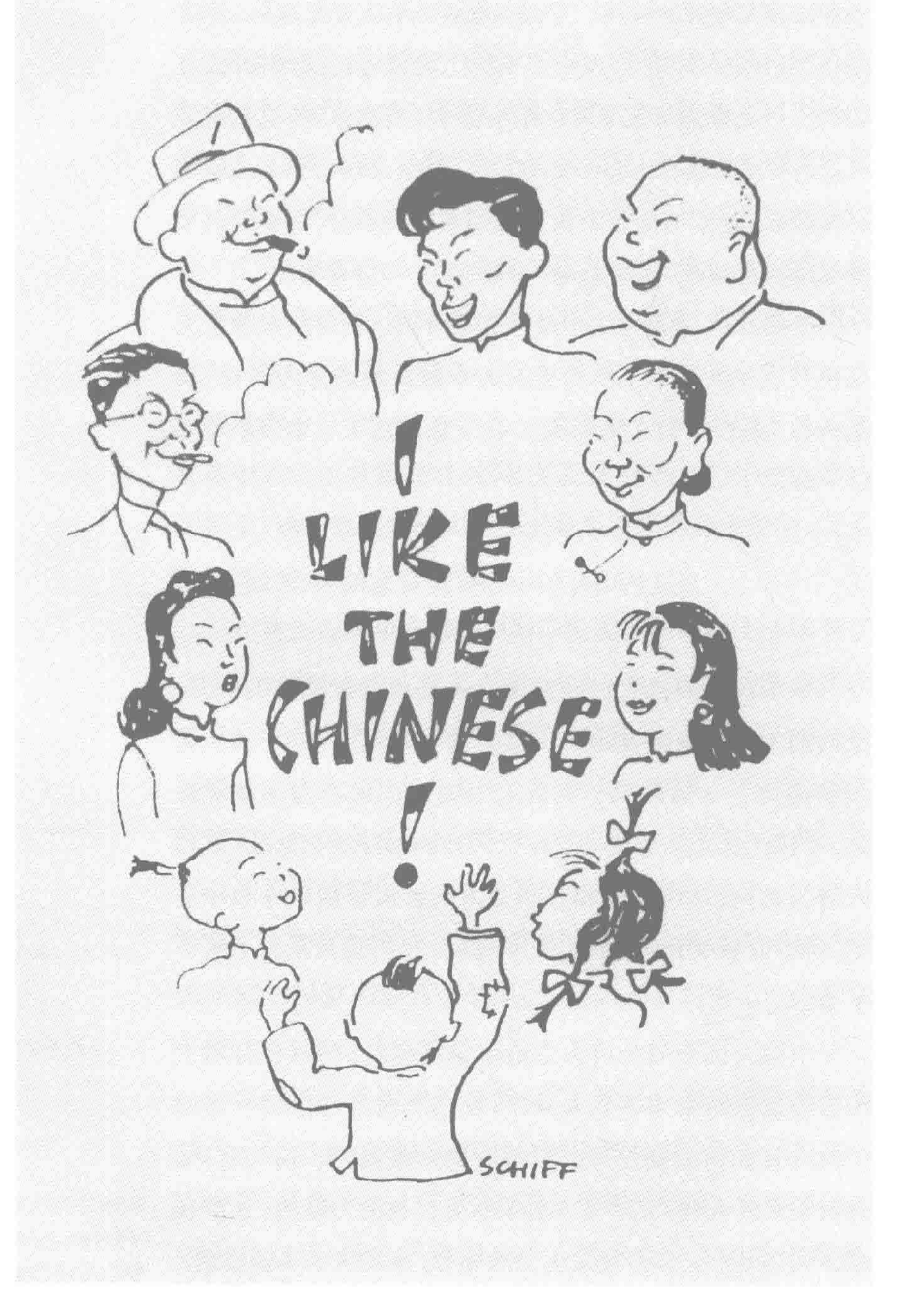
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中犹友谊和参加中国革命建设的犹太友人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都遭受过深重的灾难，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使中犹两大民族遭受了一场浩劫。当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屠杀之时，中国人民正在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浴血奋战，这相同的遭遇，使中国人民和在华犹太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友谊，在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中国人民不但在口头上抗议纳粹暴行，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救援避难来华的犹太难民，前已提及上海虹口一带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帮助犹太难民的。请勿忘记，他们中许多人在“八一三”战争后自己也沦为难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犹太难民的邻居，王发良老人回忆道：“我们那时也是饱一顿，饿一顿，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怎样，但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帮助来到虹口的犹太难民”。[2]当年

1_许步曾著:《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_前引采访王发良记录。



奥地利犹太难民画家希夫的漫画“我爱中国人”

的犹太难民，现居洛杉矶的海因茨·柯恩（Heinz Cohn）回忆当时中国人民的无私救助时感慨万分地说："我永远感谢中国人民，因为若没有他们，我也不可能在这里讲述过去了。"[1]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援救，当时的犹太难民及其后代要求在虹口建一块纪念碑，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这一愿望终于在1994年实现了。

(1) 中国国民政府的"犹太寄居区"计划

正当纳粹德国反犹、屠犹愈演愈烈之时，美、英等西方国家因种种原因拒绝接纳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难民，而中国上海却成了接纳犹太难民的唯一大城市。不仅如此，从最近发现的一些材料来看，当时中国政府还曾计划在云南建立一个犹太人寄居区，以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

1939年2月17日，当时的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无处可去的欧洲犹太难民。他在议案中指出，全世界有1 600多万犹太人，其中美国犹太人最多，近400万，波兰、苏联次之，约皆300余万，其余则散处各国，踪迹几遍全球。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备受各方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了无情的虐待，其中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纳粹屠杀犹太人更是变本加厉。最近，德国籍口德驻法大使秘书遭到犹太人的杀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上海最近因被逐犹太人汹涌而至，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欧洲难民的进入。为此，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孙科认为，建立犹太寄居区，不仅完全符合孙中山关于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的遗教，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改善并增强与英、美两国的关系。因为援助犹太

1_美国《洛杉矶时报》，1997年7月15日。

人势必会增加英、美两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和在华英、美富商和银行家对中国的支持。而这些富商和银行家大多是犹太人，并与英、美政府关系密切，将直接影响到两国的远东及对华政策。同时，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吸纳犹太难民能够赢得全世界犹太人的好感，有利于国家今后的经济建设。

孙科建议，① 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处，划定若干方里，为犹太人寄居区域。② 由中央指定中央及地方该管长官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③ 由上述委员会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声望之犹太领袖，一致响应并参与推进此项计划。④ 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关，尽量介绍其专门人才，为我后方建设各部门之用。

国防最高委员会3月7日原则通过孙科的提案，并致函国民政府，要求将孙科的提案转陈密饬行政院讨论，制订出相应的实施计划。行政院经饬据内政、外交、军政、财政、交通五部签注意见后，发交政务处长蒋廷黻详细研究，于4月22日制定了实施计划纲要，并呈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实施计划纲要如下：

“有国籍之犹太人保有其本国国民之权利和义务，如欲来华，必以某国国民之资格，其入境手续及入境后之居留地点，可照现行条约及惯例办理。如欲予以特惠，在我受条约及政治、经济各种困难之牵制，在彼又受其本国政令之阻碍，诚如内战，外交等部所言，诸多不便。是以关于有国籍之犹太人，似无特订办法之必要。

无国籍之犹太人则情形特殊。我国素重人道，先总理亦常以人类大同之义训诲同志，吾人理应尽力之所能，予以

协助。但犹太人问题复杂，我方对彼辈所表示之好感，颇易引起他方之误会。兹就国内及国际情形所许可之范围，拟协助犹太人之办法三项：

（一）入境之协助

凡国联之救济机关或国际著名之慈善团体认为品行端正而确为无国籍之犹太人，我国驻外使领馆得给予特别护照，许其入我国国境，惟享受此种特殊权利之犹太人，应先向我具呈志愿书，声明两点：（甲）入境后遵守我国法律并接受我国法庭之约束。（乙）入境后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如有违者，我国得驱逐出境。

（二）入境后之居留

无国籍之犹太人入境后应暂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其愿入我国籍者，依照我国法律手续办理，入籍后与一般国民享受平等权利，绝不因种族与宗教之差别而有所歧视。

（三）职业之介绍

现在无国籍之犹太人多处境困难，职业上有予以协助之必要。吾国在建设过程中，所需各种专门技术人员颇多，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机械修理员等，政府机关应各就主管范围调查需要情形，开具详细清单，注明所需要之人员及所拟之待遇，由外交部转发使领馆注意延聘，并请国联协助罗致，如觅得适当人员而能自备川资，或由国联或国际慈善团体代备川资来华者，各使领馆于得国内任用机关许可后，得与签订服务契约。其无契约而自动来华者，我国虽不负任何职业上之义务，政府似可训令各省市指定机关举行失业登记，并在可能范围之内介绍职业。

以上办法如蒙通过，政府似应训令驻国联代表，将办法正式通知国联，并同时在重庆发表声明。至于宣传之措词，即以本办法为根据。”[1]

5月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行政院的实施计划，并决定不正式通知国联。行政院也于次日令饬内政、外交、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各部分别遵办，并密令各省市政府遵照执行。

此建议也得到了世界犹太人的积极呼应。1939年7月，德国著名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专程来到上海，在华懋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一个向云南移民10万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并称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实施，特别是云南省政府已做好了安置准备。保格拉斯还于9月携计划前往美国，寻求美国犹太人的捐助。上海犹太社团也表示支持此项计划，犹太社团领袖海亦姆称云南是犹太人新的“希望之乡”，《以色列信使报》《黄报》等也多次报道了计划内容。虽然由于缺少经费等原因，这一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当时中国人民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仍然对危难中的犹太民族充满同情和援助之心。[2]

(2)“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以发放赴中国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事迹，又是当时中国人努力帮助犹太人的一个明证。

何凤山博士，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1932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0年，他出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正值纳粹在德国掀起反犹狂潮，

1_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国民政府安置逃亡犹太人计划筹议始末”，《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第19页。

2_王健著：《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95页。

后这股浪潮又随着纳粹吞并奥地利而席卷奥国，使成千上万犹太人惨遭迫害和关押。当时，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持有“合法”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或其他文件，即可马上离开奥地利。但是，包括英、美等西方大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均以各种借口拒绝发给他们签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奥地利犹太人转而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申请入境上海的签证。何凤山知道，欧洲犹太难民不需要签证就可进入上海，但为了帮助他们逃离奥地利，他立即以发放签证的方式全力救助犹太人。17岁的犹太青年埃里克·戈尔德施陶伯为了替自己和家人取得签证，在数月内奔走了5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均遭拒绝。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向中国总领馆申请签证，立即获得了何凤山签发的20份签证。这20份签证中的每一份都救了一位埃里克的家人或亲属，如埃里克的父亲在“碎玻璃之夜”暴行中被捕，但因为他持有中国签证，几天后即被释放并前往上海[1]。

消息传出，大批犹太人都来到中国总领馆申请签证。何凤山对来者一概不拒，以最快速度向他们发放签证。据何凤山的学生刘冠初回忆，何凤山亲口告诉他，为了方便犹太人申办签证，他专门派了一位领事在总领馆后面小巷的酒吧内接待犹太人，帮助他们办理签证，最忙的时候一天办了上百份[2]。许多当年的犹太难民仍记得他们拿到何博士发放的签证时的激动心情，对他们来说，这个签证就仿佛是茫茫苦海中的一个救生圈。当然，也有很多人利用手中的赴上海签证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如现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兼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副主席辛格的父母，当时就拿着何凤山发给他们的签证逃到了古巴。何凤山究竟给犹太难民发了多少签证？一般的说法是相当模糊的“数

1_蒋作斌主编：《国际义人何凤山》，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35页。

2_采访刘冠初记录，2006年11月23日于上海。

千份”[1]。刘冠初先生给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估计数字：根据签证收费统计，何凤山任职期间总共发放了签证10 047份，其中大多数是发给犹太人的，所以他给犹太难民发放的签证可能高达8 000～9 000份[2]。

值得一提的是，何凤山向犹太人发放大量签证的行动引起了当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陈介的不满，担心因此影响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曾对何凤山施加压力，还派人来调查所谓驻维也纳总领馆通过发签证“获利”的谣传，结果查无实据。尽管承受种种压力，何凤山丝毫没有动摇救助犹太人的决心。同时，纳粹当局也对何凤山向犹太人发放大量签证十分恼怒，以总领馆使用的楼房属犹太人财产为借口，强行没收了这一房产。何凤山在向政府申请迁移经费未果的情况下，自己掏钱在附近租下公寓作为办公处，继续发放“生命签证”[3]。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疾恶如仇、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1940年后，何凤山又出任旧中国派驻若干国家的大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退休，后定居美国，1997年在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6岁。难能可贵的是，他生前对救助犹太人的义举从不渲染，直到去世后才逐渐为人们所知。现在，何凤山博士已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2000年10月，经过以色列相关部门的周密调查，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正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称号。2007年9月，以色列政府又授予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证书。

(3) 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犹太友人

一方面，在华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的犹太难民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在华犹太人自身也积极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1933年后，中国各地的犹太人都纷纷组织抗议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集会和示威，获得了中国

1_前引蒋作斌主编书，第37页。

2_前引采访刘冠初记录。

3_前引蒋作斌主编书，第37页。

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犹太难民们还曾冲击纳粹分子在上海搞的庆祝“胜利”的活动[1]。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华犹太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0月25日，上海犹太人的喉舌《以色列信使报》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我们以人道和公正的名义呼吁世界列强竭尽全力阻止正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对生命和财产的肆意剥夺。中国人民正在勇敢地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非常赞赏这种英勇的抵抗。面对恐怖的毁坏力量所采取的抵抗令人敬佩，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人民最终能获得胜利，因为中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她是在为自身权利而战。”[2]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日占地区的俄国犹太人利用其合法地位为苏联和其他盟国做情报工作，为反法西斯事业出了力。1943年初，日本当局在上海虹口着手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时，上海锡安主义团体曾组织犹太难民，特别是波兰犹太难民对此进行抵制，迫使日本人做出了一些让步。如前所述，在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曾出现过反法西斯地下刊物；同时，人们在那里还发现过传播盟军获胜消息的油印传单。尽管在是否要与英国并肩战斗问题上曾有过分歧，一些受过上海“贝塔”组织军事训练的犹太青年后来还是参加了英军，其中许多人在缅甸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3]。所有这些活动，对中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疑是一种支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在华犹太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中有的人积极地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还有的人则参加了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同中国人民并

1_格·卡明斯基和埃·翁特里德着：《奥中友谊史》，北京1986年版，第251页。

2_《以色列信使报》，1937年10月25日。

3_《贝塔在中国（1929—1949），纪念贝塔成立50周年文集》（*Betar in China 1929 —1949, Commemorative Anthology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Betar* (1923—1973)，以色列出版，日期不详，第88页。

肩抗日，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一些犹太朋友继续留在中国，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建设事业，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在中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下面着重介绍其中的几位：汉斯·希伯 (Hans Shippe)、魏璐丝 (Ruth Weiss)、罗生特 (Jacob Rosenfeld)、傅莱 (Richard Frey，原名Richard Stein)、沙博理 (Sidney Shapiro)、爱泼斯坦 (Israel Epstein)、汉斯·米勒 (Hans Miller)。

汉斯·希伯，犹太作家兼记者，德国共产党员。他于1925年来到中国，1926年赴广东，在北伐军中任国际宣传部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他逃到了上海租界，写了一本颇为引人注目的书《从广东到上海：1926—1927》，于1928年在欧洲出版。此后，希伯一直在上海从事写作，为美国的一家杂志《太平洋事务》撰稿。在上海期间，他还组织了一个由外国人参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文件的学习小组，讨论政治问题，后来犹太难民中的不少左翼人士都参加了这个小组。抗战爆发后，希伯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他致电自己的私人朋友、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先生，痛陈反共摩擦必须制止，主张民主团结，共同抗日[1]。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1938年秋天，他以记者身份到皖南新四军驻地进行采访，见到了叶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人，此后写了大量宣传新四军的文章[2]。1941年10月，希伯到山东根据地考察，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共代表、八路军代表、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及各界代表在欢迎宴会上致辞，对希伯深入抗日第一线的英勇精神及帮助中国抗日的正义行动深表致意，并号召全省党政军民

1_《大众日报》，1942年7月7日。

2_黄瑶和张惠新：《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各界以实际工作与反“扫荡”的胜利来回报国际友人的愿望。新华社对此作了报道，称希伯“系一有名之新闻记者，乃中国革命老友，曾先后来华六次。对中国问题著作颇多。此次来游系应太平洋学会之约，专门搜集中国人民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事迹。”[1]一个多月后，希伯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战死后手中还紧握钢枪。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这几个大字，以纪念希伯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的功绩[2]。

魏璐丝，奥地利犹太人，记者。她于1908年12月11日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1932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魏璐丝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大学毕业后，她决定到中国考察一段时间，并准备为几家报纸写一些旅途见闻。1933年10月2日，魏璐丝抵达上海，写了几篇报道中国情况的文章发回维也纳发表，因其中有谴责日本侵略者的内容，遭到日本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抗议。此后，她暂搁写作，到上海一家犹太人办的学校教书，同时着手对中国进行进一步考察。在这期间，她结识了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人，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宋庆龄、鲁迅及其他中外进步人士，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后来，她成为史沫特莱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助手，担任史沫特莱与红军领导人秘密会见时的翻译，并协助史沫特莱进行抗日宣传。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她受史沫特莱之托采访和报道上海学界为抗日救国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的活动。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和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她还参加了希伯等人组织的学习小组。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璐丝离开上海去了成都，并积极投

1_《解放日报》，1941年10月7日。

2_王霍(译音)(Wang Huo)：“他倒在中国土地上——汉斯・希伯的故事”(He Died on China's Soil, The Story of Hans Shippe)，《中国建设》(英文)(*China Reconstructs*)，北京，1979年12月号，第17—19页。

身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她帮助美国友人创办了英文报纸《成都新闻》，目的是将国外电台报道的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她参加了战时服务队，慰问和护理中国的伤病员。她还在一个由五所大学学生联合组成的抗战服务团中担任顾问，并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做一些抗战工作。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魏璐丝的父母和千百万犹太人一同被关进了集中营惨遭迫害。出于对法西斯的愤恨和对中国的热爱，同年，她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1]。新中国成立后，魏璐丝一直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直至去世。2009年4月25日，魏璐丝墓碑揭幕仪式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举行[2]。

罗生特是位奥地利犹太人，1903年1月出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莱姆贝格。1922年他考入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医学系。1928年5月毕业，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当住院医生。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加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纳粹势力也开始渗透到奥地利。1934年2月，奥国内冲突爆发，身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罗生特被捕入狱。出狱后，罗生特便离开了维也纳大学医院，自己开了一家泌尿科诊所。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既是犹太人，又是社会民主党员的罗生特自然难逃厄运，再次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一年后，他被释放，并被限令两周内离境。最近发现的材料显示，他也获得了何凤山签发的赴中国上海的签证[3]。1939年8月，罗生特来到上海，在法租界开了一家泌尿科和妇产科诊所，生活逐渐安定下来。随后，他找到了希伯，并参加了政治学习小组。在学习小组中，罗生特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英雄事迹，为此深为感动，

1_叶丽茶主编:《来自异国的朋友——在中国有过特殊经历的外国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1页。

2_《解放日报》，2009年4月26日。

3_采访罗生特侄女维维安·罗森费尔德 (Vivian Rosenfeld) 记录，2008年5月21日于美国华盛顿。

多次向希伯提出要到新四军中去，用自己的医术为抗日军民服务。经严格考察，1941年3月，罗生特来到苏北盐城，加入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对他进行了采访，称“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还是第一个”。[1]在新四军中，他除了医治抢救了许多抗日军民外，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受到大家的爱戴和尊敬。194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4月，为诊治罗荣桓同志严重的肾病，罗生特转赴山东担任了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生特一方面为罗荣桓等同志精心医治，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医药卫生人才。他还多次奔赴前线救护伤员，给当地的老乡治病，其名字家喻户晓，被人们誉为“再世华佗”“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抗战胜利后，他又随军转战东北，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成为在我军中担任医务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罗生特在根据地还经常以其亲身经历撰文、讲演，揭露德、日法西斯主义的暴行，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的抗日军民。他在《郁积的仇恨》一文中写道：“法西斯集中营是一种民族的牢狱”；[2]他认为：“新鲜的空气在整个北中国吹荡着。……共产党将领导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的大道上转变成近代的国家。”[3] 1949年，罗生特回奥地利探亲，后又到以色列探亲，于1952年病逝于以色列。中以建交后，访问以色列的中国代表团都要去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罗生特墓献花。今天，在其生前战斗过的山东，中国人民还建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医院。有关研究罗生特的著述和纪念罗生特的活动，后面还要提及。

傅莱，奥地利犹太人，1920年2月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

1_《江淮日报》，1941年3月25日。

2_罗生特：“郁积的仇恨”，《先锋》杂志第三、四期合刊，1944年4月。

3_罗生特：“请英美莫再消耗金钱和时间给中国国民政府”，《大众日报》，1944年12月3日。

普通职员家庭。1934年，他参加了工人保卫团的斗争，并从那时起成为一名救护员。为了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后来他参加了各种医学训练班，并到医科大学去旁听，逐渐成长为一名医生。1938年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后，奥地利共产党人、革命分子和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成批逃往国外。傅莱也不得不告别父母、战友，作为犹太难民于1939年1月15日来到上海。这时他身上只剩下5个马克。因一时难以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只好住在虹口一个慈善团体开办的接待站，一面在一所临时传染病医院工作，一面继续打听投奔八路军的线索。同年3月，傅莱北上，在天津一家奥地利医生开设的医院任X光及化验技师，后又转入天津马大夫医院工作。在这期间，他多方探询，终于与晋察冀根据地取得了联系。1941年秋，在八路军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他经北平到达了平西根据地。在那里，傅莱见到了肖克司令员。两星期后，他又在平西根据地部队的护送下，到达晋察冀军区的中心地区。聂荣臻司令员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亲切地为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傅莱"，并安排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教员。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傅莱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1942年至1944年两次反"扫荡"中，他一边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传染病的教学工作，一边又积极地同学员一起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他对教学十分认真，平时下苦功夫学习汉语，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他1944年调到延安，在中国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和内科教学工作，此时已能自如地运用中文了。傅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问题，为此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傅莱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留在中国工作，任全国政协委员。

1_冯彩章和李葆定著:《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页。

沙博理，1914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二战前已成为华尔街的一名执业律师。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起初只是为了寻找谋生的机会，但后来认识了进步作家、演员风子，并与她结为终身伴侣，便逐渐投身于中国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向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运送药品，他曾以美国律师的身份作掩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滩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多次顺利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1]。他在上海四马路上的办公室，一度成了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联络点。夜深人静之时，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就来到他的办公室，拉上窗帘，围拢在沙博理从美国带来的小收音机前收听延安的广播[2]。1949年初，为了迎接北平的解放，他曾和茅盾、阳翰笙等人一起通宵达旦练习革命歌曲。1949年10月1日，他应邀作为贵宾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担任外文出版局英文专家，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水浒传》《家》《林海雪原》等一批中国小说就是通过他的笔走向世界的。1983年，沙博理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开始积极参政议政。在自传《我的中国》里，沙博理把自己的一生形容为“创造中国历史上最重大变革的超速离心器”中的“一颗微粒”[3]。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波兰（一说立陶宛）的犹太家庭，自幼随父母移居中国，在天津长大。1931年后，他担任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记者、编辑。1933年，他结识了埃德加·斯诺，深受其进步思想和《西行漫记》一书之影响，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和革命事业，曾出任斯诺创办的英文杂志《民主》的编委。抗日战争爆发后，爱泼斯坦的父母移居美国，而他则只身留下，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1938年，他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直接协

1_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11月27日。

2_同上。

3_沙博理：《我的中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助宋庆龄、廖承志等领导人工作，后又到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并编辑英文《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他的第一部著作《人民之战》就在此期间写成出版，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他还把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著述（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译成英文发行到国外[1]。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爱泼斯坦在香港被日寇逮捕，关押于集中营中。不久后，他和几位英、美难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辗转来到重庆，任美国《劳动联合新闻》记者。1944年，他首次访问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缩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二战后他到美国任《劳动联合新闻》总编辑，但没过几年，又于1951年重返“故乡”中国。此后，他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筹办《中国建设》杂志，并出任杂志执行编辑。1957年，他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后，他出任《中国建设》总编辑，中国福利会和宋庆龄基金会的领导人，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经常对友人说：“在我的一生中只有10年没有在中国，我能够从中国看到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这是我莫大的幸运。”[2] 1985年、1995年、2005年他七十、八十、九十诞辰之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曾亲自前去向他祝贺。他于2005年九十诞辰后不久去世[3]。

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犹太平民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刚高中毕业的汉斯被迫进入纳粹设立的“青年劳动服役营”，后不堪忍受那里的粗暴强制，在同伴帮助下逃了出来。当时德国的反犹暴行愈演愈烈，犹太青年进大学深造已十分困难，他便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来到瑞士，进入巴塞尔大学医学系学习。就在巴塞

1_晓姜：“爱泼斯坦：从集中营到延安”，《国际人才交流》1995年第8期。关于爱泼斯坦在中国的经历，还可参见他去世前一年的新作《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2_前引晓姜文“爱泼斯坦：从集中营到延安”和《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3_同上。

尔大学，他结识了中国同学蒋兆先，从蒋那里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此萌生了前往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的想法。1938年，汉斯的父母在德国被投入集中营，瑞士在德国压力下也出现了反犹气氛。汉斯抓紧时间写出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即离开瑞士前往向往已久的中国。9月，他终于来到了延安，受到了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亲自会见他，并为他设宴洗尘[1]。这年年底，他来到太行山前线，此后曾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八路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一二九师医务顾问，治疗了无数抗日军民，受到战友们的一致赞扬。1943年后，他又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为八路军带出了一批高徒。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批准他回国探亲，为他所做的工作鉴定充分肯定了他作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在中国战场上的卓越表现[2]。由于内战爆发，汉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探亲机会，又投身于解放战争，随即出任冀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1949年，就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与也在解放军工作的日本护士中村京子结婚。1950年，汉斯·米勒正式加入中国国籍，6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几十年，他仍然工作在医疗卫生战线，曾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顾问、外文出版社德文编辑。他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出谋献策。

这里必须要介绍一批参加过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医生，他们后来也来到了中国，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据爱泼斯坦回忆："他们总共20多人，都来自中欧和东欧，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3]他们的领队斯坦尼斯拉夫·弗莱托（Stanislaw Flato，汉名傅拉

1_前引冯彩章和李葆定《红医将领》，第658页。

2_前引冯彩章和李葆定《红医将领》，第659页。

3_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序"。

托，犹太裔）来自波兰，曾为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治病，因医术高超而被董老称为“华佗—傅拉托”，也是周恩来的亲密朋友，1957年后曾任波兰驻华公使[1]。这个国际医疗队的副领队是来自保加利亚的简托·凯奈第（Janto Kaneti，汉名甘扬道，犹太裔），来华后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三中队中队长，战斗在贵州、湖南、云南等地，救护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曾三次见到周恩来，后与燕京大学护理系毕业的张荪芬女士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访华[2]。医疗队成员弗里兹·杰森（Fritz Jensen，汉名严裴德，犹太裔）是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兼作家，来华后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中国工作，写出了颇具影响的著作《中国胜利了》。1955年4月，他以记者身份随周恩来总理赴印度尼西亚采访在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中遇难[3]。医疗队其他犹太裔成员也有许多感人事迹，这里不一一介绍，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

像这样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犹太友人还有许许多多。如曾经担任孙中山先生侍卫长的犹太人“双枪科亨”（莫里斯·科亨）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在国民党军队的对外联络和军备采购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9年后，他又成为新中国的好朋友，多次应宋庆龄之邀来中国访问[4]。前面提到的弗兰克·塞莱格是犹太难民中的一位工程师，当日本当局要他帮助指导生产手榴弹和其他军火时，他便与中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使生产的手榴弹不能爆炸，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5]。德国犹太人威廉·迈因策尔（Wilhelm Mainzer）抗战时期参加中国军队，后升任高级医官，战后与中国护士结婚，双双移

1_王砚：“他们战斗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抗战时期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实”，《参考消息》，2005年8月31日。

2_张至善编译：《1936—1939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247页。也可参见前引王砚文。

3_张彦：“八宝山墓碑上的外国人——忆医生、诗人、记者、烈士严裴德”，载《百年潮》2000年第7期。也可参见前引张至善编译书和前引王砚文。

4_参见丹尼尔·列维（Levy, Daniel）著：《双枪科亨》（*Two-Gun Cohen: A Biography.*），纽约，1997年版。

5_前引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150页。

民以色列[1]。德国犹太人汉斯·克尼格 (Hans Konig) 战时担任塔斯社上海分社记者，积极向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后来曾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J.汉瑟也冒着生命危险，为重庆方面传送情报，曾多次被日本宪兵队传讯[2]。美国犹太人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 1945年来到中国，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3]。汉斯·希伯的遗孀格图德·罗森伯格 (Gertrude Rosenberg) 是宋庆龄的亲密战友，在希伯牺牲后继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4]。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曼尼亚·雷斯 (Manya Reiss) 也在中国工作多年，特别在新华社的工作倍受赞扬[5]。还有前面提到的叶华和金诗伯等人，新中国成立后也都留在中国，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努力工作。以上这些在华犹太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革命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本文摘自潘光、王健著《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此次刊发作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1_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2_前引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第65—77页。

3_参见李敦白等着：《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_前引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2005年版，“序”。

5_同上。

来沪犹太难民人数考

王 健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在战争期间拯救了约3万名遭到纳粹迫害而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难民。

当时，中国人民虽然自己身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害之中，绝大多数人流离失所，生活困难，但仍然关心着远在欧洲的犹太难民。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向德国驻沪领馆递交了抗议书，强烈谴责希特勒的反犹暴行。1939年2月，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提议在中国云南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1933年至1941年，上海接纳了大批犹太难民。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指出，当时上海一市接受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难民数的总和还多[1]。

但是，有关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问题，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一些不同观点，在犹太难民中也有不同说法，甚至有些

1_格罗曼和兰迪斯 (A.Grobman & D. Landes)：《大屠杀研究评论集》(*Genocide,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洛杉矶，1983年版，第299页。

人指责中国媒体夸大了被救犹太难民的数量。本文拟从研究当时中国境内犹太人的主流报纸《以色列信使报》对来沪犹太难民人数的相关报道入手,就这个问题作一考证。

早期来上海的犹太难民人数

从1933年开始就有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当时,虽然希特勒已经开始在德国排犹,但由于犹太人对面临的威胁认识不清,这一时期德国犹太人的外迁人数不是太多,再加上很多人以周边欧洲国家为避难的主要目的地,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少,其中大都是与上海有些联系的,或有亲戚在上海,或曾在上海生活过,或其工作过的德国企业与上海有关系等。1933年首批抵沪的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1]。他们是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船抵达汇山码头的。此后直到1938年夏,抵沪德国犹太人的总数也不是很多,大约有1 000人,有些人又经上海去了中国境内其他地方或离开上海去了其他国家。

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来沪的犹太人还不能算难民,只能算侨民。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希特勒的排犹始于1933年初,在排犹开始后来沪的德国犹太人显然是感受到了迫害或威胁才被迫离开德国来沪避难的,因此他们都应该属于"难民"这一范畴之内。这一阶段来沪的犹太人大都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医生、律师、教师和企业家,随身带有一部分积蓄,因此较易在上海找到工作或者自己开业,生活水平居犹侨的中等水平,一般都居住在租界。

《以色列信使报》1933年10月1日报道称:"根据我们收到的邮件信息,10名一流的德国犹太医生正在前往上海

1_马斯 (A.Mars):"浅论上海的犹太难民" (A Note on the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载《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 第1卷31期(1969年10月), 第286页。

途中。"[1]到该年年底，移民到上海的德国犹太医生大约在30人，不少都是名医，并在租界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理查德·罗文伯格医生曾在德国圣乔治医院担任神经科医生，并有多部医学专著。卡尔·摩西医生是柏林出版巨头摩西家族的后裔，擅长儿科疾病，在柏林享有极高声誉，并长期担任当地一家大型儿科诊所的首席医生，该诊所每月有大约4 000个门诊，是同业中的模范机构。加库伯维斯基医生是德国犹太裔牙医及口腔和下颚外科专家。一战期间，他在前线担任牙科和下颚医疗站负责人。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战后，他被任命为一家公立医院的牙科部主任。他们的到来，给上海犹太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以色列信使报》主编，也是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之一的埃兹拉夫妇在其位于太平花园6号的寓所为新来的德国犹太医生举行招待会，以示接风。当第一波德国难民潮开始席卷世界的时候，只有屈指可数的人敢于长途跋涉来到中国。这支主要由职业人士组成的先锋队毫不困难地取得了成功，定居上海、汉口、北平和南京等城市。

1938年8月开始，由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逐步升级，并且随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向欧洲其他国家扩展，使得德国和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纷纷外逃，以求生存。以下是《以色列信使报》1938年8月到10月的一系列报道。

"1938年8月15日，德国兼并奥地利后，首批15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这批难民曾是维也纳的富有阶层，离开之前每人却只得到20马克的路费，令人悲痛伤怀。犹太人如此惨遭劫难，离乡背井，实在令人目不忍睹。上海犹太难民救援

1 《以色列信使报》，1933年10月1日。

组织到码头迎接。”

“8月28日，又有10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包括1名妇女和2名儿童。他们离开奥地利经由意大利抵达上海，两周前先期到达的奥地利难民前往迎接，并负责把这批难民带到预先安排好的住所。刚到上海的这批难民遭遇了与第一批15人相同的困境，他们离开德国时，身上也只有20马克，即1英镑。由于在船上有所花费，到达上海后几乎身无分文，就连到安置住宿地的交通费用也支付不起。”

“9月11日，一批欧洲犹太难民一行6人搭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维多利亚号’邮轮抵达上海。其中有1名德国犹太籍医生，其余5人均来自奥地利，3名商人，1名工程师，还有1位女士是其中1位商人的妻子。”

“10月18日，一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25名犹太难民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19位男士、5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少数难民可以讲英语，其中大多数陷入财政困难。”

“碎玻璃之夜”后来沪犹太难民人数剧增

1938年11月的“碎玻璃之夜”后，从幻想中醒来的德、奥犹太人开始拼命逃离纳粹魔爪。但是，这批犹太难民没有先前的幸运，因为纳粹分子加强了对他们财产的剥夺，只允许他们带走很少钱物。据1938年12月抵沪的一批犹太难民称，他们一起抵达的187人中，有不少本来是德、奥当地的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英镑，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英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当时上海的中外文报纸，特别是《以色列信使报》记录了这一

批批登陆汇山码头的犹太难民情况[1]：

“11月24日，18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佛德号’邮船抵达上海。这些难民在到岸后前往海关检查行李时显示出悲伤心情。他们的行李很少，因为大多数来自柏林的难民行李在经过德国边境时因可能携带现金而被扣留，这样多数人除了手提包之外一无所有，当他们带着这些手提包经过两天旅程从柏林到达的里雅斯德港时曾被告知其他行李将随另一邮船到达。其中至少有一人有在集中营拘禁的经历，他的前额缠着厚厚的绷带，但拒绝发表任何讲话。旁边的人告诉《字林西报》记者说，他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中被打伤了头部，顺便说一下，大多数抵沪的德国人在离开之前都在那里被拘留了10周到3年不等的时间。到达的人中多数来自德国，只有三成来自奥地利。护照上有清晰的红色J字。在已到达的犹太难民中，最富有的人只有3个英镑，而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一下子涌入的这些难民要找到工作十分困难，但不应视为上海犹太社团的负担，他们也许会对上海作出精神贡献，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是令人尊敬的医生。负责接待的委员会已成功地租赁了虹口华盛路（今许昌路——编者注）708号的英国妇女之家旧址，并将其整修为可以居住约50人的住所。”

“12月20日，自1918年至1922年白俄移民潮以来的最大一批外国难民抵达上海，524名德国犹太男女老幼于当天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靠泊汇山码头。本来预计有526名移民来沪，但有2人在来沪途中去了香港或马尼拉。救援委员会面对这一复杂情况采取了有效措施。移民们被有序地排列成行并分批送往各难民营。这些人中有近120名儿童。许多住房拥挤的上海犹太家庭来到救援委员会表

1_见《以色列信使报》这一期间相关报道。

示愿意在其孩子父母安置下来之前暂时照顾1到2名儿童，这些犹太家庭绝大多数是并不富裕的俄国犹太人。”

“12月31日，400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波茨坦号’和‘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这让救援委员会大吃一惊，因为原来预计的人数只有300人。从‘波茨坦号’下船登陆的应是70人，但实际为大约120人；而‘罗索号’则不是预定的240人而是280人。在这新一批移民中有28名儿童。大多数新来者先到河滨大楼居住。儿童的状况仍需要上海犹太家庭的帮助。现在有150多名犹太儿童生活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只有25人被安置在愿意暂时照顾低龄儿童的本地犹太人家中。尽管起初移民父母们不愿意与孩子们分开，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他们安置下来之前将孩子们交托在舒适、温暖的家中还是可取的。”

“1939年1月14日，约有50名经跨西伯利亚铁路横穿俄罗斯的欧洲犹太难民经由大连乘日本邮船Sansho号到达汇山码头。”

“1月15日，约有25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维多利亚号’到达上海。救援委员会在他们多数人登陆的汇山码头接待他们并引导他们至主要位于虹口和汇山码头附近的各个难民营。”

“1月29日，又有420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邮船抵达上海。他们被暂时安置在河滨大楼和阿哈龙犹太会堂睡地铺。有些人每天只能吃上两顿饭。目前在上海有2 305名难民，其中400人可以自立，有1 905人需要救援委员会照顾，救济的压力很大。”

“2月10日，至少85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法国邮船公司的‘阿陀斯二世号’邮船抵达上海。据报道，这些移民都是

偷越边界逃往法国马赛并继而乘船来到上海的。他们暂住河滨大楼。同时预计还有850名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于2月21日抵达上海。这将使本地难民总人数达到3 155人。"

"2月24日，又有85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

"3月5日，450名犹太难民乘'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按照先前的惯例，许多照顾新来者的救援委员会成员在码头迎接并照料他们通过海关手续，同时有许多辆卡车在入口排队准备运送行李。新来的难民部分由救援委员会安排到河滨大楼住宿，同时一些单身汉则在可以容纳1 200人的华德路难民营找到了住处。现在上海居住着大约4 500名德奥犹太难民，这些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正继续不断涌入上海。在救援委员会登记的已有3 945名，但登记过程尚未完成。数以百计的已登陆犹太难民也还未联系救援委员会，因为他们能够依靠来自上海或海外的朋友或亲属的资金照顾自己。在河滨大楼一楼的大部分住房之外，救援委员会还管理着三个难民营，每个能容纳约1 000人。"

"4月3日，在纪念犹太人出埃及的逾越节前夕，又有400名犹太难民抵达上海。他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位于华德路一座学校大楼内的难民营。华德路难民营负责人温伯格也在码头拥挤的人群中迎接他的妻子和孩子。维克多·沙逊则在码头海关处为焦急等待难民的人群拍摄电影。"

"然而真正不详的状况是在未来。据统计全世界接纳难民的月平均人数是3 000人，而本月仅上海就预计会有3 000多难民抵达。他们将乘三艘邮船前来，所有船只都是

为运送这些难民到上海而专程从欧洲开来远东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的‘朱利奥·切萨雷号’将从中欧运送1 600名犹太男女老幼前来上海。另两艘载有约1 500名犹太难民的德国邮船则将经由好望角来到上海。这两艘德国邮船是德国盖世太保为驱逐德国犹太人而专门租用的。尽管难民每人为此支付了2 000马克，但还是由于付不起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必须支付的外汇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估计将达到13 000人。救援委员会如何帮助这些难民解决食宿问题的确看起来像一个奇迹。通过到处租借、募捐，帮助照料了大约7 000名犹太难民。本月三艘犹太难民专用船抵达上海，并不意味着移民潮的结束。其他犹太难民还会乘其他船只抵达。此外，每两周一班的意大利邮船公司每次至少带了300到500名犹太难民。为使进入上海的数以千计的德国犹太难民自立，救援委员会也设立了17万美元的专门财政基金帮助他们，其中维克多·沙逊一人就捐赠了15万美元。目前已有350名犹太难民创业成功，如果加上他们的家人，自立的移民总数达到了690人。此外还有270名移民或在上海就业，或得到私人资助，这又使392人获得自立。现在依靠私人收入生活的移民总数已上升到1 082人，还有6 000多人要依靠救援委员会照顾。自到达以来，能够自立的难民比例已达20%，但如果没有这17万美元的财政资金，这一比例将低得多。”

“4月25日，220名犹太难民乘日本轮船‘Hakusaku Maru号’和‘格奈森瑙号’分别抵达汇山码头。同时，还有850人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来到上海。这使得上海犹太难民总人数达到8 400名。”

“5月8日，又有440名犹太难民从德国乘‘罗索号’邮

船抵达汇山码头。新来者中有50名儿童。来自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难民多数是男性，因为他们是从集中营中出来并被强迫离开德国的。许多人妻子和孩子已经在上海，也有许多人孤身而来。最初纳粹分子驱逐犹太人出境时还允许他们携带衣服和行李，但最近来到的难民仅仅带着手提包，他们说纳粹分子不允许他们携带其他任何财物。”

“5月14日，738名德国犹太人乘‘朱利奥·切萨雷号’邮船抵达目的地汇山码头。在上岸和经过海关时，难民显得较为轻松。他们说邮船没有在新加坡或香港停留而直接从科伦坡来到上海。他们说旅途总体还是很愉快的，因为这艘特别租赁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班轮是设施最好的船只之一，拥有两个露天游泳池。由于买不到德国和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船票，因为它们已经预定到10月份，所以才租赁了这艘班轮。

“其中一位难民说，这艘租赁的班轮的船票也是一票难求，即使有必要的证件和其他‘官方批文’，也难以用正常费用购买船票。实际上他们要以一倍半或两倍的价格才能购买到船票。新难民的到达使上海的难民总数达到9578人。许多是来与先期逃来的妻子和家庭团聚的。他们中有100人在汇山路难民营居住，100人在华德路难民营居住，120人在交由救援委员会处置的汇丰银行虹口分行旧址内居住，还有260人在兆丰路难民营居住，其余的则在河滨大楼居住。同时，救援委员会正在研究在其管理的住所数目不足的情况下建设大型难民营，以容纳预计年底要抵达的25 000名难民。难民登记中心位于九江路190号三楼。每位难民都要在这里登记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并提供一张照片，同时要求随身携带登记卡并将另一张卡保存在该办事处的档案

中。该项措施是为了控制和管理难民，并协助警方。”

“5月19日，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有155名犹太难民，包括45名夫妇和24名儿童。所有人的住宿都得到了预先安排。据悉，还有两艘专门租赁的德国邮船将运送犹太难民经南非和爪哇来到上海。这一路线的选取是为了避免支付苏伊士运河费用，因为这一收费只接受英国英镑，不接受德国马克。第一艘‘乌萨拉莫号’定于6月24日携461名难民抵达，第二艘‘坦噶尼喀号’定于7月中旬携450到500名难民抵达。难民委员会已从工部局获得了两所学校的使用权。这些学校整修后将可容纳1 400名难民。委员会预计6、7、8和9月都将有近3 000名难民抵达上海，因此需要建造更多难民营。这四个月约12 000名难民的到来有可能使上海犹太难民人数上升至21 000名。”

“5月22日，又有308名犹太难民乘‘维多利亚号’邮船抵达。”

“6月4日，465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救援委员会成员照看他们上岸并将他们运送到各难民营。多数人住在荆州路难民营，其他人则分配到华德路、兆丰路、汇山路难民营和河滨大楼居住。据估计，目前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为10 506人。”

“6月27日，862名犹太难民分乘两艘邮船抵达上海汇山码头。这使得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总人数超过了12 000人。”

“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上有827名难民，而法国邮船公司‘舍农索号’上有35人。除找到私人住所的100人外，所有人都安置在难民营。6月28日乘专门租赁的德国‘乌萨拉莫号’邮船到达的459名难民也得到了安

置。这批人中有114对夫妇，150名孩子，142名单身男子和33名单身女子。”

“8月7日，又一批265人的犹太难民男女老幼乘‘维多利亚号’邮船抵达并被带往汇山路附近各个难民营。上海的欧洲难民总数超过了16 000人。”

由此可见，从1938年8月到1939年8月初，在一年的时间里，抵达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一下达到了16 000人以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和以俄犹为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加在一起也不到6 000人，只及犹太难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强。

1939年8月限制令后的来沪犹太难民

虽然这些犹太难民的东方亲戚竭尽全力开展救援，但预计到1939年年底至少还将有12 000名犹太难民抵沪，援助的压力可想而知。由于人手、财力等的限制，在犹太难民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1939年5月，猩红热在上海犹太难民营传播，情况非常严重，大约有200多人受到感染，超过150名的病人被送往兆丰路（今高阳路）的急诊医院，其余病人则在租界其他医院接受治疗。

上海犹太社团并没预料到纳粹德国最后会对欧洲犹太人采取大屠杀政策，而是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深感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并导致难民灾难，于是建议予以适当的限制。与此同时，他们一再呼吁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团增强对欧洲犹太难民的接纳和救助。上海犹太救援组织负责人、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万国储蓄会总经理米歇尔·斯皮尔曼告知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持续的难民潮涌向上海，意味着一种无限度的危险。如果这个

问题变得严重起来，那么工部局就有责任保护公共租界内上海犹太难民，采取措施禁止那些失去生存手段，或没有就业前景的犹太难民在上海登陆。他迫切希望有关国家的领事们将这种情况紧急通报各国海运公司。一些俄犹从事的是非专业、资质低、报酬少的职业，因此他们也非常担心新来的难民会以接受更低工资，甚至几小时无偿工作来与其竞争工作岗位。1939年5月，维克多·沙逊等与日本占领当局官员举行了会晤，表示如果对无限制流入的犹太难民予以适当的控制的话，不会遭到全体犹太人的普遍反对。

同时，随着来沪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正常的租界生活遭到巨大冲击，租界管理也日益混乱，这引起了租界居民的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当时租界里就流传由沙逊家族投资的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考虑解雇白俄雇员，改聘犹太难民，造成俄侨的恐慌，反犹主义也在他们中间蔓延。署名为反犹组织KKK的小册子《中国、日本和异教徒们的警告，难民入侵上海》在上海流传，其副标题为“准备抵抗经济入侵和准备迎接犯罪、暴力与阴谋的时代”。其中写道：“上海突然间变成了那些分别在奥地利、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事破坏的人，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普遍依靠德国、奥地利和捷克劳动者出钱供养的人之‘福地乐土’。希特勒的‘受害人’，连同他们的鹰钩鼻子和喇叭口形的鼻子，继续涌向上海。他们漂亮衣服的口袋里装满了英镑和美元。谁会真正相信犹太人的宣传呢？这种宣传断言，希特勒驱逐了奥地利和德国所有犹太人。这些‘贫苦人’在一等或二等船舱中旅行，到处租借高价的房子，同时又要求上海的国际社团为他们找工作并养活他们。我们本来根本不会关注犹太宣传，只不过我们突然间在大街上发现这些‘难民们’都携

带着照相机，连续不断地出现在兑换所，在咖啡店大啃大嚼点心，并在时髦的饭店中用餐，你可以想象下那些致力于救助中国和俄罗斯难民的人该会多么惊讶！因为这些人刚刚还向他们呼吁'帮助我们吧！我们这贫苦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

《大美晚报》上也有一篇题为《犹太难民构成经济威胁》的文章，副标题是"欧洲流亡者即将形成第4类洋人"，明白地表露了部分外侨对犹太难民工作竞争的担忧。租界当局也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一些西方的富翁也有他们的不满，认为白色人种富裕而高贵的威严形象因为这些德、奥犹太人而黯然失色，因为后者不惜从事体力劳动，甚至从事当时仅仅留给中国人的职业。

同时，由于难民大量涌入上海，并且绝大多数生活在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地区，使得当地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官方文件做出回应，表示："必须保卫日本不受犹太移民事业成功的伤害。"1939年7月16日，N. Y. K邮轮"Suwa Maru号"轮船从欧洲返回日本途中在上海靠岸，卸下64名犹太难民，他们被安置在虹口。日本当局随后宣布，今后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但是，日本当时又担心限制犹太难民可能会引起美国、英国犹太人的不满，影响"河豚计划"的实施[1]。但在上海犹太人主动要求日本当局采取限制措施后，日本即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予以限制，并强调这项措施是在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本身的要求下采取的。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1939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发布了

1_所谓"河豚计划"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提出的一项计划，标题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首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应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来访问"居留地"；通过建立该"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该计划之所以命名为"河豚"是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是有剧毒。日本人借河豚比喻吸收犹太人移民一方面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又很危险，好比河豚，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

一项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发布会上，有记者发问："日方有何权利采取这一在苏州河以北区域限制居住的政策？"日本发言人非常傲慢地答道："日本已军事占领并控制了部分公共租界，因此他们有权随时颁布相关法令。日方已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德、意等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他进一步指出，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将威胁到苏州河以北区域的居民日常生活。这也是上海犹太组织的观点，他们也不希望有进一步的难民进入。不算难民营，居住在该地区的犹太人相当于居住在那日本人的十分之一，因而当局也非常担心两个外侨社团之间发生摩擦。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给上海犹太救济组织的备忘录也明确提出，8月21日后抵达的犹太难民将不允许在虹口生活。日本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迄今为止没有对在日方占领土地上的犹太难民安置施加任何限制。但是，考虑到1937年淞沪会战对此地损毁严重，导致房屋减少，因此日本当局决定减少进入上述地区的人流。同时，考虑到各有关方面利益，在未来安置更多移民的可行性研究作出之前，将暂停新的犹太移民活动。备忘录要求制作一份上海犹太难民名录，并由救济委员会上交日本当局。登记完成后，经日本占领当局审查后向登记人员颁发身份证。只有那些拥有身份证的人才允许在苏州河以北地区经营商业。那些目前居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必须在8月22日前向日本当局登记，否则将不允许其合法居住在那里。

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也通知所有领事馆和有关船运公司，不再允许欧洲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登陆。工部局官员表示，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

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 000人，年底之前预计还将有5 000人抵达。由于日方已禁止他们进入苏州河北地区，因此他们将被迫前往苏州河南地区居住。如果说，在有许多空置土地和空闲建筑的苏州河北地区已没有接纳新难民的居住空间的话，那么在淞沪会战后已人满为患的苏州河以南地区就更捉襟见肘了。由于居住、医疗等条件已极其紧张，上海已到了无法再接受更多难民的程度。任何传染病的爆发都将是灾难性的。数月前猩红热袭击苏州河北地区难民时，该传染病之所以得到成功处置是因为拥有足够的急诊医院，同时难民自己也还可以照顾他们的患病同胞。但如果在苏州河南地区数以千计的难民中爆发类似传染病，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整个地区没有一座空闲建筑可当作医院，而且所有医院都已经人满为患。但他同时指出，新规定将不适用于那些已经登船或者在前往上海途中的欧洲难民。由于在船只到达香港之前无法获得准确数字，因而到底有多少难民正在前往上海途中还难以确定。

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做出限制来沪犹太难民的决定后，法国总领事也发布命令，禁止更多犹太难民在法租界居住。所有前往上海的船运公司也都获知了这一新规定。

上海犹太组织根据日本8月9日和工部局8月14日的通知，电告驻在伦敦的德国犹太人理事会，后者又通知了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从欧洲向上海的移民必须一律停止。在德国和意大利，各邮船公司张贴告示，宣称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黯淡，并以此希望能劝阻那些申请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这两条禁令8月16日在上海的报纸发表后，不难想象当地的犹太难民是何等焦虑不安。那些有亲戚即将乘船来沪或已在途中的人，受到的打击最大。那些预定了8月14

日以后船票的人，立即就发生了邮船公司和某些航线退还定金的问题。后来，希伯来移民援助会接到通知，有4艘预定在8月14日至21日离港的、载客631名的邮船将获准下客登陆。但是，上海的犹太难民仍然忧心忡忡，与上海各个行政当局秘密商谈，希望能改变相关规定。后来，终于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达成了协议，并于10月22日公布。

新的协议指出，工部局8月曾宣布被迫禁止任何欧洲犹太难民进入公共租界，但该禁令不适用于符合下述条件的人：① 可支配资金不少于400美元或相同数值的其他外币的成年人，13岁以下儿童为100美元；② 船运、铁路公司或其他旅行代理公司有责确定购票者拥有这些资金。这些机构必须从上海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获得相关资金证明；③ 拥有资金证明的上海犹太居民直系亲属、有合同可在上海就业者、上海居民的未婚妻或未婚夫者。符合这些条件的必须通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向工部局申请，并由工部局审核。这样，就给欧洲难民进入上海重新开了一道口子。但是这一条例仅适用于工部局控制的公共租界，而不适用于日本人控制的虹口，也不适用于法租界。日本人删去了400美元这一条，并说他们将根据每项要求入境许可证申请的本身情况来加以考虑。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透露，除了极少数难民外，都将不会被允许进入虹口和法租界。1940年1月的一封日本在华外交官的通信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了许多入境许可证。而日本方面直到那时为止仅发放了25张许可证。

因此，虽然1939年8月上海各行政当局都发布了限制欧洲犹太难民入境的命令，有不少犹太难民仍然通过各种

渠道进入上海，但人数急剧下降了。从1939年8月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近1年的时间里，从海路和陆路，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估计最多在1 000人左右。1939年8月28日，大约619名难民乘“朱利奥·切萨雷号”抵达上海，这些就是8月14日禁令之前离开意大利，并允许登陆的那批犹太难民[1]。9月1日二战爆发后，那些仍在海上的犹太难民的命运就更加难以确定。当时就有报道称，这些德国犹太难民预计将在中立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港口靠岸，但他们是留在东印度群岛还是换乘中立国船只来沪仍不得而知。同时，由于英国对德宣战而驱赶德侨，也导致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新加坡等来到上海。可笑的是，按照希特勒的法令，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

此后，只有零星的邮船携犹太难民从欧洲抵达上海。1940年1月22日，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带着70名难民抵达上海。与那些先前到达，且已在上海安家的多数难民不同，因为要符合工部局去年10月份的新规，这些难民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多数人在证明他们拥有400美元后，在公共租界居住下来。一些人在获得日本当局的特别许可后在虹口安了家，这些难民中的大多数不是从德国直接过来而是在意大利居住了一段时间，并从海外获得了足以支付路费以及日用的资金资助。2月9日，又有161名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罗索号”抵达上海。3月5日，经德国政府允许并经西伯利亚来到远东的德国犹太难民由大连转乘日本船“Maru号”抵达上海。4月4日，又有约100名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佛德号”抵达，他们获得了资金证明，主要是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

1_《以色列信使报》，1939年9月12日。

波兰的犹太人。5月9日，211名犹太难民乘“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他们主要来自柏林、布莱斯劳（战后划归波兰后改名为弗罗茨瓦夫）、但泽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大多是来上海与家人团聚的。6月6日，263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来到上海。其中多数来自德国，但还有一些奥地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大约50人。据信，这很可能是从欧洲海路直接来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因为本来已预定5月6日搭乘“佛德号”来上海的犹太难民在德意边境的布雷纳被送回慕尼黑，因为意大利政府担心即将来临的意、英之间的战争将威胁到该船出航[1]。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接着法国便战败投降，此后英国和德、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战火还蔓延到了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西亚。这样，欧洲犹太难民从海上来沪的传统路线全部被切断了。同时，由于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希腊等巴尔干国家先后沦入纳粹魔掌，波罗的海三国面临纳粹威胁，后又被并入苏联，而德国占领军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排犹，使欧洲犹太人外逃的潮流更为汹涌，但成功的比例也日益降低。这一阶段仍有不少人希望来上海，但只能转而走陆路——穿越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上海。1940年6月后由陆路来到上海的难民估计在2 000人左右。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欧洲犹太难民从陆上来上海的路线也被切断。此后，再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陆前来上海。然而，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和日本的犹太难民，由于战火四起、各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而无处可去，结果又辗转来到上海，其中

1_《以色列信使报》，1940年6月14日。

大多数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的犹太难民，人数应该在2 00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1 100余名波兰犹太难民来沪的曲折经历，他们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卢布尔经学院等犹太经学院的师生400多人。他们在1939年德国人侵波兰前后陆续逃往立陶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逃离欧洲的办法：以前往荷兰殖民地库拉索为由取得进入日本的过境签证，然后再设法从日本去美国。经过艰苦努力，并得到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的全力支持，他们居然获得了去日本的过境签证。在立陶宛并入苏联后，他们又获得苏联政府的离境许可，在苏联旅行社的安排下，每人交付了200美元，坐火车横越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再从那里乘船抵日本神户。在神户滞留了半年多，他们始终无法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后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特派代表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等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上海的许可证，于1941年下半年分批来到上海。据当时报纸记载："1941年8月22日，又有296名犹太难民从日本神户和横滨乘日本轮船'Asama Maru号'来到上海，其中有255名波兰犹太人和16名德国犹太人。他们1年前就离开了战乱的欧洲，其在日本停留的签证期限尽管只有2周，但仍在那里居住了10个月。新来者中有许多犹太拉比，他们被送往阿哈龙犹太会堂并暂时居住在那里。"[1]他们也许是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前来到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与外界的海上联系已全部被切断，犹太难民从海上进入上海已几无可能。

结　论

据1941年2 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

1 《以色列信使报》，1941年9月19日。

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1940年上海仅在该委员会登记的犹太难民就有23 310人[1]。此后，人数略有变化：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韩国、日本转来了部分滞留难民；同时，一些犹太难民前往了第三国，如1940年有102名德国犹太难民经西贡前往法国，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与纳粹作战，又如1941年下半年，29名波兰犹太难民前往巴勒斯坦，参加犹太复国主义拓殖工作。

综上所述，二战期间上海至少有2.5万左右的犹太难民长期居住，研究大屠杀问题的国际权威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数字正好与此符合[2]。根据这个数字，如再加上1933年至1941年间途经或短暂居留上海后前往第三国的犹太难民，那人数就更多了，估计在3万人左右。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是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人数最多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王健教授专为本书撰写的论文，在此表示感谢。此次刊发编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并调整了小标题。）

1_《以色列信使报》，1941年2月21日。

2_格罗曼和兰迪斯（A.Grobman & D. Landes）：《大屠杀研究评论集》（*Genocide,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洛杉矶，1983年版，第299页。

来到中国其他城市的犹太难民

潘　光　张健荣　张忆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成了欧洲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他们历经艰辛，从海路、陆路来到上海寻求庇护。同时，在前往上海的途中，一些难民因种种原因滞留并定居在中国其他城市。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中，也有一些因各种原因又去了中国其他城市。还有部分欧洲犹太难民利用各种关系逃离纳粹统治区域，直接来到了中国其他城市。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在那里同样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拯救和善待，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从此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城市接待过犹太难民，也难以在这里一一介绍所有接纳过犹太难民的城市，只能选择几个接待犹太难民较多或者较有影响的城市做一个简要的综述。

哈尔滨和大连

哈尔滨、大连等东北城市是犹太难民横跨西伯利亚前往上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有些难民的避难目的地。到达这些东北城市的犹太难民中，有去上海途中中途滞留下来的，有到了上海后又离开上海来东北的，也有拿了“满洲国”驻德机

构发的“签证”直接来东北的。[1]

在此期间，哈尔滨犹太社团为接纳来到哈尔滨的德、奥犹太难民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奥地利维也纳著名钢琴家、指挥家维里莫施·津格尔带其乐队及家属一行19名犹太难民辗转来哈，就得到了当地犹太慈善组织的精心安排。赫尔穆特·斯特恩是德国犹太难民，后来成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他在回忆录《弦裂》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经上海流亡哈尔滨的经历。[2]

当年在哈尔滨避难的犹太难民鲁滨孙 (W. Z. Rubinsohn) 回忆道：“1939年的时候，正是这座城市接受了当时逃难来华的我们。当时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从德国逃亡到这里——一个对我们来说，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城市。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哈尔滨成了我们的‘新家’，从此便一直在这里居住、生活。”[3]根据这一亲历者的回忆，如果1939年哈尔滨已有欧洲犹太难民150人，那么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数字估计要上升到200～25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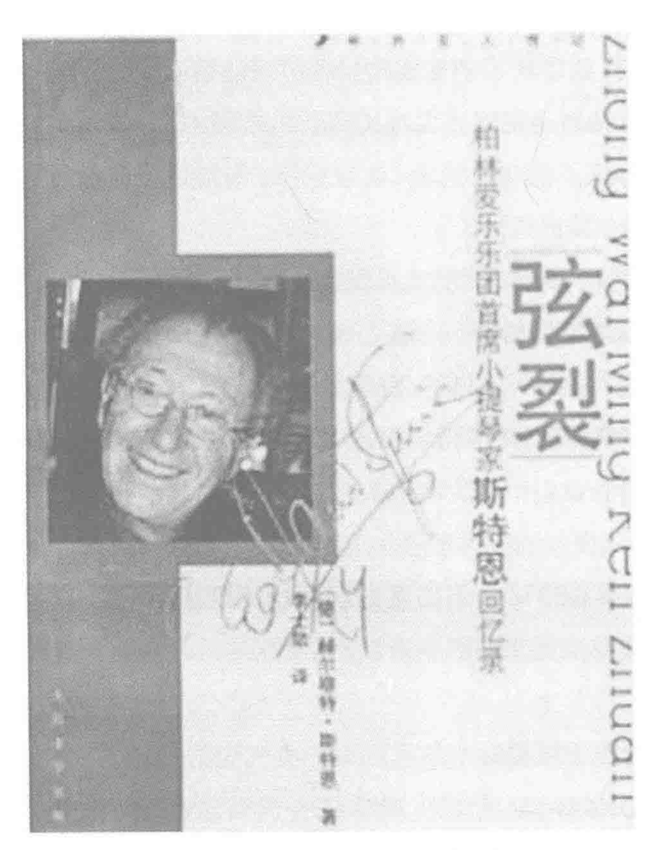
大连的犹太社团在哈尔滨犹太中央机构的领导下，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将大连变为来自上海的犹太难民走进东北的入口。《以色列信使报》的一则报道显示，1939年1月乘意大利邮船到达上海的一批犹太难民中，有20人准备前往大连，共有近300名移民从大连港口当局获得了定居许可。[4]1939年12月，出席第3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的大连犹太社团代表、无国籍商人考涅尔称，1939年夏天，犹太商人比尔布莱耶尔在大连发起建立犹太难民儿童收容所，收容了来自上海的贫穷的难民儿童50人，其中男孩34人，女孩16人，经费则由哈尔滨犹太社团和大连犹

1_参见王替夫口述，杨明生执笔：《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_赫尔穆特·斯特恩著，李士勋译：《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第35—38页。

3_摘自编者对鲁滨孙的采访记录。

4_《以色列信使报》，1939年1月20日。



犹太难民斯特恩一家在哈尔滨度过了避难岁月，这是赫尔穆特·斯特恩的回忆录《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中文版

太社团共同资助[1]。

美国学者赫尔曼·迪克在《远东的移居者和定居者》一书中也提到在大连的欧洲犹太难民。他指出:"1938—1939年,不少中欧犹太难民因在上海谋生不易,不经允许乘船来到大连,要求获得'满洲国'护照。1941年,大连犹太人共259人,其中无国籍143人,苏联64人,德国5人,拉脱维亚3人,波兰12人,立陶宛20人,捷克3人。"[2]从这一统计可看出,在1941年,来自德国及德国占领或即将占领的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捷克的犹太人肯定是难民,无国籍犹太人中大多数也是难民,还有一些人则是获得了苏联国籍的犹太难民。因此,当时在大连的欧洲犹太难民至少有150～200人。

青　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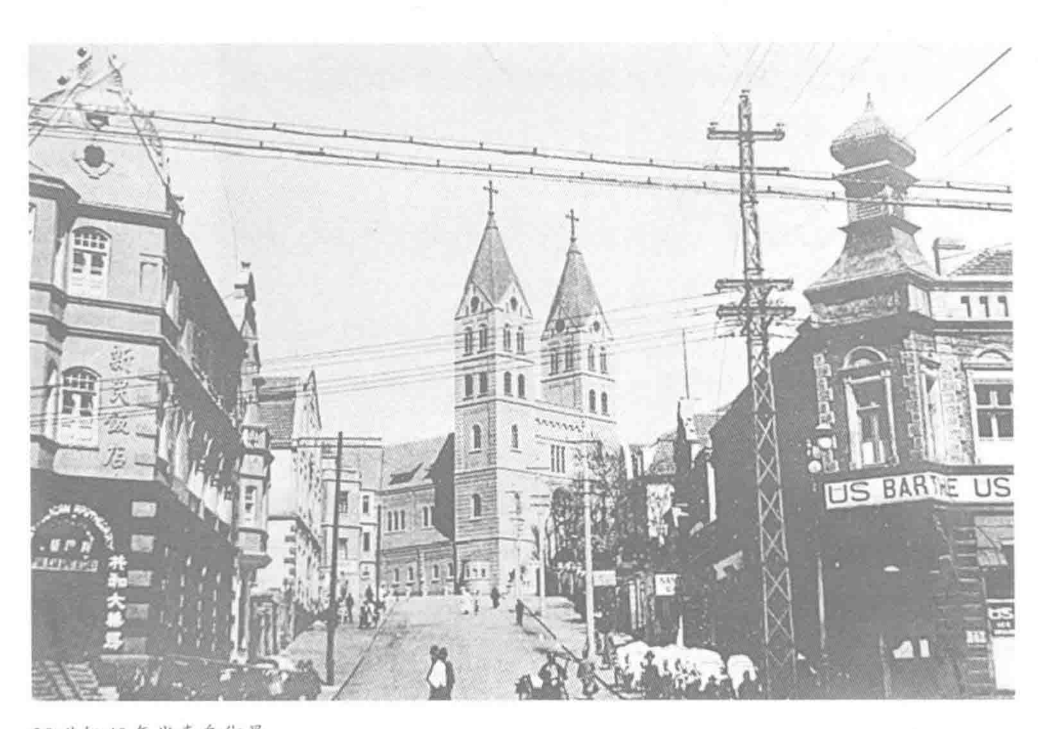
虽然最早定居青岛的犹太人来自德国,但这个犹太人聚居地是随着1917年俄国革命后大批俄国犹太人的来到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原来德国殖民地的青岛,相对熟悉的生活环境也吸引了部分德、奥犹太难民前往避难。随着纳粹反犹恶浪的升级,有65名说德语的无国籍中欧犹太难民在1940年来到青岛,使犹太社团的德国色彩有所增强[3]。1941年,北平《中国公论》刊有《犹太人在东方》一文。据该文统计,到1940年10月,青岛有犹太人约221人,其中无国籍173人,德国48人,英国12人,美国7人,其他5人[4]。可以肯定,无国籍或德籍犹太人中有不少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德国教授威尔·马扎特经研究发现,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有不少犹太裔教授和讲师。1933年至1937年,至少有2名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教授和讲师是逃避纳粹德国来华的犹太

1_房建昌:"21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_赫尔曼·迪克(Dicker, Herman)著:《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犹太人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世纪》(*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纽约,1962年版,第53页。

3_马查特(W.Matzat):《青岛德国学校简史(1924—1946)》(*Short Chronicle of the German School in Tsingtao, 1924—1946*),波恩,2001年版,作者自行印制。

4_东山紫明著,吴明堂译《犹太人在东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20世纪40年代青岛街景

难民。一位是乔·斯特恩博士，另一位是马丁·伊格尔博士，他是由斯特恩介绍而来。此外，库特·佩菲尔教授的妻子也是犹太难民。1938年，山东大学因日军占领而关闭，他们也被迫离开了青岛。

根据上述资料推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青岛至少有100余名犹太难民，绝大多数是1939年至1941年之间抵达，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教授、医生。有一些后来又去了哈尔滨、天津及周边城市芝罘、德州等。1937年、1938年和1939年，青岛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3届远东犹太人大会。1939年，青岛犹太社团主席托瓦宾斯基在会上宣读了青岛犹太社团报告，称社团已经过了初创时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社团接受的犹太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生活安定[1]。

犹太难民费里德里希·格罗希回忆道："1939年，经过30天的海上航行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上海。……此时，一个住在青岛的名叫金斯伯格的法国犹太人建议我们移居到青岛，因为在那儿可以谋得一份工作，生活质量要比在上海好得多。……我们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日本人签发的由上海到青岛的通行证。到了青岛后，我们在广西路42号搞到了一间公寓，位于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警察局对面，距离码头也不是很远。美国人到青岛之后，我们靠着把房间和公寓出租给美国海军人员获得一些收入。查尔斯学会了说中国话，成为一名初级接待员。从1939年至1940年期间，他供职于犹太人开设的艾吉瓦尔特酒店，该酒店被美国海军官员租用，1940年之后由日本人接管。……那时，在青岛所有的外国人一律被要求佩戴显示其国籍的臂章，我已记不起我们臂章上写的是'奥地利人'还是'犹太人'。在

1_房建昌："青岛犹太人小史"，《青岛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青岛涉外足迹》，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2 000名欧洲人住在青岛，其中一半是德国人，只有一个很小的犹太社团定居在青岛，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哈尔滨，像我们家那样从上海来的很少。”[1]从这段亲历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犹太难民家庭在战时青岛的真实生活写照。

天　津

1901年，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大约有100人。1920年时，增加到200人。到了1930年，已有500多人。到1935年以后，犹太人的数量达到了1 500人。特别是1938年以后，200多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来到了天津。这200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也先后参加了天津犹太人的主要组织——天津希伯来协会。不过，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名字叫欧洲犹太移民协会，这个协会吸收了所有为逃离纳粹迫害而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德奥犹太难民中大约有20名犹太人接受了天津希伯来协会的帮助，每月大约有130 000元国币[2]。

此后，在犹太难民直接进入上海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一些犹太难民获得了前往某些国家的临时签证或中转签证，然后持这样的签证经由苏联和“满洲国”来到日本人控制下的中国北方，其中就包括天津。本来，持这些签证的犹太难民只被允许短期居住，但后来有些人设法获得签证延期，得以长期居住在此。二战期间出版的《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称：“1939年12月8日，已有169名欧洲犹太难民申请者获准来天津居住，还有128名未定，持许可证已经抵达的有56人。天津犹太人会尽力解决有关难民问题，如就业、财政支持等，但天津仅有犹太人1 800人，值此经济

1_潘光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2_贝克曼（M.W.Beckelman）：“天津犹太社团”（The Jewish Community of Tientsin），载《犹太中心》（*The Jewish Center*），1946年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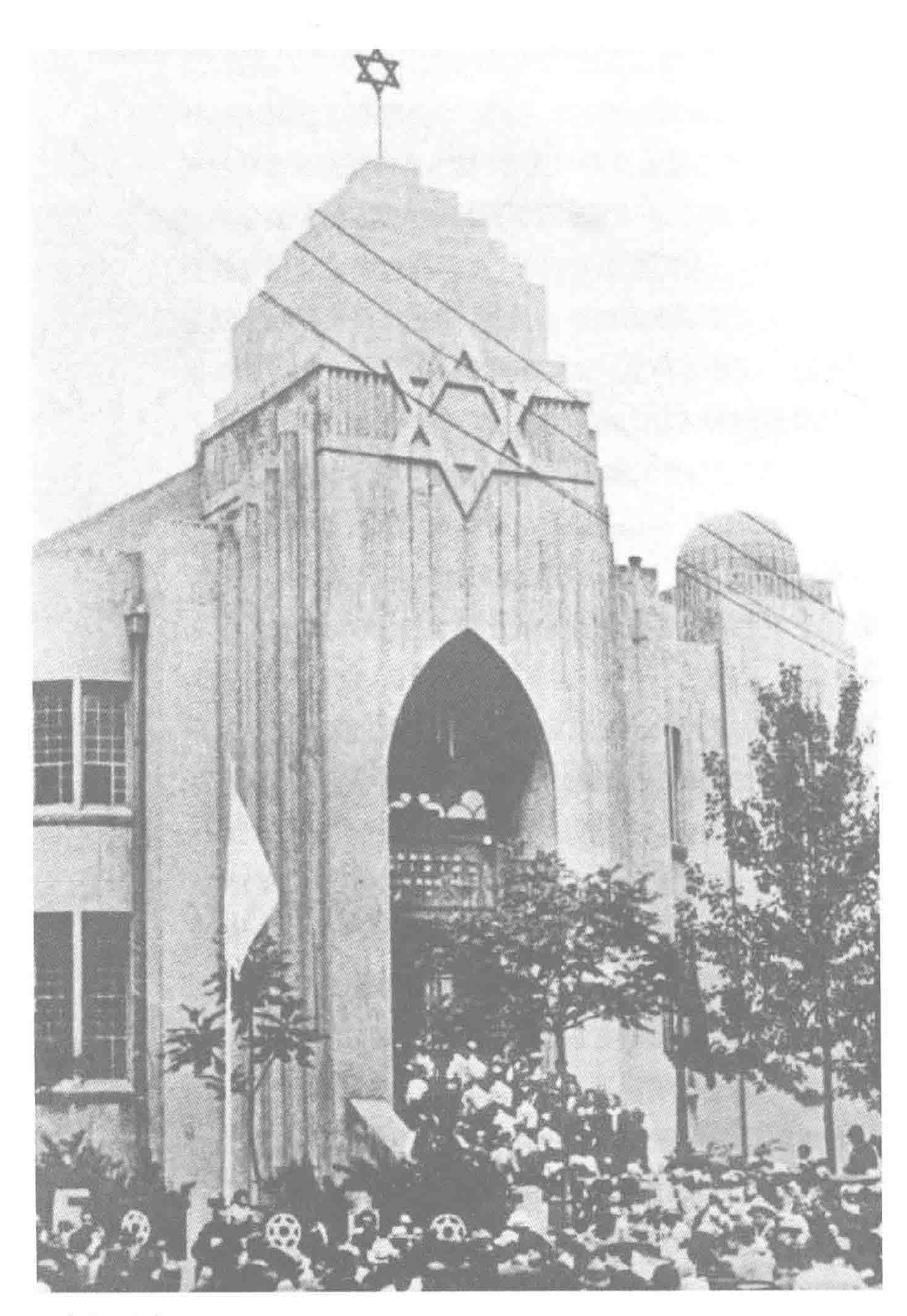
恐慌时期，如过量流入难民，必然会对生活稳定造成冲击。作为解决之策，可考虑农业移民，如向内蒙古三河地区移民。”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当局对持证旅行控制更为严格，此后几乎再没有犹太难民进入天津。[1]

1943年，人们获知大约有7个欧洲犹太难民家庭接受了德国驻天津领事馆的资金帮助，于是难民组织内部发生了矛盾。受援者声称，德国驻天津领事给犹太人援助是因为他是反纳粹人士[2]，因此对犹太人表现出一些同情。不过，大多数欧洲犹太移民协会里的犹太难民认为德国领事的用意十分险恶，不应接受他给的钱。到底谁对谁错，确实很难判断。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那7个犹太家庭被开除出了协会，后来又被开除出了天津希伯来协会。直到1945年，在那7个犹太家庭保证不再接受德国官方的援助以后，他们才被协会重新接纳。其中两个家庭未能实现承诺，后来再一次被开除出去。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否继续接受德国领事的援助。在天津犹太社团的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因政治问题将若干家庭开除出社团组织的事件。除了这次意外事故以外，天津犹太人所经历的困难要比人们想象的在战争期间经历的困难小一点，因为包括天津在内的中国北方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后就被日本人占领了，并没有经历淞沪战争那样的激烈战事。

伊莎贝尔·玛纳德在她的自传《中国梦——一个犹太人在天津长大》中记述了有关犹太难民的情节。位于小白楼的维多利亚咖啡店里有一个四重奏小乐队，其中的小提琴手、犹太人勃曼也来自德国。战前，他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天津，与他的伙伴们组成小乐队，靠在餐馆里为食客表演乐曲来赚取部分生活费用。

1_贝克曼(M.W.Beckelman)：“天津犹太社团”(The Jewish Community of Tientsin)，载《犹太中心》(*The Jewish Center*)，1946年6月号。

2_有文章称当时德国驻天津领事是反纳粹分子，但也有一些著述否定这一说法。



天津犹太会堂

维多利亚咖啡店里的收入不足以弥补家用，勃曼还要另外再打两份工。他和伙伴们走遍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婚礼和有钱人家的宴会上演奏；他还开设了小提琴课程，收取授课费。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人们总能看到他流着汗演奏，看到他飞快地抹去脸上的汗水而不丢掉任何一个音符。他的琴弦上总是缭绕着多瑙河的波声和维也纳森林的气息。对故乡的思念让他的心经常隐隐作痛[1]。

现居以色列的天津犹太人卡布宁斯基回忆二战期间难民来津的情况时指出，天津犹太社区的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成为逃过大屠杀后的犹太人安全的避难所。难民们逃出纳粹德国，刚一踏上天津的土地，在社会、教育以及文化设施等方面的事情就已被安排妥当了。他们可以在犹太会堂里祷告，可以随时出入犹太俱乐部，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天津犹太学校里读书。这些难民中很多人都是某些领域的专家，他们对天津犹太社区起到了很多积极的影响[2]。

香　港

据1939年2月的一项统计，自德国大规模排犹以后，大约有2 500名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香港，其中许多来自上海，也有直接从欧洲过来的。可以肯定，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欧洲犹太难民。

据《以色列信使报》报道，就在上海日本当局和租界当局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开始实施限制措施时，1939年8月28日，有数百名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的“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在香港登陆[3]。

但是，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德

1_参见宋安娜主编：《犹太人在天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中英文）和宋安娜著：《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_摘自编者对卡布宁斯基的采访记录。

3_《以色列信使报》，1939年9月12日。

国进入战争状态，英国开始在其控制区域驱赶德侨，竟然又将百余名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的德、奥犹太人作为“敌侨”，从香港、新加坡等地赶到了上海。不过，就连英国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也不愿接收这些“敌侨”。

重　庆

从最新出版的犹太人回忆录中，我们发现还有极少数欧洲犹太难民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沃尔夫岗·卡佛岗的回忆录《重庆往事》详细记述了他和父亲逃亡重庆的经历：

“大多数到上海的移民都是从意大利乘船去，到达上海后，他们得到了庇护。也有一部分人乘火车从波兰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到达满洲的大连港。从那里再乘日本的海岸蒸汽船，花三天的时间到达上海。我们去问过船票，船票早就预订到了明年了。并且，我们的火车要经满洲再到上海，而满洲已经被日本占领，需要过境签证。日本领事馆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们的签证申请。

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里昂从中国来信，告诉我们他和现在的妻子弗莱德尔，还有儿子全家，住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伯父根据亲身经历和较为灵通的信息认定，跟中国的政府部门转移到大后方比较安全。那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旅行社已找不到任何一条水路或陆路让我们能够到达上海，到重庆也是战时的形势所迫。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放弃了利用在东北犹太人的方案，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处境就很困难了，而上海的犹太人被迫迁入小小的虹口区隔离地带，生存条件极其糟糕，毫无自由可言。因此，到重庆是英明、圆滑且有社交能力的伯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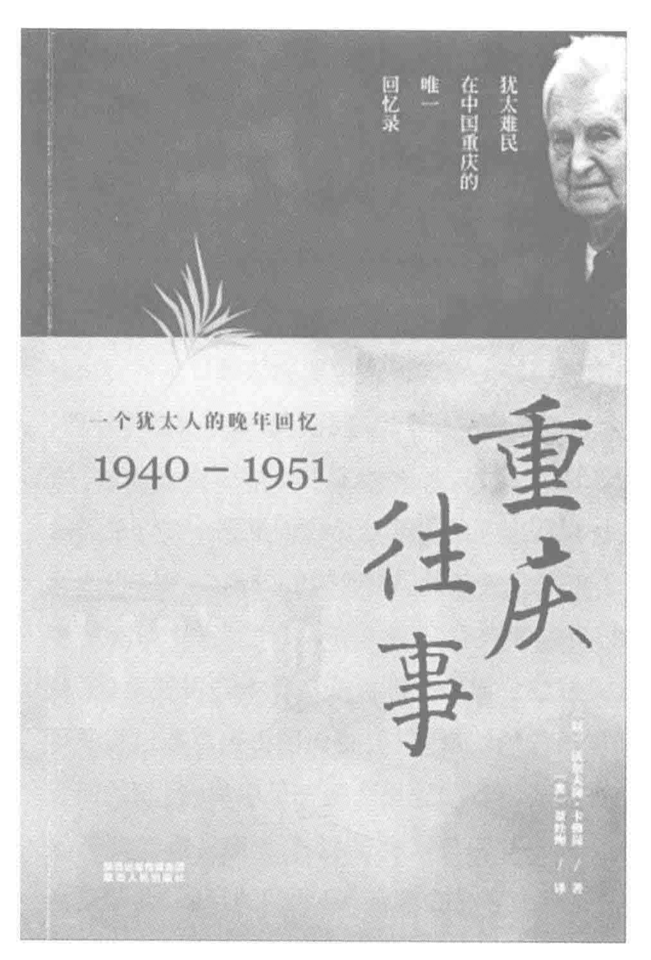
明智选择。

父亲和伯父两兄弟之间的通信很费时，几个星期才能收到一封信。伯父在信上说，他和中国的高层人士有关系，有办法签发一个到中国内地的入境签证。而到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坐船或者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去都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中国驻柏林的大使馆拿到去中国内地的签证，不是去上海，而是去中国的战时首都！每天，我和父亲一家家旅行社跑，想打听出一条去中国的通道。他们都说可以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经俄罗斯到满洲再转上海。但这样要先取得日本的过境签证，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最后得到的只是：'不行！下一个，请！'

总算有一家叫库克的旅行社让我们见到一线曙光。他们说，新开了一条俄中航线，在俄国境内离中国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有航班飞往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有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再从乌鲁木齐飞往重庆，那就是我伯父里昂住的城市，只要我们取得俄罗斯过境签证就行。我们在苏联领事馆排长队递交了申请，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必须耐心等待莫斯科的批准。我父亲告诉苏联人，德国共产党的罗莎·卢森堡[1]是我们的亲戚，希望这会有所帮助，但我们还是等了很长时间。……

终于，在几个月的等待后，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拿护照到俄国领事馆盖章。我无法描述当时有多么激动兴奋，我甚至梦想在沙漠里生活，住在帐篷里过夜。几天以后，我们和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姑妈夫妇告别。那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出境课以越来越高的移民税，除了随身带5个马克出境外，所有存款予以冻结，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地侵占。接受

1_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出生于犹太家庭，德国、波兰工人运动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领导1919年1月柏林工人起义时被杀害。



犹太难民沃尔夫岗·卡佛岗与父亲在重庆度过了避难岁月，这是他的回忆录《重庆往事》中文版

国家的门槛也高，除了有配额限制以外，对申请人有财产、职业和技术等诸多选择，比如巴勒斯坦就需要2 000英镑的入境费。这样高的移民费用对穷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能够逃脱厄运的犹太人到了异地几乎是身无分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出德国的。我的姑妈和姑父，他们就几乎没有丝毫希望离开德国。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没有听说毒气室，但我知道留在德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而几年以后，我们就听说他们'消失'在集中营里了。"[1]

怀着复杂的心情，卡佛岗父子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一路上，他们还时时担心会出什么事，毁了他们的"中国梦"。最后，他们总算到了阿拉木图。在那里住了五天，然后乘苏联飞机到了中国的乌鲁木齐，进入了中国。又经过在兰州转机，最后的航程终于把他们带到了目的地重庆[2]。

就这样，卡佛岗父子在重庆度过了战争时期。卡佛岗的父亲战后在重庆去世，卡佛岗本人与中国姑娘刘素兰结婚，于1951年移居以色列。

几点结论

通过上面的简要综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不仅上海向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中国的其他许多城市也为犹太难民们提供了避难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将上海作为在华犹太难民研究的重点时，也应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到达中国其他地方的犹太难民。

(2) 除上海外，犹太难民们主要逃到了中国北方的城市，如前面提到的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等，以及前面无法一一提及的城市，如北京、沈阳、长春、齐齐哈尔、海拉尔、

1_沃尔夫岗・卡佛岗：《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1951）》，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7页。

2_沃尔夫岗・卡佛岗：《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1951）》，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7页。

满洲里等。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1931年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1937年后又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因此那里不像中国其他地方那样战火频频，比较有利于犹太难民暂时避居。

(3) 重庆这个例子说明，也有少数犹太难民来到了仍在中国控制下的地区，如战时首都重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他们对中国坚持抗战具有信心。以此推断，在当时中国的“后方”城市如西安、成都、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也可能有犹太难民避居，对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收集线索、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

(张健荣、张忆南均为《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课题组成员，张健荣主要研究中国北方城市的犹太人，张忆南研究青岛犹太难民，并提供了相关资料，本文为三位专家合作撰写。)

犹太难民斯特恩一家在哈尔滨的流亡生活

张铁江　孟昭臣

赫尔穆特·斯特恩(Hellmut Stern) 1928年出生于德国,5岁学习钢琴,9岁学习小提琴,从小具有音乐天赋。1938年12月底与父母一起抵达上海避难,后转赴哈尔滨,在那里继续学习音乐,17岁就进入哈尔滨交响乐团。1949年,他与父母移居以色列,在那里加入以色列爱乐乐团,后加入过美国和德国的多家乐团,最终成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他多次重返中国,访问"故乡"哈尔滨,进行演出和讲学,并资助许多中国青年出国学习音乐。

我们在这里记述的是斯特恩家在二战期间遭受迫害、被迫流离失所,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真实经历。斯特恩一家出生并祖居德国,作为犹太人,他们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在大祸即将降临之时,他们设法逃离德国,来到神秘、陌生的东方古国——中国,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又来到新兴开放城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东方巴黎哈尔滨。他们虽已身无分文,但在中国与人为善的环境中,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平民生活,躲过了对犹太人的惨无人道的杀戮。同时,在哈尔滨的良好音乐氛围中,斯特恩

以其勤奋和天赋刻苦学习，为后来赢得世界声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逃离德国

斯特恩家族祖居德国，斯特恩的父亲基特马尔·斯特恩1880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拉比家庭。1895年，他来到柏林一家银行工作。在业余时间里，他到克林特沃尔沙尔文卡音乐学院两位著名的老师那里学习声乐。斯特恩的母亲伊尔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钢琴弹得很好。

希特勒上台后，对德国犹太人和左翼人士大肆迫害。作为左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又是犹太人，斯特恩父亲凭其政治嗅觉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毅然决然地决定率家人逃离德国。他先把两个女儿送出德国并安排到了当时在英国统治之下的巴勒斯坦。接着，他向全世界许多国家发出移民申请。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仍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余波之中，对待移民申请非常严格，均要求移民“出示”一大笔钱，作为生活保证金。由于斯特恩家很穷，根本没有出国费用，因此总是收到拒绝的答复。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继续向全世界发出申请信，但常常陷入无穷无尽的等待。每天早晨，只要邮差一到，他们就会激动起来。小斯特恩跑去迎接，他非常乐意看到许多国家美丽的邮票。信是用各种语言写来的。父亲把信夺过来，看到的都是拒绝！不断的失望在小斯特恩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那时的德国，希特勒党徒到处在大街上抓人，并把被抓的人送往集中营，整个德国正在进行扩军备战，斯特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其学习生涯。

斯特恩5岁学习钢琴，他母亲给他上课，他进步很快。

1937年他9岁时，有人拿出一把小提琴，要送给有天赋的孩子，斯特恩被选中了。于是，他父母决定请母亲很好的女友盖尔达·毕绍夫给其上课。她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教授亚历山大·派赤尼科夫教授最好的学生。1934年，小斯特恩进入摄政王大街第四犹太民众小学校，该校被并入那里的犹太人大教堂。在学校里，男孩和女孩是分开的。学校的领导相当自由，没有宗教机构。斯特恩上学的路经过柏林劳巴赫大街，西南林荫大道，皇帝广场（现在叫联邦广场）直到摄政王大街和巴登街的路口，犹太人教堂也在那儿。

1938年11月9日，他7点半从家里出来，沿着西南林荫大道慢慢地溜达着，横过皇帝林荫大道。在法尔齐纳大街街角有一个乐谱商店。商店被砸得粉碎，大街上全是碎玻璃、乐谱、一个单簧管、许多被摔碎的小提琴和一架显然是从楼上摔下来的钢琴。他走近学校，看到犹太人大会堂的圆顶在燃烧。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站在大街上。救火车已经到了，但没有人动手救火。他的学校在教堂后面也在燃烧。正当大家束手无策、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希特勒少年团的大卡车开了过来。他们狂呼乱叫，用石头打师生们，用的是真正的铺路的小石块。就在那一天，冲锋队的乌合之众走遍全城和全国。他们先抢劫、然后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一个特别保守的估计是：91个犹太人被杀，29个百货商店、171家住房和101个犹太会堂被破坏或者被烧毁，7 500个店铺被抢劫并被捣毁。大约有35 000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公众舆论眼皮底下发生的，但是人们却把头转向一边，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当小斯特恩中午回到家中，父母均不在家，这时，从一辆车里下来一队保安警察，进了楼房，他们没有找到斯特恩

父母，直到很晚的时候，斯特恩的父母才敢回到家。好像他们事先听到什么消息，在外面躲了一天。

斯特恩一家亲眼看见了纳粹的暴行后，加快了离开德国的行动。恰在此时，在“德国犹太人救济协会”里工作的斯特恩母亲，弄到了一份介绍她作为钢琴教师到中国哈尔滨去工作的虚假合同，凭此，他们获得了前往中国的签证。在犹太朋友的帮助下，躲过纳粹的监视，他们偷偷地筹集到了一些钱，藏到了斯特恩的“练习教材”里，作为日后的救命钱。1938年11月，斯特恩一家开始了那漫长而艰苦的流亡生活。

到上海去

1938年11月21日，斯特恩一家从安哈特火车站乘火车到了慕尼黑。他们必须在布莱纳换乘意大利的火车。此时，站台已被纳粹封锁，有人喊道：“犹太人！移民者！都到那边去！”斯特恩的父母被带走了。不一会儿，开往意大利热那亚的火车开动了。经过搜身之后，斯特恩的父母回来了，但他们必须等候下一趟火车。在冷风中战栗，他们都害怕极了，更担心纳粹把他们押送回去！

在期待中，来了一列去意大利的军车，车上坐满了意大利士兵，他们被允许上车，来到了意大利米兰。在车站附近，他们找到一家便宜计时旅店住了下来。第二天，他们到达热那亚并换车来到了港口。斯特恩看到了他们要乘坐的轮船，在小孩眼中，那是一艘巨轮。他们买的是统舱票，里面都是他们那样的逃亡者。而在头等舱和二等舱，坐满了德国游客。轮船穿过墨西哥海峡到达了埃及塞德港，他们同许多同行人一样，希望能在那里上岸，然后从西奈偷渡到

巴勒斯坦。他们事先通知了斯特恩的姐姐他们到达的日期，但她们没有来接他们。斯特恩一家下船来到一个埃及犹太人的商店，该店主给了他们一点钱。斯特恩父亲问他如何能穿过西奈到达巴勒斯坦，他却建议他们先去上海，用不了多长时间，他的女儿就会想法把他们接回来。但是，当他们最终踏上以色列的土地时，已经是11年之后了。

斯特恩一家不得不继续坐船航行。轮船分别在苏伊士、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和也门的亚丁港停靠，可是，不允许他们上岸。旅客们都集中到船舷上，大家排成一行向警察出示护照。前面站着几个德国游客，当其出示护照时，来迎接的官员们向其敬礼，那些人就上了岸。轮到犹太难民时，当他们将护照打开，那位官员就说了声"No！"，他们便不得不站到旁边去。当斯特恩父亲提出质疑时，一个军官走过来并指着护照上大写的红色"J"，说道："No"。其他的游客可以上岸，犹太人却不行，于是犹太流亡者们只好退回到自己的舱房里。

轮船继续航行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他们可以上岸并玩上一天。下一站到达新加坡，再经过马尼拉，轮船驶抵香港。在香港，这些犹太流亡者又不被允许上岸。他们继续航行，距离终点上海越来越近了。1938年12月底，是中国的冬季，虽然上海地处南方，但在冷空气下，上海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当船驶入上海港时，乘客们冻得瑟瑟发抖，湿漉漉的寒流直刺骨髓。

当这些犹太难民上岸时，上海的一个犹太难民救济委员会接待了他们。由于难民较多，委员会的人根本忙不过来，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安排数千难民的吃和住，大多数都被安置在被日本人轰炸后的虹口区。他们必须通过一座桥才

能到达该市区，桥中间和两旁都站着背着上刺刀步枪的日本兵。每一个从其面前经过的中国人都必须向他们低头深鞠躬，否则便会被枪托打。

斯特恩一家来到了一个几乎没有灯光的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前，从小洞口望去，地下室住着许多中国人。所有较为完好的楼层里都住满了流亡者。地上铺着漆成红色的木地板，墙上糊满了墙纸。斯特恩一家住进了一个小房间，里面除了三张没有垫子的可折叠行军床外一无所有，没有水和取暖设施。看到这种状况，斯特恩的母亲哭了。但第二天上午，他们被人接走，送到犹太人救济会所在地。那里不仅有水，还可生火取暖。

对小斯特恩来说，一个奇迹出现了。这时，来了一辆本特莱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皮大衣的先生，走进了救济会。他站在门口，环视了一周，救济会的组织者同他说了几句话，那位先生就来到斯特恩他们桌子前，问候其父母和小斯特恩并同他们交谈起来。最后，斯特恩父母问小斯特恩愿不愿意跟这位先生走，并住在他家里。小斯特恩表示同意并穿上衣服，那位先生还到另外的桌边并带走了一个小姑娘，他们被带到当时上海最富有的犹太家庭托以格(Toueg) 家。托以格家是富有的英国籍塞法迪犹太人。

斯特恩在托以格家每天练习小提琴，还可弹屋里的大三角钢琴。当斯特恩父母来吃晚饭时，托以格先生向他们建议把斯特恩留在上海，他会承担起他的学习和音乐教育费用，将来还会为他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斯特恩的父亲坚持原来的计划，不为所动，坚持要按合同办事去哈尔滨。斯特恩父亲认为在那里会比上海好些，因为那里不会有那么多犹太流亡者。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当时上海已经被日本

人占领，政治比较敏感的斯特恩父亲联想起了德国纳粹的所作所为，担心这类暴行可能在上海由日本人重演，所以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样，斯特恩一家重又踏上了流亡之路，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

安家哈尔滨

1938年12月29日，斯特恩一家乘坐一艘日本轮船到达大连，再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于1938年12月31日抵达哈尔滨，受到哈尔滨犹太社团有关人员的接待。当时的哈尔滨室外温度低于−20℃，可斯特恩还穿着短裤。他们穿上犹太社团成员带来的厚衣服，被送到犹太社团驻地，那里有热乎的饭菜招待他们。斯特恩一家来到哈尔滨后，就立即到德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报到[1]。

起初，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同样来自柏林的医生曹德凡博士家的一个房间里。后来，得到犹太人团体的经济支持，他们才能自己租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在一个总共15个家庭的小院里，大家进出都是通过一个大门。斯特恩家的房子在最后，有两层，下面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上面是两间卧室和一间幼年斯特恩住的很小的房间——里面刚好放一张小床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一个厕所。

斯特恩家仍然不富裕，但是比以前好多了。父亲开始给人家上课，母亲果然在现代剧院里找到一份工作，最后甚至得到了一份真正固定的工作合同。斯特恩开始进俄国犹太人的塔木德–托拉学校[2]。然而，他10岁了，却必须和6岁的孩子在一个班，因为他不会俄语。他有时被其他的孩子嘲笑，被骂为“德国人”。

后来，斯特恩的父亲把他接出了学校，因为他们认识了

1_1942年1月2日，德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根据希特勒政府的反犹太法收回了他们的护照，这使斯特恩一家成为没有国籍的难民。

2_学习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和摩西五经（托拉）的学校。

本德尔先生。他是一个细心而又善良的人，成了斯特恩父母亲的朋友和斯特恩的家庭教师，在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在一般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些。这种私人授课只有在本德尔先生几乎不要求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斯特恩母亲为他做饭，时不时地也给他买点酒，他感到在斯特恩家很舒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斯特恩居然像富人家的孩子一样有了一位家庭教师。

可是，他们家的经济情况却是江河日下。1944年，他们不得不为日益增多的柴米油盐和穿衣费用而奋斗。全家人忍饥挨饿、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没有温暖的房屋住，缺少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连面包也是配给的。早晨，斯特恩总是被派到面包铺排队等候，用面包票买面包。当然，他的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经过长时间站着排队，等排到的时候，他也快冻僵了。面包热乎乎的，香气诱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先揪下很小很小的一点儿面包吃掉，然后，又揪下一点点儿，又一点点儿。当到家的时候，那一块面包就几乎被吃完了。

不过，他们家又有了一架钢琴。对此，斯特恩并不怎么快乐，因为他除了练小提琴之外，还得练钢琴。虽然喜欢弹琴，但他从来没有好好地练过，因为缺乏正规的基础训练。他父亲和他的学生上完课之后，轮到母亲干活，然后斯特恩也被叫过去，为学生提供钢琴伴奏。这时候绝对不能和父亲顶撞，即使厨房里的汤流出来或者土豆烧糊了也得服从他。所有这些完全是免费的，不过学生的家长们也确实付不起费用。

母亲还要承担沉重的家务。父亲一向不假思索地随意购买各类食品，可是准备餐食过程当中的许多复杂工作都

要母亲来做。他经常买鸡回来，可是，既没有宰杀，也没去毛。买鱼回来的时候也是同样，必须将鱼去鳞剖腹。对此，母亲感到特别恶心，因为那些鱼常常都还活蹦乱跳。此外，家里没有什么工具。所以，家务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生火做饭简直是一场灾难，不是因为木柴太潮湿，就是煤中有太多石头。

音 乐 生 涯

哈尔滨犹太社区同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相比，有其独特之处。社区虽不大，但"五脏俱全"，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生活、服务以及管理的系统。犹太人在此生活，犹如有了到家的感觉。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里，犹太人不再受到迫害。到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已变成了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城市，被人赞誉为"东方巴黎"。对于许多犹太难民来说，这里生活成本很低，且有着比较丰富多彩的文化精神生活。

就文化生活而言，哈尔滨与莫斯科、维也纳和其他欧洲城市相似。1933年以后，从德国和奥地利逃亡的犹太人来到哈尔滨，其中有许多音乐家。而在他们之前，已经有许多来自俄罗斯的杰出音乐家生活在哈尔滨。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管弦乐队和歌唱家经常来到哈尔滨，音乐会、歌剧、轻歌剧和戏剧经常在哈尔滨上演。举行音乐会的地方有三个：一个是哈尔滨商务俱乐部，另一个是马迭尔宾馆，还有一个在新城，即现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上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演奏的都是流行的古典交响乐经典作品，重点是俄国的音乐，有时也上演歌剧，主要剧目仍然是俄国作曲家的作品。一些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驰名演员和歌唱家来到哈尔滨都大受欢迎，热爱音乐的犹太人对音乐活动

乐此不疲。哈尔滨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爵士乐队，主要在商务俱乐部里表演。

弗拉基米尔·大卫朵维奇·特拉赫藤贝格原为圣彼得堡玛林斯基剧院的首席小提琴手，后来成为哈尔滨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他是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和“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的奠基人之一。斯特恩刚到哈尔滨就受到他的指导。他免费给斯特恩上课，使他进步很快。然后，他让斯特恩进入他的音乐学院。学院的经营是按照俄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教师几乎都是俄国人，都是一些很好的音乐家。1942年，斯特恩14岁时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音乐会，演出受到观众称赞，特拉赫滕贝格也很满意。直到现在，每当斯特恩想起当时自己演奏的节目时，都会感到像骑马飞越波登湖。记得当时自己双膝颤抖，琴弓犹如一根锯条，下巴颏下面的小提琴像一把低音提琴。尽管如此，那次演出后各界的评论全都是称赞的话，斯特恩的老师也很满意。

1945年秋，斯特恩进入哈尔滨交响乐团。该交响乐团是20年代俄国流亡者建立起来的，其中不仅有俄国人，还有捷克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在日本占领期间还有几个日本人。特拉赫滕贝格是第一小提琴手，施葳考夫斯基是首席指挥，第一单簧管吹奏手是比比考夫。那年斯特恩才17岁，他在哈尔滨交响乐团积累了最初的演奏经验，为日后在以色列和欧美的演奏生活奠定了基础。

中国情结

1945年8月12日，就在苏联对日宣战后3天，斯特恩的父亲被日本人当作“不可靠分子”逮捕，其妻子和儿子也被

命令立刻把房子腾出来。好在又过了3天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斯特恩的父亲也回到了家里。

从1939年起，斯特恩家就在哈尔滨不断地申请到美国去，但一直得不到签证。因为尽管他们早已被“取消”了德国国籍，但仍然被归入德国移民的配额之中。到1949年初，斯特恩和父母亲写了一封申请书，并辗转将它交到管辖整个东北地区的八路军司令员陆熙（音）将军手中[1]。6月底的一天，他们被告知可以出境。不久之后，全家乘坐“Wooster Victory”号轮船驶离中国。漫长的航行之后，他们到达以色列海法港。那天是1949年除夕，斯特恩母亲的生日。自从他们离开德国，整整十一个年头过去了。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了以色列。

不久后，斯特恩加入了以色列爱乐乐团，成为团中的青年骨干。拥有在哈尔滨打下的扎实演奏基础，加上以色列良好的艺术氛围，使他如鱼得水，音乐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挥，名气越来越大。此后，他收到了国际上许多知名乐团的邀请信和聘书，加入过美国和德国的多家乐团。最终，他回到故乡，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国，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二故乡哈尔滨。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迅速恢复和发展，斯特恩盼望的重返中国、哈尔滨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79年10月27日，斯特恩随柏林爱乐乐团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当斯特恩走进接待大厅时，突然听到有人用英语喊他的名字“赫尔穆特！赫尔穆

1_此处即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赫尔穆特·斯特恩对中共领导的军队不太了解，所以仍使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用语“八路军”。

特！”。两人相见时，那人说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他是杨慕云，与斯特恩一同在特拉赫滕贝格老师那里学习的同学，斯特恩简直认不出他来了。站在其旁边的是斯特恩父亲最喜欢的学生王一鼎，现在是一位歌唱家。另外还有几位斯特恩在哈尔滨结识的朋友也来了。11月1日，斯特恩在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率领一个三重奏小组去了哈尔滨，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亲人般的款待。斯特恩一行的演出在哈尔滨青年宫举行。他回忆道：“剧场内两千多名观众格外安静，除了三重奏优美和谐的乐曲绕梁回荡外，剧场里没有人走动，没有人大声说话……对于哈尔滨这座音乐城的观众来说，久违了的西方音乐，对他们是那么亲切，犹如一个老朋友又回来了。”演出结束后，斯特恩与哈尔滨同仁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答应帮助乐团解决所缺少的必要的工作条件。

斯特恩一回到德国，就立即同其熟悉的机构接触，他认为，仅仅向音乐家们发放奖学金，让他们到德国来学习还不够，还应该向他们提供乐谱、琴弦、乐器零件和乐器。在波恩音乐理事会之家的一次聚会上，德国工业联盟文化圈、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德国音乐理事会和德国乐团联合会都答应给予支持。为了帮助中国，斯特恩还把募集的捐款和一次音乐会巡回演出联系起来。另外，斯特恩还把从其朋友那里拿到的捐款，作为奖学金亲自提供给中国学习音乐的大学生。

从此以后，斯特恩几乎每年都要回一趟中国，常常到一些边远的，从未听到过西方室内乐的地区举行音乐会。斯特恩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5年，他到了哈尔滨，然后去了扎兰屯，再后去了北京。这里的一草一木，令斯特恩感

到十分亲切，尤其是这里的人们亲切、淳朴、善良，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帮助中国特别是第二故乡哈尔滨人的决心，并努力使这种在患难中凝结的友好情谊不再中断，世代发扬光大。

（张铁江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犹太人来华史研究；孟昭臣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哈尔滨犹太人研究。感谢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这篇文章。此次刊发时，编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删节、修改、补充，并调整了小标题。）

1945—1947年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归化问题和产业处理探究

——以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考察中心

高龙彬

犹太人在青岛的历史是犹太人在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青岛的德籍犹太人又是在华德侨不可或缺的因子。青岛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及山东省和青岛市的政府公报等资料是研究1945—1947年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归化问题和产业处理问题的重要依据。这不仅是对青岛城市史和"犹太人在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和补充，也是对中德关系史和二战后大国关系史研究的一种探索和演进。

犹太人在青岛的历史是从德国侵占青岛(1897—1914)开始的。德籍犹太人也正是这个时期集中来到青岛，他们主要从事经营贷款业、医院诊疗所、事务所等犹太人擅长的行业，也有传教士、外交官等职业。虽青岛经过日本、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但德籍犹太人还是在青岛开创了一定产业，并对青岛产生了一定的眷恋。德籍犹太人是青岛德侨的一部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去留事宜和产业处理成为德侨包括德籍犹太人在青岛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关于"犹太人在青岛"的历史及相关档案的介绍

相对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犹太人在天津""犹太人在上海"等地的研究,"犹太人在青岛"的历史文化研究相对滞后和薄弱。这主要是受到在青岛的犹太人的人数、身份、活动及影响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档案资料的限制。关于"犹太人在青岛"的研究主要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房建昌研究员20世纪末发表的《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关于近代来华犹太人史的史料及研究简况》和《近代中国犹太教会堂及祈祷所考》三篇文章中的相关论述及其《青岛犹太人小史》一文[1]。但这些难能可贵的论述基本趋同并且篇幅短小,大体讲述犹太人在青岛的基本情况。同时,《青岛市志·外事志/侨务志》等也有相关记载。从整体来看,"犹太人在青岛"的论述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

"犹太人在青岛"主要由德籍和俄籍犹太人两部分组成。最早来到青岛的犹太人是随着上世纪末(19世纪末,笔者注)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的到来而入居的,所以他们多为德籍犹太人,身份主要是商人、银行职员、外交官等。最初大批来中国的俄籍犹太人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而涌入的,基本是从俄国远东地区经哈尔滨到天津、青岛,并且他们是来"淘金"而不是来"逃难"。俄籍犹太人"来时大多一贫如洗,后来有些跻身中产阶级,大富者不多"。他们"在入居青岛前多在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间,且与哈尔滨保持着经济和亲属上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哈尔滨又是中国北方犹太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所以青岛的犹太人会一直是接受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的。"[2]笔者赞同房建昌的观点。实际上,大连、营口、绥芬河、满洲里等地区的犹太人都是犹

1_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及《青岛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青岛涉外足迹》,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2_房建昌:《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第48、66页。

太人哈尔滨大社区的组成部分。

关于“犹太人在青岛”的人数考察是一个重点和难点。“犹太人在青岛”的人数一方面目前笔者没有见到系统和连续的统计数字，另一方面没有区分德籍和俄籍犹太人。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曾经有“21名德国犹太难民”来到青岛。1939年，“青岛犹太社团由221名犹太人组成”。其中，“无国籍的173人（主要为俄系），德国籍24人，英国籍12人，美国籍7人，其他5人。”抗战胜利后，“据1946年6月青岛市政府的统计，这时只有犹太人37户、141人。”[1]而房建昌在《青岛犹太人小史》中亦提到，“根据1946年6月青岛市政府的统计：有犹太人27户，108人（应为113人，笔者注），内男67人，女46人（此只指无国籍俄系犹太人，有国籍的不在此列）”[2]。因为俄籍犹太人基本上处于无国籍状态，根据1946年6月的两种统计，我们可以推算出在青岛德籍犹太人有20余人。房建昌引用的是1947年版本的《青岛指南》[3]。据《青岛市警察局关于犹太、奥国罪犯指纹卡片》记载，在1946年至1948年的16个案例中有11个犹太人相关，涉及15个犹太人。其中1946年4月9日被调查的史奈得尔曼一家5人，父亲伊利亚、母亲客拉福几、妻子吉诺益达和儿子伊利亚。这些档案上只是指出国籍为犹太、犹太国、奥国犹太人[4]。根据《关于本市犹太籍俄侨史奈德尔曼申请归化函请内政部核办见复的公函》，史奈德尔曼一家5人是俄籍犹太人，笔者考证其他基本是德籍犹太人。并且，这些人之所以不讲自己的国籍是德国，是因为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警示和控诉。在这些案例中，5个人的案由是“赴美”。笔者认为，这是德籍“犹太人在青岛”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审视和判断的结果。《青岛的犹太人》一文，对“犹太人在青岛”的人

1_房建昌:《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第66、67页。

2_青岛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青岛涉外足迹》，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3_笔者找到三种不同版本的《青岛指南》：佚名编六卷一册，1931年铅印本；魏镜编、胶东书社印刷及平原书店发行的1933年版本；李森堡等编辑的版本，国家图书馆缩微资料，无出版年代。

4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A0046，目录号001，案卷号00059。青岛市档案馆把这个文件的年代标为“1928年”，从档案内容来看应为1948年。

数有不同的表述，“20世纪30年代初，青岛有犹太人二百多人”；“30年代后期，犹太人又有增加，达三百多人”；“1946年青岛的犹太人有二百多人”[1]。但是这种表述还是一个总体数目，也是没有区分德籍和俄籍犹太人。可以作参考的是，1933年出版的《青岛指南》中，只有德国和俄国人口的户数及男女人数的记载，而没有族别的分类。1932年12月的统计显示，“德国户数119户，男179人，女139人，合计318人；俄国户数180户，男351人，女336人，合计687人。”[2]据《青岛市志·人口志》记载，1946年青岛有“55户”德国人[3]。1945年后在青岛的德籍犹太人具体数目仍然难以确定。这些犹太人大多从事经营贷款业、开理发店、医院诊疗所、事务所、开西服店及乐器店等。

协会和教堂是犹太人的活动中心。据《青岛市志·外事志》记载，犹太公民协会（又称犹太联合会）“成立于1932年，会址在牟平路10号。1941年，迁至龙山路13号。会员30多人，绝大多数为苏联犹太人，其次是德国犹太人、波兰犹太人和归化中国籍犹太人。1943年，会长为约赫维道夫。1948年4月改选，约赫维道夫再度当选会长，设常务委员7人。青岛解放初期，有会员130余人。不久，因侨民离境，该组织自行消亡。”[4]1939年，“托瓦宾斯基时任青岛犹太人会副会长”，并掌握实权，“计划了几十年的犹太教会堂马上要建成了”[5]。

笔者曾在《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俄籍犹太人在俄国国内首先被看重的是‘民族’身份，也就是说首先关注的是哪个族，而俄籍犹太人来到中国哈尔滨后首先被看重的是‘侨民’身份，也就是说首先被关心的是哪国人，而后才是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具

1_《国际在线》，2012年4月24日。

2_魏镜编：《青岛指南》，胶东书社1933年版，《总论》，第12页。

3_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人口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4_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外事志/侨务志》，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5_房建昌：《近代中国犹太教会堂及祈祷所考》《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

体来说，在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首先是个‘侨民’，然后才是‘犹太人’。”[1]因此，笔者认为，德籍犹太人在德国国内首先被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而德籍犹太人来到中国青岛后首先被强调的是“侨民”身份。在青岛的德籍犹太人，首先是个“侨民”，然后才是“犹太人”。实际上，这一个是“归属”（或“加入”），一个是“身份”（或“存在”）[2]。之所以称为“犹太人在青岛”，而不讲“青岛犹太人”，是因为在哈尔滨、青岛、上海、天津等地的犹太人是侨居在这些地方，他们没有中国国籍，是侨民。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并且，不管是德籍犹太人还是俄籍犹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来华后生活的哈尔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不是租界就是租借地或是铁路附属地，他们是随着殖民势力来到中国的。关于这一称谓，习惯用法和学术研究是应该区分的。“青岛犹太人”等大多是外国学者使用此称谓，但笔者认为，这是外国学者站在自身角度的提法；“犹太人在青岛”等中国一些学者所作的名称，也不是没有思考的结果。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大小或实际控制大小的问题。

在青岛市档案馆“青岛档案信息网”的档案目录中，笔者目前发现15份直接与“犹太人在青岛”有关的档案。2009年2月3日，笔者到青岛市档案馆查阅了这些档案。自1928年至1948年的“犹太人在青岛”的缩微档案，从内容上主要分为日常事务及管理、归化问题和产业处理三个方面。关于“犹太人在青岛”的日常事务及管理方面的档案有：《犹太人好斯满经营万国酒店无照容留俄妓营业案》（1928年）、《关于犹太、奥国罪犯指纹卡片》（1948年）、《青岛犹太公会增租墓地的通知，公函》（1936年）、《关于执行犹太人管制办法的指令》（1938年）、《关于具有不同国籍之犹太人

1_高龙彬：《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研究》《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2期，第86页。

2_[法]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著：《汉娜·阿伦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申请组织团体的代电》(1948年)；关于归化问题的档案如下:《关于抄发德侨办法及犹太人居留中国应以无国籍人民待遇看待等由的代电》(1945年)、《关于本市犹太籍俄侨史奈德尔曼申请归化函请内政部核办见复的公函》(1946年)、《关于为犹太籍俄人石德满愿入我国国籍情形应填缴书类款项的呈文》(1946年)、《关于愿归化人杜兴呈请证明确系犹太人后裔电请查办的代电》(1946年)、《关于德犹太无国籍轴流恩娥耳夫白耳格等呈请归化对警察局详查具报的训令》(1946年)、《德犹太无国籍轴流恩娥耳夫白耳格发国籍申请书的呈文》(1946年)。关于产业处理的档案是:《关于犹太人在中国境内待遇及德侨处理办法的代电》(1946年)、《奉行政院令关于接管德籍犹太人产业发还办法的训令》(1947年)、《关于德籍犹太人产业处理案的训令》(1947年)、《转发行政院关于所接管的德籍犹太产业发还事宜的训令》(1947年)；从国别上讲，这些档案主要涉及德籍犹太人；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档案主要集中于1945年至1947年。这正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特殊时期，作为战胜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在华德侨及德籍犹太人采取遣返、归化等措施。

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归化问题

在研究“犹太人在青岛”时，侨民和归化的概念是我们首先应该厘清的问题。

关于侨民。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保护侨民论》一书中指出：侨民是“一个人居留于国外，其本国视之为侨民，而其居留地国家视之为外侨。”并强调“就属人法而言，以国家对于其人民，无论居留何地，必须受本国法律之拘

束；就属地法而言，一国家对于在其国境内之人，无论为本国人抑系外侨，概须受当地法律之约束。”[1] 1997年出版的《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一书中对“侨民”的解释是，“通常把那些由于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或其他的原因，被迫或自愿地从自己的祖国迁居到其他国家的居民称作侨民。这些人中，有的仍保留原先的国籍；有的则放弃或失去了原先的国籍，但并未加入新的国籍，从而成为‘无国籍者’；还有的加入了侨居国的国籍。”[2]

对于归化，《辞海》第六版指出，归化是“入籍”的旧称[3]。《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关于“入籍”的诠释为：“Naturalization，一国授予外国人以该国国民身份的行为。入籍可由本人自愿申请，根据特别立法规定，因与该国公民结婚或其父母入籍而取得，也可能因入籍者的本国领土被一国并吞而转为该国的公民。”[4]维基百科介绍，“法律上的归化，是指某个人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行为。一般是居住在国外的人，依据所居国的法律规定取得新国籍。归化时若未放弃原有国籍而在不违反相关法律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多重国籍这一现象。”

遣返和归化是处理德侨的两种手段。1945年11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德侨处理办法》。此办法共七条，核心规定五条，其中三条涉及德籍犹太人。第四条，“收复地区及后方德籍人民、旧奥籍人民及德籍犹太人，未犯有本办法第二条所列举情事者，除经内政外交两部核准继续居留中国外，应予全部遣送回国。在未遣送前，得中外殷实铺保呈准该管省市政府。暂时继续居留其不能具保者，应由该省市政府集中管理”[5]。第四条提及的第二条是，“收复地及后方德籍人民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应依我国法律处

1_薛典曾：《保护侨民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2_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页。

3_《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2页。

4_《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2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5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B00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680。

理之：一、有间谍嫌疑或行动者；二、有帮助日军企图或行动者”。同时，第五条规定，“旧奥籍人及德籍犹太人与德国人民如系忠实可靠之技术人员，得由公私机关呈准内政外交两部予以雇用免予遣送回国”[1]。《关于犹太人在中国境内待遇及德侨处理办法的代电》亦指出，“犹太人居留中国境内应以无国籍人民待遇看待，悉遵照中国法令办理。该犹太人如系德籍并应依照上颁办法处理”。[2]

194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德侨中的纳粹党员进行遣返。当时，青岛市内有德侨403人。青岛市由青岛日侨集中管理处兼负其责，德方由德国侨民救济会负责。”1946年6月25日，“第一次遣送德侨138人”；1947年8月26日和30日，“遣送46人”。被遣返者“除眷属外，全系纳粹主要分子或行为不端者”[3]。对于不愿回国的纳粹党员，实施逮捕并强行押送。对于正当德籍侨民，政府允许其继续居留。1946年6月，“还批准16人加入中国国籍，眷属随同归化者18人”[4]。

在1946年6月的《关于德犹太无国籍轴流恩娥耳夫白耳格等呈请归化对警察局详查具报的训令》中记载，他“现年六十五岁，毕业于德国高等职业学校。自一九零一年来青，历充中国海关及坊子煤矿职员。曾在重庆住有十七年之久，在该地以所学新法开设罐头工厂等营业。娶妻中国人（湖北）。于一九三八年仍返青岛。在中国共有四十五年之久，视为第二故乡。自幼笃信基督教，每日以查经颂主为重要课程，一生积蓄，堪以自理，愿归化中国。”[5] 1946年6月的《关于愿归化人杜兴呈请证明确系犹太人后裔电请查办的代电》中记录，他“原籍德国，现年三十五岁，未曾参加任何党派，自幼求学德国，后赴巴西国入圣宝罗大学哲学系，

1_《山东省政府公报》1945年第3期，《法规》，第8页。

2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B00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680。

3_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外事志/侨务志》，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4_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外事志/侨务志》，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5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B00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649。

毕业后即派来中国任青岛教区传教士，迄今八载。于此期间内对中国之政治文化及人情习俗等均有相当之认识及好感，对中国之普通语言文学亦能讲说写作，且个人现在所蓄之财产亦足够终生之使用。是故甚愿终生留居中国并愿遵守中国之一切法律，做一中国公民，协力建设富强之中国，为此恳祈准予入属中国国籍，俾便获得公民之保障。”[1]

与早期德籍犹太人自愿来中国从事商业和宗教等活动不同，俄籍犹太人来中国则有“被迫”的流亡因素。据1946年6月的《关于为犹太籍俄人石德满愿入我国国籍情形应填缴书类款项的呈文》介绍，石德满“帝俄政变后，即流亡于中国，先后二十余年携眷散居各地。尤以在东北一带，仅哈尔滨一市即旅居十六七年之久。于民国二十五年秋间，携眷来青”[2]。石德满“携妻吉诺益达，现年三十六岁，率子伊力雅二十二岁，哈尔滨生人”请求归化中国，并且愿意交纳“手续费一百元，印花费五元。计汇票六十五元，现金四十元”[3]。1946年7月的《关于本市犹太籍俄侨史奈德尔曼申请归化函请内政部核办见复的公函》声称“许可归化”。同时，这则档案证明石德满就是史奈德尔曼[4]。《关于犹太、奥国罪犯指纹卡片》中对吉诺益达调查身份后的处理也是“转呈归化”[5]。

1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B00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650。

2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B00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651。

3_同上。

4_同上。

5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A0046，目录号001，案卷号00059。

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产业处理

关于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产业处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不仅涉及中国与德国的关系，还受二战后英、美、法、德、日等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牵制。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德国在华产业便同日本在华产业一样，被作为敌产加以接收清理。例如，国民政府授权

中国银行，对德华银行上海总行的所有财产、账册、库存进行接收清理；德华银行在天津、北平、青岛、汉口、广州的分行，也由各地的中国银行分行接收管理。至1946年底，德国在华产业已基本清理完毕。”[1]以上是从公司、企业等德国在华产业清理说明的，私人产业的处理办法还是在1947年。并且，前面是“清理”，而后是“处理”。

关于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产业处理问题，我们应首先参考《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2]。《关于抄发德侨办法即犹太人居留中国应以无国籍人民待遇看待等由的代电》称，德侨“包括德国人民及德籍犹太人”。《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共六条，核心规定二条。第三条，德侨在华各公司、会社、团体等所经营之产业，均由行政院指定机关接收、保管，但对于易坏或变质之物品得先行标售，所得价款交由中央银行专户存储，由处理局接管。第四条，德侨个人私有产业应分别处理如下，亦由处理局接管。甲、凡犯有德侨处理办法第二条所列事情之一者，其私人产业一律归政府接收处理；乙、凡须集中管理之德侨，除准予携带其生活必需之物品及我国法币五万余外，其他物品及款项与有价值之货品，应自行造册签证送请所在地省市政府接收，转报行政院指定接管机关接收；丙、前项所称日常生活之物品计包括衣履、寝具、炊具、盥洗具及食品，其他如手表、笔墨、图书、文件及纪念品（与作战行为无关者）等物；丁、应遣送回国而未集中管理之德侨，在未遣送以前，得准其在私有产业内支付每月所需之生活费用，惟单身人每月不得超过五万元，夫妇不得超过八万元，有未成年子女者得每人每月多领二万元；戊、遣送回国之德侨，除上列乙项所准携带之物款外，得在其个人私有产业内携带必须之领用费，其数

1_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2_笔者在青岛市档案馆只查到《关于德籍犹太人产业处理案的训令》的目录，全宗号B00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819。但是，在调卷时没有找到。

值不得超过美金二百五十元；己、凡已得内政外交部核准免予遣送回国者，得呈请内政外交两部准予保留其私有产业之一部或全部；庚、凡因政治、宗教、种族关系而为纳粹政府被驱来华能提出确实证据者，其私人产业得呈请内政外交两部的予保留。并且第五条规定，自卅四年五月七日期所有德侨产业私行移转者概作无效[1]。1946年8月8日的《山东省政府训令》指出，“德侨在华各公司、会社、团体等所经营之产业，均由行政院指定机关接收、保管”中，“接收、保管机关兹指定暂由各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担任”[2]。

1947年3月11日，《山东省政府训令》的《准行政院秘书处函更正德侨处理办法暨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字误案》指出，“查德侨处理办法暨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前经本院修正公布于卅六年一月八日（即1947年1月8日，笔者注）”。并且指出，“原检发之德侨处理办法标题下‘卅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即1945年11月27日）十字暨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第二条末尾‘由处理局接管’六字及第四条首行末尾‘亦由处理局接管’七字，均系误缮，应予删去”[3]。

1947年4月15日，《青岛市政府训令》的《转发行政院关于所接管的德籍犹太人产业发还事宜的训令》指出，“外交部呈为德籍犹太人呈请发还业经接管之财产，似可照准，请核实等情。”据“查德侨处理办法即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业经本院于三十六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并说明，“在各该办法修正以前，所接管之德籍犹太人产业，除现有德侨处理办法第二条各款事情之一者，仍应依我国法律处理外，其余应准发还。”[4] 1947年5月29日，《山东高等法院训令》通告《奉部令饬知关于接管之德籍犹太人产业发还

1_《山东省政府公报》1947年第40期，《法规》，第1页。

2_《山东省政府公报》1946年第15期，《公牍》，第18页。

3_《山东省政府公报》1947年第46期，《公牍》，第40页。

4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B0032，目录号001，案卷号00072。此外，此法令还刊发在：《山东省政府公报》1947年第15期，《公牍》第15页。此法令还公布为：《德籍犹太人产业发还办法》《法令周刊》1947年第十卷第21期，第11页；《法学月刊》1947年第2期，第69页；《令知关于所接管之德籍犹太产业发还办法》《法声》1947年第32期，第2页；《为德籍犹太人产业处理案》《河北省政府公报》1947年第二卷第12期，第21页；《奉令为指示接管之德籍犹太人产业发还事项等》《江西省政府公报》1947年第1510期，第31页；《奉令为德籍犹太人产业处理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夏28，第451页等。

办法》[1]。两份档案的内容是一致的。笔者认为，财产发还和归化问题是有联系的。德籍犹太人是在归化后申请财产发还的。同时，笔者推断，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数目不会太少，否则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会专门发布各种训令。

《奉令为补充规定德侨产业处理原则一案》指出，"前据内政外交两部呈，为准予居留德侨其私产在卅五年十二月一日（即1946年12月1日，笔者注）尚未接管者，可准自行保留，若在此时间以前接管者，暂不发还"。因为，"波茨坦会议及三十四年十一月巴黎对德赔偿会议，因我国均未参加，其决议都对我自无拘束力，我虽可以德国在华公私产业作为抵偿对德战争所受损失之用，但详细办法犹有待对德和会最后之决定。"故目前"在华德产，除敌伪产业处理局业经变卖者不计外，其他产业似仍应仅予接管，不予变卖，至居留德侨因生活困难呈准发还产业之一部分时。如其产业业已变卖，自可就其产业变卖价款内发还现款，如其产业尚未变卖，似应发还原物，唯上所指产业，只限于家具、衣服及其他什物，至房屋、地产、外汇及其他有价证券，俟对德和约签订后与对德要求赔偿损失详细办法决定时再处理。"[2]

需要说明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德国在远东的盟国日本，以及日本在中国境内扶植并得德国承认的东北伪满政权、南京国民政府，都被彻底打败了。德国纳粹当局的远东政策导致了中德关系的彻底中断"[3]。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司所拟《对德和平条约我国拟提条约草案》第五条指出，"德国承认偿还中国政府在对德战争期间收容德侨之一切费用"；第七条提出，"关于德国在华财产之清理、封存或管理，及其在华人民之拘留及遣送回

1_青岛市档案馆，全宗号A0043，目录号001，案卷号00114。

2_《江西省政府公报》1947年第1510期，第32页。

3_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国，德国政府为其自身或其人民放弃对于中国政府之一切要求。”[1]

南京国民政府对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归化问题和产业处理是和对德侨的处理交织在一起的。对德籍犹太人在青岛的处理，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趋向，这也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管是战败国德国，还是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他向编者提供了这篇论文，此次刊发编者对正文和注解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梅辛格计划”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陈心仪　潘　光

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首先，由于日本与英、美开战并进占上海租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等组织遵照美国等盟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停止向处于敌国日本控制下的上海汇款。其次，塞法迪犹商大多属英籍而被列为“敌侨”，因而被集中监禁，且丧失了所有产业，自然无法继续提供援助资金，致使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窘境。在这种情况下，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办事处等召集上海各犹太社区负责人开会，想方设法精简救济机构，削减日常开支，并在上海较富有的犹太人中筹措资金以缓危局。同时，俄罗斯犹太人则利用日苏处于非战状态使自己拥有“中立国”侨民身份的有利条件，更加积极地投入难民救助工作，救助对象由东欧犹太人逐渐扩大到德、奥等国的中欧犹太难民。如有一部分俄罗斯犹太人成立了“中欧难民委员会”，赡养了至少600至700名赤贫的中东欧犹太难民儿童[1]。德、奥犹太难民也组成了厨房基金会（Kitchen Fund），并计划发起一个“监护职责”

1_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2页。

(Patenschaft) 运动来筹款。

就在犹太难民们为生存而拼搏、奋斗之时，一个不仅针对他们，而且是针对上海所有犹太人的险恶阴谋正在策划之中。

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梅辛格计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调整对犹太人的政策，转而对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就在这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 (Josef Meisinger) 上校于1942年夏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Final Solution in Shanghai”），要求日本当局按照“德国方式”抓捕、屠杀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该计划也被称为“梅辛格计划”。

根据著名学者托克耶的描述，大致可以看出该计划的一个轮廓。它分两个步骤实施：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不让一人漏网；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他们，该计划提出了三个供选择的方案：1) 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饥渴而死；2) 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3) 在崇明岛上建立若干集中营，在营中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1]。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常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回忆道：“当时（指1942年——引者注）日本当局的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离开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佩雷茨告诉我们日本人正

1_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著：《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Tokayer, Marvin and Swartz, Mary, *The Fugu Pl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纽约，伦敦，2004年版。

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尽快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也听到了同样的消息。”[1]

“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德国人提出的“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计划在日本占领军当局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最终的方案是不杀犹太人，但也要采取一些措施以应对纳粹的压力，其中的复杂原因在本书后面一文中会做详细分析。

虽然这个按照希特勒“最终解决”思想精心炮制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施，但上海的日本当局还是在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搞了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是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2月6日，《上海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为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制造舆论。文章点了亚伯拉罕家族、海亦姆家族、维克多·沙逊爵士和许多上海著名的犹太富豪的名，提到他们如何靠贩卖鸦片和其他不光彩的手段致富，把这些人作为国际犹太人的典型例子。2月18日，上海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了上海日本当局的《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

1. 依据军事上之必要，自本日起，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地区，以下列地区为限：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引者注：指公共租界北界）以南。

2. 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居住或营业中之无国籍

1. 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27页。

难民，应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至昭和18年（中华民国32年）5月18日止，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移至前项所指定地域内。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或营业上所需要之房屋、商铺及其他设备，如拟买卖、转让或租借者，应先得当局之许可。

3. 除无国籍难民外，其他人等非得许可，概不准迁移至第1项所开地域内。

4. 凡违反本布告或有妨碍本布告之实施者，决予严惩不贷。

上海方面大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
上海方面大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
昭和18年（中华民国32年）
2月18日[1]

虽然布告中未用"犹太人"或"隔离区"的字样，但与布告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指的就是欧洲犹太难民。于是，约有1.4万（一说1.8万）名犹太难民，包括收容所的2 800名住户在内，被迫迁入"指定地域"。23日晚，主管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在犹太总会召集了上海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开会。会上久保田辩解说，发布这一公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问题严重，必须对几千名无国籍者进行某种控制，并呼吁俄国犹太人与他们合作。实际上，久保田的讲话是一份最后通牒，威胁犹太人如不与日本当局合作就会受到"严惩"。

1_《新闻报》，1943年2月18日。

于是，欧洲犹太难民们开始了他们上海避难生涯中最为艰难的“隔都时期”。在此之前，英籍塞法迪犹太人已被作为“敌侨”而监禁。俄国犹太人虽然仍没有失去自由，但也面临着随时可能失去自由的危险。

战后关于“梅辛格计划”的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关于“梅辛格计划”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争议。焦点是：其一，到底有没有“梅辛格计划”？其二，“梅辛格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起因在于上海“最后解决方案”的原始书面文件一直没有被找到。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销毁了大量可能被作为罪证的文件，因此许多涉及屠杀和迫害的文件档案消失了，上海“最后解决”方案也许就是其中之一。于是，就有人提出，这个“梅辛格计划”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没有书面证据，就像有些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等法西斯罪行的论调一样。感谢国际上一批具有正义感的学者，他们认为口述史料同样可以作为证据，于是开始采访许多亲历者。特别是美国著名学者马文·托克耶，几十年如一日，采访了许多亲历者，包括1942年时担任日本驻上海副领事的柴田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常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等人，初步搞清了“梅辛格计划”的基本情况。研究大屠杀问题的国际权威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中犹研究会、依浮研究所 (The Yivo Institute)、利奥·贝克研究所 (The Leo Baeck Istitute)、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也采访了许多当年在上海的犹太人，基本确认了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梅辛格计

划”的存在。

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是对马文·托克耶所著《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Tokayer, Marvin and Swartz, Mary, *The Fugu Pl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London, 2004) 一书中所叙述的“梅辛格计划”两个实施步骤有些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这些叙述可能是被采访者的道听途说，然后被作者编写成了骇人听闻的惊险故事。不过，近年来人们对这方面的争论已经不再有什么兴趣，因为这个杀害犹太人的计划已被公认为是历史存在，那么计划以什么具体方法杀害犹太人这样的细节也就无足轻重了。

(陈心仪是美国康内尔大学研究生，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是两位作者专为本书所撰写。)

为什么犹太难民能够在上海幸存下来

潘　光

从1943年2月到1945年8月，犹太难民们在上海虹口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幸存了下来。欧洲犹太难民为什么能够在希特勒的盟友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上海幸存下来，其中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但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犹太难民自身的奋斗

在这批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的犹太难民中，有众多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如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编辑、记者、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以及各行业的技术工人，这是他们能在困难中互助自立的有利条件。如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仅内科医生就有200余人。1938年年末，以他们为骨干，在难民营中建立了一个诊疗所。1939年3月，又建立了第一所难民医院，拥有60个床位。到1940年，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华德路之犹太难民医院已拥有120个床位，且“设有X光部牙科眼科及产科等。该院之收

入大概足敷开支”[1]。

难民中的教师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继续组织难民的子女学习，并对难民中的成年人进行职业培训和文化补习。有些难民教师后来成了当时两所接收犹太难民子女的全日制学校的教学骨干。难民中的编辑和记者们自己办了报纸杂志，从1939年到1945年，他们居然同时维持着多份德文报刊，其中《上海犹太纪事报》《黄报》等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层次较高的读者群，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难民中的艺术家们更想方设法演出戏剧，举行音乐会，甚至在上海首次上演了意第绪戏剧，丰富了难民们的文化生活。1943年11月，犹太难民们还在虹口建立了亚洲研究会，专门讲授和研究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文化、艺术、历史、哲学、医学等方面的题目[2]。

除了上述维持人们正常生活的努力外，难民们在危急关头或艰难时刻表现出的团结奋斗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由于外部援助中断，1942年至1944年对在沪犹太难民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便说明了这一点：1940年130人，1941年167人，1942年320人，1943年311人[3]。特别在1943年2月被迫迁入虹口隔离区后，形势更为险恶。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犹太难民不得不靠乞讨度日，但大家仍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据当年的难民回忆：当时“尽管有相当多的内部摩擦，但大体来说，犹太社区显示出惊人的团结”；难民们组织了乐队和足球队，在虹口那狭小的天地里组织文艺体育活动，以乐观精神消磨那艰苦的时光；还有一些难民建立了流动图书馆，组织图书交换，在那困难条件下为难民们提供精神食粮[4]。

1_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0年），第472页。

2_《上海犹太纪事报》，1943年11月6日。

3_该数字系综合戴维·克兰茨勒的《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和国际红十字会1943年关于上海德籍犹太难民状况的报告得出。

4_潘光等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115页。

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

首先是上海犹太社团对欧洲犹太难胞展开的全力救援。英籍犹太人财力雄厚，自然在救助犹太难民方面起的作用最大。如嘉道理家族，除出面召集讨论救援犹太难民的会议外，还捐了大笔钱用于安置犹太难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道理家族创建了上海犹太青年会（Shanghai Jewish Youth Association，简称SJYA），致力于办学校。由该会创办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又称嘉道理学校），允许付不起学费的难民子女免费入学，战时在校生一直保持在700人左右，在犹太难民中享有较高声誉。在嘉道理办的学校受教育的难民子女们，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卓越人才。沙逊家族也多次捐款捐房安置犹太难民。俄罗斯犹太人虽不如英籍塞法迪犹太人财大气粗，但他们人数多，活动能力强，且与德、奥、波犹太人同属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因此积极性比较高，做了大量细致、繁杂的具体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籍的犹太人都成了“敌侨”，而俄罗斯犹太人因日、苏间不存在战争状态而仍享有中立国家侨民待遇。此后直到1945年8月，俄罗斯犹太人便承担起了资助犹太难民的任务。他们一般都是经营西餐馆、面包房、杂货店的中小业主，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们仍节衣缩食，尽力支持难胞，使之能度过战争时期最艰难的岁月。

其次是海外各类组织，特别是犹太人组织给予上海犹太难民的大量财政、物资援助。最初，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关心上海中国难民的同时，也对上海的犹太难民给予有力的救援。但到了后来，由于世界各地战火纷起，难民遍地，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也就顾不上上海这几万犹太难民了。倒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特别是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瑞典、葡萄牙等地的犹太人组织，因为对欧洲犹太人的困境已无能为力，反而能集中力量来救援在上海等地的欧洲犹太难民。此类组织名目繁多，难以一一列举。前已提到，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该组织1938年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派有常驻代表，每隔一定时间写出反映上海犹太难民情况的报告，并在美国为上海犹太难民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几乎平均每月达3万美元[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纽约的JDC总部在是否继续向上海寄钱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最终，由于怕引起美国政府的非议和反犹势力的攻击，JDC于1942年5月中断了对上海犹太难民的资助。同时，JDC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也被日本占领军关进了集中营。1944年3月，经获释回国的马戈利斯多方努力，并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许，JDC对上海的资助才告恢复。

最后是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对犹太难民的鼎力相助。众所周知，“八一三”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市民自己也沦为难民，不得不在难民所中栖身。但是，上海市民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无私地给予犹太难民以支持。犹太难民回忆道：“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他们很同情我们。”[2]当时虹口地区的市民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占领军在上海搜捕犹太人中的“敌侨”，中国居民曾全力掩护犹太儿童，使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3]。在1942年至1944年最艰苦的时期，犹太难民们与他们的中国邻居互相帮助，同

1_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1页。

2_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1月15日。

3_《解放日报》，2004年1月13日。

甘共苦。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区犹太难民居住区，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周围的中国居民虽同样伤亡惨重，但仍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抢救出许多犹太难民，在现代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三、德日在对犹政策上的分歧和苏、德战场上形势的逆转

日本法西斯为何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而且没有对上海的犹太难民下毒手？这是一个一般人不太理解的问题。要讲清这个问题，还需追溯一下日本对犹政策的演变过程。

1931年以后，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步步紧逼，日本与英、美、法等在华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国家及苏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一些所谓"犹太问题专家"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小迁等人，便纷纷提出了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缓和与英、美、苏关系的主张。他们将自己的一系列构想非正式地称为"河豚鱼计划"[1]。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政府也确实采纳了这些人提出的一些措施：允许哈尔滨、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在一起建立远东犹太理事会；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来"开发满洲"；竭力讨好上海、天津等地的犹太财团；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等地持默许态度；千方百计与美国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这些做法虽对安抚中国境内犹太人有一点作用，但在外交方面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该政策的立足点是犹太人能够左右美国的决策和影响

1_前引马文·托克耶书，第29—35页。

苏联的政策，而这一立足点是很不牢靠的，甚至是虚构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美、英、法、苏等国同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包括中国境内犹太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犹太人对日本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38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问题，可见当时日本高层对犹太问题的重视。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五相之间在对犹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基本上认可了“犹太问题专家”们的构想和努力。就在“五相会议”后不久，以安江等人为核心的“犹太问题专家”又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计划鱼”由众多“亲犹”措施的大杂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计划。该方案长达90页，标题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首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应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来访问“居留地”；通过建立该“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1]。在得到高层批准后，“犹太问题专家”们四处推销此方案，重点做上海、哈尔滨犹太人的工作，还派人去美国游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在1937年后仍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采取了默许态度。

但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河豚鱼计划”最终仍没能成功，原因很简单：日、德法西斯逐渐合流并发动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犹太人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统治集团与希特勒完全是一丘之貉，因而断然拒绝支持所谓“居留地”计划。1941

1_前引马文·托克耶书，第50—51页。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最后放弃了“河豚鱼计划”。日本外相东乡在给驻汪伪“大使”的信中称:“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1]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德国以为日本必然会转而奉行反犹政策，因此抛出了“梅辛格计划”。

然而，日本并没有在对犹政策上亦步亦趋地追随德国，双方的对犹政策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较大的差异，日本最终也没有实行“梅辛格计划”。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1) 日本内部仍存在主张对美媾和的势力。日本内部主张对美媾和的力量仍把中国境内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因此不同意对他们采取屠杀政策，“犹太问题专家”们也仍在发挥着有限的影响[2]。

(2) 日本高层担心影响日、苏关系。当时日本高层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如果屠杀上海犹太人，必然涉及俄罗斯犹太人，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3) 哈尔滨和日本犹太社团的游说活动。上海犹太社团通过哈尔滨(当时属“满洲国”)和日本的犹太人在日本高层官员中进行活动，劝说日本当局不要实施“梅辛格计划”，这多少也起了一点作用。

(4) 东亚儒家文化没有反犹宗教偏见。东亚地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区域，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地区那种狂热反犹的宗教、民族、文化偏见，因而上海的中下层日伪官员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也难以接受“梅辛格计划”，对其没有什么热情，有的还暗中帮助犹太人，如日本驻上海外交官柴田付领事就因向犹太人通风报信而

1_前引戴维·克兰茨勒书，第311页。

2_直到1945年，日本高层内仍有人想要恢复“河豚计划”，以试探对美媾和之可能性。

被撤职逮捕[1]。

(5) 苏、德战场上形势逆转。苏、德战场上形势发生逆转，苏联转败为胜，在斯大林格勒一举消灭三十万德军，是日本决定不实施“梅辛格计划”的重要因素。德国学者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在《日本为何没有迫害犹太人》一书中分析了日本态度转变的过程：1942年夏，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拒绝对苏开战，对屠杀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最终采取了隔离方式。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于1943年1月，而日本在一个月后就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绝非偶然。他的关键结论是：挽救上海犹太人生命的不是日本的宽宏大量，而是战争进程的转折[1]。

总之，上述种种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而发挥作用，才使身处险境的上海犹太难民得以在日本法西斯占领之下的上海幸存下来。

（本文为作者潘光专为本书所写。）

1_马文·托克耶采访柴田（Mitzsugi Shibata）记录，1976年5月14日于日本东京大仓饭店，感谢他把采访记录提供给编者使用。

2_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Heinz Eberhard Maul）：《日本为何没有迫害犹太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日本帝国的对犹政策（1933—1945）》（*Warum Japan Keine Juden verfolgte, Die Judenpolitik des Kaiserreiches Japan wahrend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5），Iudicium Verlag GmbH, 2007年版。

“来华犹太人”——永远的热点
——20世纪中叶以来“来华犹太人研究”的演进和发展

潘　光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是“来华犹太人研究”(或“在华犹太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考察包括“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在内的“来华犹太人研究”的演进和发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来华犹太人”的著述日渐增多，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题目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与19世纪时“开封犹太人”在欧美引起的那股热潮不同，这次的“来华犹太人”热不仅局限于学术界，而且扩展到了公众关注的传媒和影视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政治色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因为研究犹太民族史上的中国篇章在犹太学、汉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因为这一题目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构建和谐世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术研究成果和活动[1]

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来华犹太人”成为热点的早期迹象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逐步形成势头，到八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中以建交后达到高潮，进入21世纪后仍是方兴未艾。在此期间，虽然关于犹太人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仍时有出现，但研究重点逐渐转向1840年后来华的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的犹太人，这方面的成果大量涌现。近年来，对哈尔滨犹太人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关于天津、香港犹太社团的著述也陆续推出，但关于中国大陆其他犹太人定居点和台湾犹太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文章也很少。同时，对在华犹太人的研究在时间跨度上也逐渐向后延伸，出现了研究二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在华犹太人的著述，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又一亮点。以下对20世纪中叶以来在华犹太人研究的演进作一梳理。为论述方便，按时间顺序将这一演进分为五个阶段。

1. 中国改革开放前外国学者关于在华犹太人的研究

从20世纪中叶至70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十年“文革”浩劫，关于来华犹太人的研究因此频频受到干扰而停滞不前。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中国学者就没有该领域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是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发表的。结果，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著述大多出于外国学者之手。

安娜·金斯伯格所写的《犹太难民在上海》（外文书名等参见“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以下同）一书出版于

1_下面提到的著作，可参见文后附录“关于来华犹太人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不再做注。下面提到的论文，均有注释。

1941年，可能是最早的研究来沪欧洲犹太难民的专著。此后20年，也许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冷战愈演愈烈的缘故，有关在华犹太人的专著几乎没有，但各类文章还是不少，大多是客观介绍“中国犹太人”的情况。到1962年，赫尔曼·迪克的《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犹太人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世纪》出版，是国际上第一本全面、系统地考察1840年后来华犹太人情况的专著，重点研究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社团。戴维·克兰茨勒于1976年推出他的力作《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此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见长，对上海犹太社团中的一个社区——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剖析。1979年出版了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合著的《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此书主要叙述波兰犹太难民经立陶宛、苏联、日本来到上海的故事，并披露了战前和战时日犹关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因为此书对历史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像一本小说，所以在读者中影响较大。需要提一下的是，该时期许多前“中国犹太人”写的回忆录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前上海犹太难民威廉·肖特曼等人关于上海犹太人的回忆，前哈尔滨犹太社团主席之子特迪·考夫曼等人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回忆，前天津犹太社团成员莱奥拉·福尔曼和莫尼卡·斯沃茨等人关于天津犹太人的回忆等，都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一时期国际上关于古代“中国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的著述仍时有出现，但基本上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并无什么新的突破。

2.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国内外关于在华犹太人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的犹太学研究全面复苏，迅速发展，中国学者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来华犹太人”的著述，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很快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古代开封等地犹太人的研究，以三四十年代的成果为基础向前迈了一大步，基本上弥补了失去30年时间所带来的损失，其标志是一批高质量的著述纷纷问世。江文汉积长期研究之成果，于1982年推出了专著《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将传入古代中国的基督教与开封犹太人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剖析，就开封犹太社团的形成、发展、特征和消亡提出了自己系统的见解，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1983年出版的潘光旦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结晶。该书除了重点研究开封犹太人之外，也论及近代以前中国境内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就犹太人来华时间、来华路线、从何而来、到过中国什么地方，特别是开封犹太社团的情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特别可贵的是，书后还附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和史料汇编。高望之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国历史上的犹太教和犹太人”认为：大批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不会早于唐代；中国犹太人被融合是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在宗教上的宽容及犹太社团本身孤立无援的困境。这些观点在国际上也受到了重视。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张绥的《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此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供自己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资料。除上述著述外，金效静、王明甫、龚方正、唐裕生、吴泽霖、戴可

来、陈昌祺、李继先、朱江、王一沙、孔宪易、赵佑之、徐伯勇等许多学者也撰文探讨了涉及古代中国境内犹太人的各方面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该领域内还活跃着一位中国籍犹太学者沙博理，他用英文编的专著《旧中国的犹太人》既以犹太人的眼光，又从中国人的角度看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令人高兴的是，80年代的中国学者已不满足于研究古代开封等地的犹太人，而开始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境内出现的新犹太社团，特别是对上海犹太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而大大拓宽了在华犹太人研究的领域，将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徐铸成的《哈同外传》于1982年问世，张仲礼、陈增年所著《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于1985年出版，再次激起了中国人对昔日上海滩上活跃的犹太财团的巨大兴趣。同时，大批外国学者（特别是犹太学者）和昔日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来到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收集资料、寻根访旧，更推动中国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研究。1987年，王庆余发表"旧上海的犹太人"一文，以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了旧上海犹太社团近百年的历史[1]。此后，潘光先后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和"关于旧上海犹太复国活动的历史考察"两文，首次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和上海的锡安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2]。在1991年出版的由潘光和金应忠主编的《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一书中，也对上海犹太人进行了专题研究。1988年，由潘光等创建的上海犹太历史研究中心成立，后更名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历史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中国犹太

1_王庆余："旧上海的犹太人"，《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

2_潘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学术季刊》1991年第2期。潘光等："关于旧上海犹太复国活动的历史考察"，《学术季刊》1992年第1期。

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在前人艰苦奋斗、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成就是与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起步的国内学者关于在华犹太人的研究工作无法割裂的。因此，应该在这里怀着敬意提一下该领域中国老一辈学者的名字：洪均、蒋观云、张相文、叶瀚、陈垣、张星烺、俞颂华、育干、葛绥成、吴泽霖……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推动“中国犹太人”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

在这同时，国外关于在华犹太人的著述也逐渐增多，其中欧洲和以色列学者推出的几本书尤其令人注目。格尔德·卡明斯基与爱尔丝·约特瑞德合著的《奥中友谊史》和弗兰西斯·克瑞斯勒的《德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两书均对德、奥籍犹太人在华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朱迪丝·本一埃利泽的《上海失去，耶路撒冷重获》和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的《难民和幸存者》都叙述了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以第一手资料和史料见长。以色列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编的《移居在中国：哈尔滨、天津、上海的犹太社团》是第一本有关1840年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图片史。此外，还有乔治·莱尼西、伊斯雷尔·基彭、亚伯拉罕·弗拉特金等人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也具有史料价值。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成立的香港犹太历史学会也积极进行有关开封、上海、香港犹太人的研究，如1985年由该会主席罗狮谷及其夫人编写的《香港犹太社区》，便是最早出现的关于香港犹太人的综合研究著述。

3. 1992年中以建交后在华犹太人研究出现的高潮

1992年中以建交后，关于“中国犹太人”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突出表现在专门研讨中国境内犹太人的国际学术会议接连召开，关于“中国犹太人”，特别是“上海

犹太人”的专著大量涌现。从1992年到2000年，这方面新推出专著数量几乎超过了20世纪前90年此类专著的总和。

1992年8月，在世界著名学府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犹太人离散在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百位专家学者和“中国犹太人”参加了会议。1994年4月，由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约有200多位学者和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参加了会议，这是此类会议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并由中国人主办。1995年5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时，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了“逃往上海，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东方大都市”学术讨论会，此会不但有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而且有许多当年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及其子女前来团聚，成为联谊、纪念、学术研讨三位一体的活动。1997年8月，在德国柏林召开了“流亡在上海”学术讨论会，以纪念部分上海犹太人重返柏林50周年。此会集中研讨二战时在沪避难的德、奥犹太难民社区，并纪念1947年近300名德国犹太人重返柏林这一历史事件。同年9月，又在德国圣·奥古斯丁召开了“犹太人在中国，从开封到上海”学术讨论会，此会坚持学术第一，不搞联谊、纪念活动，只邀请20多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与会，研讨犹太人在中国这一专题。会上提交的一些论文涉及以前较少研究的若干领域，如房建昌的“犹太人在内蒙古、辽宁、北京、天津和青岛（1911—1931）”和张守慧的“意第绪文学在中国”等。在那些年里，还有许许多多小型的研讨活动，难以一一列举，比如1999年1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研讨会，主题为“东方巴黎？哈尔滨的世界（1895—1945）”。这是当时还不多见的专门研讨哈尔滨犹太人及外侨的学术活动。

在那8年里，“中国犹太人”研究领域涌现出的专著约在30本以上，其中80%是关于上海的，特别是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比较著名的有：詹姆斯·罗斯的学术专著《逃往上海，中国的一个犹太社区》，瑞娜·克拉斯诺的个人战时日记汇编《总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王一沙积多年研究而成的力作《中国犹太春秋》，格尔德·卡明斯基经长期研究而写出的《罗生特传》，丹尼尔·列维撰写的专著《双枪科亨》，前丹麦驻华大使白慕申撰写的关于其外祖父的著作《马易尔—— 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Y.利伯曼的个人回忆和透视《我的中国，犹太人生活在东方（1900—1950）》，潘光主编的图史《犹太人在上海》和在沪犹太人回忆录汇编《犹太人忆上海》，伊夫琳·鲁宾的个人回忆和评析《上海隔离区》，欧内斯特·哈帕纳的个人回忆和评论《上海避难所》，伊沙贝尔·梅纳德的自传《中国梦——在天津长大的犹太人》，安东尼娅·芬娜尼对来澳上海犹太人进行研究后写出的著作《来自何方：犹太人从上海到澳大利亚的旅程》，西格蒙德·托帕斯的回忆录《陌生的避难所：战时上海一个犹太孩子的生活》，高斯坦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犹太人：历史和比较透视》等。此外，贝蒂·格雷本希科夫、阿里耶·马林斯基等人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也具有史料价值。有意思的是，还出现了以小说形式表现在华犹太人经历的著作。如发表过多部以纳粹大屠杀为主题的小说的法国著名作家米雪尔·卡娜，就推出了反映上海犹太难民经历的小说《上海犹太城》，连笔者也成了书中的人物。该书出版后广受欧洲读者欢迎，使他们了解了上海在救助犹太难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还被译成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欧洲语言。至于这方面的论文和文章，

因实在太多，已难以统计和列举。不过要提一下的是，当时已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研究哈尔滨、天津、香港犹太人的论文。如房建昌的"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犹太人"和"近代天津的犹太人"，就首次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哈尔滨、天津犹太人历史的概貌[1]。1995年，香港犹太社团中心编写的大型图史著作《美景成真》问世，以生动的图片和语言描述了香港犹太社团的成功之路。潘光和徐新先后发表文章，阐述了香港犹太社团150余年的发展进程，考察了其与上海等地犹太社团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其与中国内地发展的互动关系[2]。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股"中国犹太人"研究热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一批青年学者尤为突出。如，研究东北、华北犹太人的房建昌、研究上海犹太人的王健、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张倩红，研究意第绪文学在中国的台湾学者张守慧等，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知名度。同时，中老年学者唐培吉、徐信、许步曾、金应忠、沈寂等也陆续发表有价值的力作。

4. 进入21世纪后在华犹太人研究的深化和提高

进入21世纪，在华犹太人研究继续深化，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一系列研讨会在推动研究深化、提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些年来该领域的研讨会非常多，难以一一列举，这里仅提一下主要的研讨活动：2001年，在加拿大温尼伯、多伦多和澳洲悉尼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研讨、展览系列活动（后面还要提及），其中的研讨会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2002年9月，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办的"中国、以色列和犹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会议对在华犹太人和中以关系进行了

1_参见房建昌两文："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犹太人"，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近代天津的犹太人"，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2期。

2_潘光："香港犹太社团与近代中国"，《当代港澳》1998年第1期。徐新："香港犹太社团历史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较深入的研讨；2003年9月，德国美因兹大学举办了主题为“犹太人和犹太教在中国：存在和感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从开封到上海的犹太社团和犹太教的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2004年6月，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联合举办了“早期上海的中犹纽带”学术研讨及报告会，特别涉及了塞法迪犹太人与中国人的关系，这是其他研讨会所不多见的；2004年8月末9月初，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哈尔滨犹太研究中心与以色列“前中国居民协会”联合举办了“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国内、也是国际上第一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以哈尔滨犹太人为主题的学术活动，对哈尔滨犹太社团进行了全面研讨；2005年8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在国内首次举办了“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中国犹太社团与印度、日本等地的犹太社团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在华犹太人研究的领域，与会者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后来均收入《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一书中；2005年12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等单位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犹太难民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上海犹太难民获救60周年，美国前财政部长、当年的上海犹太难民布卢门撒尔到会做了主题讲演；2007年9月，湖南省益阳市政府主办了纪念何凤山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举行专门研究何凤山的学术活动；2008年11月10日，由联合国主办的纪念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之“碎玻璃之夜”70周年研讨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其中包括笔者的专题报告，谈及“碎玻璃之夜”后上海成为犹太难民避难地的重要意义。2010年、2012年、2016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连续举办了三届犹太研究青年

论坛，来华犹太人研究是讨论的一大重点。这个论坛汇聚了一批中青年精英，为来华犹太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7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联合举办了“犹太人在中国：一个公共史学的热点议题”学术报告和研讨会，首次将这个题目纳入公共史学的范畴，是将犹太人在中国、特别是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从研究机构推向社会的一个重要尝试。

在新世纪，虽然对近代以来“中国犹太人”的研究成为持续升温的热点，但仍有关于古代来华犹太人研究的文章不时出现。党宝海以《至正金陵新志》中记载的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珠笏氏亦思哈为犹太人这一发现为线索，提出了对研究元代犹太人以及相关汉文史料很有价值的思路；张倩红则注重研究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原因，认为“开封犹太人同化的最根本原因来自犹太社团内部，即对犹太教信仰的彻底淡化和对儒教的深层次认同，犹太教的儒化过程正是开封犹太人的同化过程”。此外，肖宪对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探讨犹太人被同化而穆斯林社团却不断壮大的原因[1]，殷罡也对开封犹太人的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2]。

同时，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犹太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提高，这在“上海犹太人”研究方面表现最为突出。2001年，潘光主编的大型中英文图史著作《犹太人在中国》问世，以400多幅图片讲述了犹太人在中国走过的十多个世纪的历程，在国内外受到好评。该书后来又多次重版，还在美国出版，并被译成德文和法文，还将译成俄文和希伯来文。

1_肖宪：“中国历史上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比较研究”，载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2_殷罡：“开封犹太人：来历、经历与同化进程”，载沙博理编：《中国古代犹太人》，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2002年，潘光和王健推出专著《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2010年，两位作者又在此基础上推出力作《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实现了该题目研究的深化和提高。如：系统研究了1840年以来犹太人来华的四次高潮；全面论述了来华、来沪犹太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及其对中国、上海的影响，其中对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和上海锡安主义活动的研究使用了许多新发掘的资料；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哈尔滨、天津、香港犹太社团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对台湾犹太社团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二战后犹太人逐批离华的原因，并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犹太人的情况和上海犹联的活动；系统研究了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中犹关系，特别对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革命、建设中的中犹友谊和犹太友人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对何凤山义举和孙科计划首次进行了详细介绍；对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国犹太人"及其中国记忆、上海情结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开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犹太人重返中国这一新态势，在该领域研究方面有所拓展和创新。2003年，饶立华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专著《流亡者的精神家园——〈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出版，是研究上海犹太难民的一部力作。该书通过对一份上海犹太难民办的德文报纸《上海犹太纪事报》的研究，解读了上海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和离散特征，剖析了流亡异国在夹缝中生存的犹太难民特有的心态，揭示了他们圆熟的办报技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汤亚汀对不同时期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作了深入研究，就此写了一系列论文和文章，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专著《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850—1950，1998—2005）》。作者认为，上海犹太人的音乐生活反映了犹太民族很强的适应能力，

也是犹太社群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基础。许步曾积多年研究写出的著作《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介绍了上海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由宋妍主编的图史著作《虹口记忆》和张艳华编著的《提篮桥——犹太人的诺亚方舟》聚焦当年为欧洲犹太难民提供避难所的上海虹口提篮桥地区，体现了对在沪犹太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2008年，王健推出新作《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将上海犹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诸方面活动均纳入社会生活发展历程这条主线进行综合研究，其中有专章研究上海犹太人的礼仪和社交生活，这是其他该领域研究专著中所没有的。2010年和2011年，王健又连续推出《上海的犹太文化地图》和《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与张艳华合作)，使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研究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

外国学者和前上海犹太居民关于在沪犹太人的著述也大批涌现。因论文和文章数量太多，这里只能介绍一些著作：梅西·麦耶的《从巴比伦河到黄浦江：塞法迪犹太人在上海的一个世纪》对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阪东宏的《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1931—1945》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日本对犹政策的演变，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在沪犹太人；丸山直起的《太平洋战争和上海的犹太难民》首次从日本学者的视角探讨了战时上海的犹太难民问题，具有较高学术水准；格奥尔格·阿姆布鲁斯特、米歇尔·科尔施特鲁克和索尼娅·谬贝格尔主编的《逃亡在上海1938—1947，流亡中的犹太生活》，是一本论文和回忆录的汇编，对研究上海犹太难民社区极有价值；玛莎·瑞斯塔诺的《最后求助的港口：上海的离散者社团》不仅对上海的犹

太人进行了研究，也研究了在上海的其他离散者社团；格尔德·卡明斯基的《老上海浮世绘——奥地利画家希夫画传》以生动的语言和栩栩如生的图画反映了犹太难民在沪期间这个大都市的生活；瑞娜·克拉斯诺的《上海往事：1923—1949，犹太少女的中国岁月》则以细致的文笔描写了上海俄国犹太社区的生活。出生在上海的山姆·莫辛斯基的新著《别了，上海—— 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则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一个俄国犹太人家庭在上海的生活。还有索尼娅·谬贝格、丽莉·斯卡尔、马托克·尼西姆、弗雷德·安特曼等人写的个人回忆录，也都具有史料价值。

与上世纪末不同的是，在"上海犹太人"研究继续深化之时，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研究也开始迅速崛起，紧跟"上海犹太人"研究的发展步伐，成果不断涌现。曲伟、李述笑主编的大型图史著作《犹太人在哈尔滨》，曲伟、李述笑主编的论文、报告、访谈、回忆录汇编《哈尔滨犹太人》，张铁江的个人研究成果汇编《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曲伟、特迪·考夫曼主编的论文集《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刘爽的学术专著《哈尔滨犹太侨民史》，韩天艳、程洪泽、肖洪的著作《哈尔滨犹太家族史》等以及一批有关哈尔滨犹太人的论文、文章相继推出。关于犹太人到哈尔滨的原因和过程，随着相关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上述学者们已经基本勾勒出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景：沙俄的反犹排犹政策、中东铁路的修筑，苏俄的革命和内乱，以及东北开放开发带来的机遇等[1]。有的学者则进一步考察了哈尔滨犹太人口、国籍及其职业构成等问题[2]。对于哈尔滨犹太社团的社会文化生活、社团组织及其主要活动、功能，学者们做了初步考察，并探讨了伪满洲国时期

1_参见张铁江："哈尔滨：近代东亚犹太人最大的活动中心"，《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6期；刘爽："哈尔滨犹太人探源"，《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王冰："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建立及其基本状况"，《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_李述笑、傅明静："哈尔滨犹太人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3期。

日本人与犹太人关系的演变。哈尔滨犹太人的文化活动和成就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对哈尔滨的犹太圣裔社、犹太会堂、犹太墓地、犹太人创办的报刊等也进行了相关的考察。与上海犹太人相似，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金融和工商业中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学者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还对一批有影响的犹太家族和犹太商人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他们在哈尔滨商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活动引进大量国际资金，扩大了哈尔滨的对外开放程度[1]。曲伟在论及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地位时指出了他们的几大成就：创建了完整的国际社区，创造了经济和贸易奇迹，构建了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特色文化，留下了有丰厚文化韵味的建筑，还涌现了许多世界一流人才[2]。同时，国外也出现了几本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特迪·考夫曼的《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赫尔穆特·斯特恩的《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和玛拉·穆斯塔芬的《秘密和间谍：哈尔滨档案》。前两本书以个人和家族的经历为主线，深情地描述了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玛拉·穆斯塔芬则以自己在苏联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史料为基础，揭示了部分哈尔滨犹太人返回苏联后的悲惨遭遇。

随着相关文件、档案的发现，对天津犹太人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王立新在房建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充实和深化，写出了“天津近现代史上的犹太人及其经济社会生活”，对天津犹太人的经济社会生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3]。由宋安娜编写的《犹太人在天津》(画册) 和《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著作)，将关于天津犹太人的研

1_张铁江：“论犹太人在哈尔滨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_曲伟：“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地位”，《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3_王立新：“天津近现代史上的犹太人及其经济社会生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究推向公众和世界，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关于香港犹太人的研究继续拓展，香港犹太历史学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地学者也在这方面努力探索，如潘光和周国建考察了香港犹太社团“文革”前与“文革”后与新中国的关系，今日香港犹太社团的文教活动、职业构成、国籍来源等问题[1]。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台湾也有一个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的犹太社团。在台湾犹太社团提供资料的基础上，潘光和周国建对台湾犹太人做了初步考察[2]。

在新世纪国内外推出的关于在华犹太人研究的著述中，有不少并不针对某个城市、地区的犹太人，而是对整个“中国犹太人”进行综合研究，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犹太社团的研究，还有不少则注重研究中犹关系，包括中以关系。同时，又有一些来华犹太人的回忆录陆续发表，披露了更多有价值的史料。高斯坦继《中国的犹太人I：历史和比较透视》后又推出了其主编的《中国的犹太人II：史料汇评和研究指南》，进一步夯实了在华犹太人研究的资料基础。罗曼·马雷克主编的《从开封到上海：犹太人在中国》，汇集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对从古至今的“中国犹太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彼得·科普佛主编的《犹太人和犹太教在中国：存在和感知》是一本论文集，其中一些文章研究了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看法。周迅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专著《中国人看犹太人和犹太教：中国人犹太观的发展史》，首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人犹太观的发展历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色列前驻华大使泽夫·苏赋特以自己的日记为基础撰写的《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和高斯坦主编的《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则着重考察了中犹、中以关系的发展演变，其中首

1_潘光、周国建：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研究，《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_前引潘光、周国建：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研究。

次披露了一些重要史实。还有一些著作的主题并非来华犹太人，但却丰富了对二战期间中犹人民互相支持这段珍贵历史的研究。如蒋作斌主编的《国际义人何凤山》和张至善编译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就对积极救助犹太难民的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和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国际纵队中一批犹裔医生来华支援中国抗日的事迹进行了深入研究，披露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史料。此外，更多来华犹太人的回忆录陆续发表也对在华犹太人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如爱泼斯坦的回忆录《见证中国》、李敦白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叶华的回忆录《世纪之恋——我与萧三》等，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关于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新犹太社团和居民群体的研究，是在华犹太人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潘光、王健、汪舒明、周国建、徐新等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了中国学者的独到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还要提一下的是，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从2007年开始推出《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第一本是《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对中国、印度、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犹太社团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二本是《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 1978—2008》，其中详细介绍了在华犹太人研究的重要著述和成果；第三本是《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深入探讨了纳粹大屠杀的后果与影响，与犹太人来华避难密切相关；第四本是《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其中有"来华犹太人研究"专章；第五本是《离散与避难：犹太民族难以忘怀的历史》，再次深挖直接导致犹太人来华的离散、避难主题。

5.“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0年年底，经国家级资深专家评审，“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潘光担任首席专家。这一战略性举措，使来华犹太人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五年多来，项目组以争分夺秒的精神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前犹太难民的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资料。经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该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为推出质量更高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2015年，项目组推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潘光主编的《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使用的完全是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抵达上海和走进中国、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力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同时，项目组专家王健推出了两本通俗读物《救亡与拯救——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和《犹太难民与上海》。另一位项目组专家斯蒂芬·霍奇斯塔特是来华犹太难民口述史研究专家，他花费二十余年的时间采访了几十位定居在美国的原上海犹太难民，推出了《避难上海：逃离第三帝国的故事》一书，为我们研究来华犹太难民提供了大量丰富

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准备将已收集到的大量与来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报刊、记忆、人物、评析等各方面资料整理出版，形成《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四卷，为课题最终成果的完成做好准备。

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日趋衰老，不少人已离开人世，他们所掌握的资料也逐渐变旧、发黄、破碎、散失。因此，对于研究"中国犹太人"的学者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抢救资料，包括这些"中国犹太人"手中所掌握的"死资料"和他们脑中的"活资料"。设立"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国家重大项目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抢救资料。同时，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中犹研究会、依浮研究所 (The Yivo Institute) 、利奥・贝克研究所 (The Leo Baeck Istitute) 、设在美国加州北岭州立大学的"老中国通"文献委员会 (Old China Hands Archive) 、捷克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波兰犹太历史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等机构都已越来越重视这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开始全力搜集"中国犹太人"及其后代所掌握的史料，并着手进行采访仍健在者的口述史档案录制项目。可以相信，随着这一庞大工程的逐步推进，在华犹太人研究的基础将更加扎实。

二、展览会和影视、音乐作品

"犹太人在中国"这一题目逐步走向社会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犹太人"及各国对华友好人士大力推动的结果。他们当然懂得这一题目的学术价值，但更重视它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促进中犹友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重要意义。学者们虽

然往往更看重这个题目的学术性，但也乐见自己的研究成果走出书斋，产生社会效应，因此同样积极支持并参与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在“犹太人在中国”热从学术界扩展到社会的过程中，展览会和影视、音乐作品发挥了突出作用。

1. 20世纪下半叶的展览会和影视作品

早在1948年，纽约的依浮研究所就举办过有关上海犹太人的展览会[1]，但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轰动效应，这大概是由于在那时的冷战气氛中，有关中国的题目过于敏感又带有太重的政治色彩。直到3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中国犹太人”的展览和影视作品才大量出现并真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显然又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引起全球关注这一大气候密切相关。

198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在当地“中国犹太人”和有关学者的帮助下举办了关于开封犹太人的展览会，在以色列引起轰动。特别是那个颇像中国式寺庙的开封犹太会堂模型，使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赞叹不已，被誉为中犹文化融合的奇妙结晶，后来便成为该博物馆的永久性展品，还被印在以色列的邮票上。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还以这次展览会的展品为基础编了一本有关开封犹太人的画册[2]。在这前后，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中犹研究会等组织也拍了一些介绍开封、上海犹太人的纪录片，但主要还是在学术界流传。1989年，比利时犹太裔制片人兼导演D. 帕瑞茨泰京（Diane Perelsztejn）拍摄了艺术纪录片《奔向日出之地》（*Escape To the Rising Sun*），以写实手法详述了五位波兰犹太人是怎样逃离波兰，经立陶宛、苏联、日本辗转来到上海的。此片一出，使公众对犹太人战时在上海的经历大感兴趣，许多当年的“上海犹

1_依浮研究所（Yivo-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编：《“上海的犹太生活”展览会目录》（*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Jewish Life in Shanghai*），纽约，1948年版。

2_贝思·哈特夫所斯博物馆（Beth Hatefusoth Museum Of the Jewish Diaspora）编：《开封犹太人，黄河岸边的犹太人》（*The Jews of Kaifeng: Chinese Jews on the Banks of the Yellow River*），特拉维夫，1984年版。

太人"纷纷出来发表感想,学者们也出来撰文介绍那段历史。此片后来还获得澳大利亚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1991年年底,就在中以建交前夕,笔者参与创建的和平与发展研究所以色列犹太研究中心与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首次在上海联合举办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展览,同时附设一个有关上海犹太人的展览会。这大概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作的关于"中国犹太人"的展览会,当时轰动了上海滩,为中以建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后来该展览会中有关犹太难民的部分内容转入上海虹口摩西会堂旧址陈列馆(即现在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作永久性展出。

1992年1月中以建交,使这一年从一开始就充满中犹友好的气氛,"中国犹太人"研究热也随之升温。由加拿大裔制片人凯伦·肖帕晓维奇女士拍摄的纪录片《一个拯救你生命的地方》(*A Place To Save Your Life*)就在中以建交后不久推出,在加拿大和美国引起热烈反应。该片摄制组采访了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的数十位当年在上海避难的欧洲犹太难民,最后到上海实地拍摄,生动地讲述了犹太难民们在上海的经历。8月,就在哈佛大学召开"犹太人离散在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中国和犹太人"(China and the Jews)展览会,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极大兴趣。以色列著名学者I.埃班(Irene Eber)还将展品目录、部分展品及自己的评述汇编成册[1],由哈佛大学图书馆印制推出。

1994年4月,在上海召开"犹太人在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由以色列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上海犹太社团"展览会同时举行,它第一次以精致的照片展示上海犹太社团发展的全

1_I.埃班(Irene Eber):《中国和犹太人》(*China and the Jews*),马萨诸塞,剑桥,1992年版。

过程，在展品质量和技术水准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历次此类展览。会后，该展览的所有照片转入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作永久性展出，现在从世界各地来沪的犹太朋友都要来中心参观这一小型展览。

1995年5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逃往上海”学术讨论会期间，奥方也精心置办了两个展览会。一个是关于奥地利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小型展览，另一个是奥地利犹裔画家许福 (Friedrich Schiff) 的作品展，集中展示了他作为难民在沪居住期间创作的几十幅画。这两个展览在奥地利和中欧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年轻人观后表示要牢记历史上那难忘篇章，为促进中犹友谊作贡献。

1996年，正值中国和奥地利建交25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奥地利奥中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罗生特大夫生平事迹展览会”在上海开幕，奥地利执政两党和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联合组团参加了开幕式。该展览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罗生特大夫的光辉一生，使参观者深受感动。上海一家报纸在报道这个展览会时使用的通栏标题是“奥地利也有一个白求恩”[1]。同年夏，纽约的利奥·贝克研究所也举办了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的展览，与1992年在哈佛举办的展览会相比，这一次因在纽约市中心展出而在美国公众中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1997年在德国柏林和圣·奥古斯丁的两次学术活动也都在同时举办了展览会。柏林的展览会办在柏林犹太博物馆，主题为“流亡在上海1938—1947”，主要反映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不但展出了大量图片和照片，还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实物，包括当年犹太难民使用过的中式家具、服

1 上海《青年报》，1996年4月11日。

装和杂物。这次展览会的规模超过了此前历次同类展览，在德国引起轰动。圣·奥古斯丁的展览会则与学术讨论会配套，虽规模不大，但学术水准堪称一流。主题为"从开封到上海，犹太人在中国"，主要介绍犹太人移居中国的历史和有关"中国犹太人"的研究状况，几乎收集了所有这方面的学术著述，使学者们获益匪浅。当年10月，在当地"中国犹太人"的大力推动下，由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主办的大型展览会"避难所的故事：犹太人在上海"在墨尔本开幕。这次展览会与柏林那次相似，以图片和实物相结合，主要展示犹太难民在沪生活，并举办学术报告会和座谈会。这是首次在澳洲举办这样的活动，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做了大量报道，并称这样的活动有助于促进澳洲多元种族、文化的交往和融合。就在同时，美国中犹研究会也在加州帕罗奥托举办了主题为"在丝绸之路的尽头：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小型图片展。

从1997年到1999年，又连续出现了几部关于"中国犹太人"的影视作品。德国著名制片人U.奥汀格（Ulrike Ottinger）经过数年寻访和拍摄，推出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离散在上海》（*Exil Shanghai*），讲述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和经历。该片曾在1997年柏林电影节上被评为最佳纪录片。美国犹裔制片人J.格罗斯曼（Joan Grossman）和她的合伙人P.罗斯迪（Paul Rosdy）拍摄的反映上海犹太难民生活的《最后一着——上海避风港》（*The Port of Last Resort*）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放映后获得好评。旅美中国画家陈逸飞投资并自任导演拍摄了纪录片《上海方舟》和艺术纪录片《逃往上海》，上海电视台也推出了三集电视片《逃亡上海》。这些影视片放映后在

中国公众，特别是上海观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使“中国犹太人”热也来到了其故乡中国。

1999年，以色列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与奥中友好协会合作，首次在以色列举办罗生特生平事迹展，使广大以色列人民第一次了解到罗生特为促进中犹、中奥友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许多参观者热泪盈眶。同年10月，在加拿大温哥华开展了由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和犹太人大屠杀教育中心联合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活动，以“犹太人在上海”展览会为主、辅之以学术报告、小型研讨和放映电影等配套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一次由华人社团和犹太社团联合举办这样的活动，因此不仅具有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促进中加、中犹友谊及加拿大华犹两族关系之重要现实意义。此次活动中最引起轰动的是首次公布了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通过发放签证救助犹太难民的历史资料，在世界各地媒体引起轰动。

2.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展览会和影视、音乐作品

温哥华系列活动也许是20世纪最后一次有关“中国犹太人”的大型活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犹太人”热仍继续升温，各类展览接二连三地举行，影视等文艺作品也不断出现，往往与学术研讨互相配合，使这段历史为更多的社会公众所了解。因这些活动实在太多，这里只能列举其中若干。

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于2000年5月举办了主题为“逃亡和救助”的展览会，其中有许多涉及犹太难民逃亡上海的内容，这是该馆首次举办与中国有关的展览。2001年1月到3月，加拿大温尼伯中华文化中心、犹太社团中心等联合举办“上海情结”研讨、展览系列活动，以纪念上海在救助犹太难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地日本社

团也参与了这次活动，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同年11月，由加拿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犹太社团联合主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幸存者的故事”研讨、展览系列活动在多伦多举行。同时，澳洲悉尼犹太博物馆也举办了有关上海犹太人的展览活动。前面提到的2002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以色列和犹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9月在德国美因兹大学举办的“犹太人和犹太教在中国：存在和感知”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早期上海的中犹纽带”学术研讨及报告会等，也都举办了与学术研讨配套的展览活动。

2004年以来，几场水平较高的大型展览在国内外受到好评。2004年8月末9月初，在“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与会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大型展览“犹太人在哈尔滨”，这是国内、也是国际上第一个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大型的、综合性的展览。现在，这个展览已迁入修缮一新的原哈尔滨犹太新会堂，改为“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展览”，作永久性展出。2005年12月，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上海犹太难民获救60周年，在“犹太难民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的同时，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出了“上海：大屠杀受害者的避难地——犹太难民在上海”主题图片展，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生动地再现了二战期间上海人民接纳和救助犹太难民的感人历史。2006年10月，该图片展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波兰首都华沙隆重展出，产生重大反响。2007年9月，在湖南省益阳市举办纪念何凤山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时，也举行了何凤山事迹展览，后又到上海等地展出。2008年7月，由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美国西蒙·维森塔尔

中心联合举办的“犹太人在近代中国”大型展览会在美国洛杉矶隆重开幕。由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开幕式并参加系列活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亚柯萨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展览会受到了美国犹太社团、旅美华人华侨及广大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美国各大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此后，美国各地纷纷邀请该展览前去展出，该展览又于2010年在美国旧金山展出。2016年12月，该展览首次在以色列展出，作为庆祝中以建交25周年系列活动的第一项内容。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也制作了关于几个欧洲犹太难民家庭在上海避难经历的展览，在美国、以色列、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展出，获得好评。2012年，旧上海犹太照相师沈石蒂拍摄的一批上海老照片被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发现，以色列总领馆在网站上发消息寻找照片中的人物及其后代，还举办了“沈石蒂老上海照片展”，于是掀起了又一波“上海犹太人”热潮。2015年，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该馆重新装修，推出了全新的陈列展。

在此期间，仍有不少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文艺、影视作品推出。2005年5月，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上海犹太难民获救60周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推出了反映上海犹太难民儿童生活的儿童剧“伊兰上海寻亲记”，首次尝试向儿童讲述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1]。德国作家斯特凡·舒曼（Stefan Schomanmn）撰写的纪实小说《最后的避难所：上海——罗伯特·罗伊尔·索卡尔与杨珍珠的爱情故事》，描写了一位犹太难民与一位上海姑娘的60年异国婚恋，感动了许许多多读者[2]。2007年，德国作家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推出了传记体小说《旅行箱盛不下的世

1_前引潘光《犹太人在上海》，2005年版，第127页。

2_《文汇报》，2009年2月18日。

界》，描写了二战期间中国人与德国犹太难民之间的友谊，作者希望将此书献给"那些友好地接纳了外来者的人们"[1]。同时，又有不少关于"中国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犹太难民的纪录片推出。特别是在2015年，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关于来华犹太人、特别是来华犹太难民的纪录片成批涌现，形成一个高潮。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广东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山东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以及美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等国电视台，纷纷推出这一题材的纪录片，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的《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在纽约放映时引起轰动。

不过，观众已越来越不满足于观看内容雷同的纪录片，而希望能看到像《辛德勒名单》那样的故事片问世。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李安、范霍文、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梅达沃伊、小说《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肯尼利等都对此感兴趣，正在策划以上海犹太难民为题材拍摄一部故事片。《辛德勒名单》的导演斯皮尔伯格组织了一个寻访"上海犹太人"的口述历史项目，打算在此基础上拍故事片。《本能》《黑皮书》的导演范霍文则表示要来上海收集资料，并希望求助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2]。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面向少年儿童的美术动画故事片《犹太女孩在上海》首先问世，而且一举获得了2010年耶路撒冷国际电影节最佳历史题材片提名奖。

除电影之外，歌剧、舞剧、京剧、交响乐等表演形式的编导们也都想做这一题材的作品。2015年9月3日，在纪念犹太难民来华避难、幸存70周年之时，中国与以色列合作的音乐剧《犹太难民在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获得一片好

1_《文汇报》，2009年3月1日。

2_上海《青年报》，2009年2月5日。

评。目前，该剧已收到了来自以色列、美国、欧洲诸多国家的邀请，将赴世界各地演出。

看来，在华犹太人、特别是来华犹太难民这一题目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公众和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

三、永远难忘的历史篇章

关于“中国犹太人”的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和社会热潮逐步深入，又与国际形势和一些地区、若干国家（包括中国）内部的发展相呼应，逐渐具有社会政治色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一些人公然出来否定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就使“中国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开创未来的意义越发突出了。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特别是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20世纪晚期的重要访问和纪念活动

早在1986年，以K.杜德纳（Kurt Duldner）为首的一批前上海犹太难民就提出要在虹口原难民居住区建一块纪念匾，赞扬中犹人民之间的患难友情，以纪念那难忘的历史篇章。匾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地区曾有2万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幸存下来。谨以本匾献给所有幸存者以及施加援手的热情好客、宽宏大量的中国人民。”[1]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对此表示支持。

前已提及，1991年年底在上海举办的有关纳粹大屠杀和上海犹太人的展览为中以建交创造了氛围。同时，这两

1_参见潘光、金应忠主编：《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关于来华犹太人，特别是来华犹太难民的著作越来越多

个展览也是对德国、日本一些人妄图否定德、日法西斯所犯罪行的一个直接回应。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参观了展览，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所震撼，又为上海拯救了犹太难民感到自豪。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要不忘历史悲剧，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历史、篡改历史的图谋。

1992年12月，以色列总统海姆·赫尔佐克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个访华的以色列国家元首来到中国，他对杨尚昆主席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1]总统的一个叔叔就曾在二战期间避难来沪，后病逝于上海。1993年10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访问中国，专程参观上海犹太会堂和虹口原犹太难民居住区，再次对中国人民为犹太难民提供避难地表示深切的感谢。

1994年，上海市政府和虹口区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居住的虹口地区的中心——霍山公园（旧称汇山公园）内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并邀请当年的犹太难民代表和世界各地的"上海犹太人"前来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同时还举行学术讨论会（前已提及）。率领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 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2]此后几年，上海市政府还拨款重修了位于虹口的摩西犹太会堂和位于陕西北路的拉希尔犹太会堂，并在拉希尔会堂内布置了由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等单位制作的反映上海犹太社团历史的图片展。犹太难民纪念碑、两个犹太会堂、和平饭店（原沙逊大厦）、市少年宫（原嘉道理大厦）、五官科医院（原上海犹太医院）、音乐学院办公楼（原上海犹太俱乐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等形成了一条犹太特色旅游

1_潘光、余建华、王建：《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2_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热线，每天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和旅游者。上海市政府旅游事业管理部门专门为此编写了中英文的犹太旧址旅游图，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还推出了“犹太旧址一日游”。

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在欧洲举行了许许多多纪念活动，但只有一次活动是直接与中国有关的，那就是前面提及的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学术讨论会及展览会。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次活动后几天，奥地利议会首次通过一项提案，决定设立一笔基金，作为对纳粹暴政给奥地利犹太人造成苦难的赔偿。当年秋，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在访华时专门到上海虹口犹太难民纪念碑献花，并代表奥地利人民感谢中国人民、上海人民为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据陪同总统的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后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回忆，总统在参观虹口时情绪激动，多次流泪。次年举办的罗生特生平事迹展览会，重点在于颂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成的中犹友谊和中奥友谊，永远铭记在华犹太朋友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不朽功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7年在柏林和墨尔本举行的那两次活动，同样具有十分特殊的现实意义。在柏林举行的学术研讨和展览活动期间，专门为纪念50年前部分上海犹太人重返柏林挂了一块纪念匾。在纪念匾揭幕仪式上，包括市长代表在内的多位发言人一致表示要牢牢记住那段历史，使悲剧永不重演。正是在这次活动期间，许多人一再提出在柏林建立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的建议。后来，德国议会和政府正式决定在柏林建这样的纪念馆，该纪念馆已于2004年年底落成。在墨尔本举行的展览会和学术活动则着力于倡导多元文化的

共处和融合，颂扬中犹两大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一些发言人还直接抨击了以保拉·汉森为首的单一民族党所宣扬的反移民、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思潮。澳大利亚媒体对这次活动所做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也都突出了这一主旨和精神。

1998年春夏之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先后访问了上海犹太旧址。内塔尼亚胡总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虹口的摩西会堂和犹太难民纪念碑，一再对上海人民当年救助犹太难民表示感谢。希拉里·克林顿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一行参观了拉希尔会堂及会堂内的"犹太人在上海"图片展。参观后第一夫人对记者说："上海市政府能将这样一个80年历史的古老会堂维修得这么好，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尊重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自由的最好例证，说明中国是尊重历史，是尊重外侨在中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1]。奥尔布莱特国务卿在走到会堂门口时也对记者说："这座会堂的开放显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进展是多么深刻，这再次证明总统决定来此访问是正确的，并揭穿了那些反对总统如期访华的人所散布的谣言。"[2]此类事例突出显示，"中国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犹太人"）这一课题不但在促进中犹、中以友谊，而且在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中美关系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1999年春，以色列总统魏茨曼访问了上海虹口和拉希尔会堂。11月3日，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访问了拉希尔会堂及内设图片展。他的访问更具特殊意义，因为当年逃来上海的犹太难民绝大多数来自德国及德占地区。他在贵宾留言簿上写道："曾有诗人说，当年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使'，而有许多被迫害者在这里找到了避难的港湾"。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并向在这里伸出援手的人们致以极大的感

1_潘光："陪同美国第一夫人访问拉希尔犹太会堂旧址"，载《上海外事》1998年第18期，第13—14页。

2_同上。

谢和赞赏[1]。多年前，也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在华沙犹太起义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代表德国人民向波兰人和犹太人表示认罪和忏悔。今天，施罗德总理又以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表明：德国人民没有忘记那场历史悲剧，将世代铭记历史教训，坚决抵制否定历史的各种错误思潮，决不允许种族主义和新纳粹卷土重来。令国际舆论界注意的是：他选择上海来做此表示，这实际上是代表德国政府和人民正式肯定上海在救助犹太难民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并向中国人民表示真挚的感谢；同时，他采取这一行动正值奥地利的亲纳粹政党在大选中获得进展，因此也是对这一令欧洲不安的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回应。

就在德国总理访问上海犹太会堂后几周，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参观了耶路撒冷的耶德·瓦谢大屠杀博物馆。当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说该馆为那些在二战中救过犹太人的非犹太团体或个人种一棵树以示纪念时，李鹏告诉这位负责人：中国人在上海救过不少犹太人。该负责人当即表示将在馆内专门开辟一角，介绍中国救助3万名犹太难民的事迹，也要为救过犹太人的中国人种树[2]。李鹏在留言簿上题词："沉痛悼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幸遇难的犹太人民。"他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的杀害，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沉痛的事情。我们中国在那次大战中，也伤亡了3 000万人。他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我们应该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让类似的悲剧在世界上重演[3]。

前面提到的何凤山博士事迹的发掘和宣布，又是

1_潘光："陪施罗德访问上海犹太会堂旧址"，《文汇报》，1999年11月22日。

2_《人民日报》，1999年11月30日。

3_同上。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5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许多正义之士挺身而出救助犹太难民。瑞典外交官瓦伦堡以颁发外交护照等方式救出了上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前述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上级反对给数千名波兰犹太难民签发过境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纳粹的捕杀；描写德国实业家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现在更是家喻户晓。战后，以色列议会曾通过一条法令，规定以色列政府应代表犹太人民感谢所有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或非犹太家庭，并授予他们"国际义人"称号。截至1990年5月1日，总共有8 611人因此项法令而接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国际义人"称号[1]，此后又有更多的人取得了此项殊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对于那些熟知上海在二战期间救助犹太难民这段历史的学者来说，这一点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为救助犹太难民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他们的事迹至今不为人所知。60多年过去了，要找到确凿的历史证据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学者们也曾想过在驻欧洲的中国外交官中寻找线索，但由于从1937年到1939年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是无须签证的，因此一度没有在这方面花较多的精力。1995年笔者访问德国、奥地利时才了解到，当年犹太难民若无其他国家外交机构发的签证是无法离开的。在维也纳，许多当年的犹太难民向笔者提到了何凤山博士的名字，有的还讲述了他救助犹太人的故事。此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便开始积极寻找关于何凤山博士的资料，并向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和有关大屠杀研究机构发出了寻求帮助和合作的信息。在这些组织和机构中，最为积极的就是与西

1_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犹太历史地图集》(*Atlas of Jewish History*)，纽约，1993年版，第104页。

蒙·维森塔尔中心关系密切的"生命签证"(Visa for Life)组织。他们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住在美国的何凤山之女何曼礼女士及许多当年何凤山救助过的犹太人。经多方通力合作，有关何凤山博士救助犹太人的完整资料终于整理出来了，并利用温哥华活动的机会向全世界推出。有关何凤山博士的一些情况，前面已经提及，这里就不再重复。何博士的事迹一经公布，便在世界各国媒介引起轰动，许多报纸刊登了他的事迹和照片，并称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2000年10月，经过以色列相关部门的周密调查，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正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称号。2007年9月，以色列政府又授予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证书。

2.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要访问和纪念活动

进入新世纪，与这一难忘的历史篇章密切相关的重要访问和纪念活动在内容方面继续深化，在层次上则不断提高，这里仅举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和事件。

2000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问以色列。这是中以建交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以色列的首访，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时特别提到："我们不会忘记，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找到了他们的避难所，受到了当地人民温暖的容纳。"[1]访以期间，江泽民主席专程到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并向包括来华犹太难民在内的大屠杀受害者敬献花圈[2]。

2003年，中国各地举行了纪念罗生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为此还发行了纪念邮票，罗生特在华手记也正式出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

1_《人民日报》，2000年4月14日。

2_前引潘光：《犹太人在上海》，2005年版，第115页。

尔特意写信祝贺罗生特在华手记出版。胡锦涛主席在贺函中写道:“罗生特大夫从1941年到1949年间，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光辉业绩已载入史册。他是中奥人民友谊的象征，将永远为后人所缅怀。”[1]当年9月，正在上海访问的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和夫人在百忙中抽空来到虹口原犹太难民聚居区，进行了一次“回顾历史”之旅。他在贵宾留言簿上挥笔用德文写下了以下这段话:“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2]总统在此时题写这段话想要表明两层意思：一是对迫害犹太人罪行的谴责，影射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二是对救助犹太人行动的赞扬，暗指上海当年对犹太难民的救助。前已提及，2004年6月下旬，以色列副总理兼工贸部长埃胡德·奥尔默特访问中国，终于实现了来到父辈故地的愿望。不久后，他出任以色列总理。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由一位“中国犹太人”的儿子担任国家领导人还是第一次。2007年初，奥尔默特作为总理再访中国。他对记者说:“中国文化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我在以色列童年时代最初的记忆。”[3]

前已提及，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上海犹太难民获救60周年，上海各界于2005年举行了研讨、展览系列活动。在此前后，上海市政府将虹口区的提篮桥地区正式列为“犹太历史风貌保护区”，成为上海十二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并组织专业人员将区内老建筑“修旧如旧”。上海虹口区政府也专门拨款修缮原摩西会堂内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修缮后的新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访客。从2005年起，奥地利政府每年派出一位“大屠杀纪念服务志愿者”到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相当于在奥地利

1_［奥］格·卡明斯基主编:《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_这段话出自《圣经——诗篇第126篇》，主要反映了当耶和华解救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并将他们带回到巴勒斯坦的锡安山（犹太人心中的“圣山”）时，人们的喜悦心情。

3_新华社北京电，2007年1月9日。

服一年兵役，至今已有十多位奥地利年轻人前来上海进行犹太难民研究或相关服务。2006年4月，"上海犹太人重聚上海"活动隆重举行，有120多位前上海犹太人及其亲属参加。对他们中许多年事已高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上海重聚，因此许多人把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一起带来上海，组成了近百人的全球"上海犹太人"代表团，年龄最小的才12岁。除了参观老上海和新上海之外，他们访问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与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进行交流，出席了上海各单位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与上海市领导、学术界人士、企业界名流和今日上海犹太社团代表共叙友情。他们还重返虹口，与当年的中国老邻居座谈，并参加签名支持虹口"犹太历史风貌区"申报联合国"战争遗产"项目的活动。

在2007年9月的纪念何凤山逝世十周年活动之后，又出现了纪念何凤山的一波热潮。2008年5月至10月，"纪念何凤山"系列活动在美国华盛顿、中国上海和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在5月21日于华盛顿举行的系列活动开幕式上，美国联邦海外遗产保护委员会主席米勒和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何凤山的义举[1]。6月6日，美国参议院还专门通过了关于表彰何凤山博士的议案，这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同年6月和10月，又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维也纳的中国总领馆旧址举行了何凤山纪念匾揭幕仪式。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此前后，关于来华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犹太难民的纪念活动又掀起一波高潮。2014年9月3日，是中国正式立法确定的首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上

1. 上海《文汇报》，2008年5月23日。

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隆重举行“上海犹太难民名单铜墙”揭幕仪式。该铜墙长34米，刻有迄今掌握的13 732个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的名字。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今后这个名单上的姓名一定还会不断增加。进入2015年，在前已提到的研讨会、展览会、影视作品、音乐剧纷纷推出之时，也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纪念性、教育性活动。2015年5月24日至31日，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世界史学会联合举办了“纪念犹太难民来沪避难幸存70周年系列讲座”，上海市民踊跃参加，讲堂内座无虚席。一个月后的6月23日，又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重要成果《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新书发布会，以纪念犹太难民来华避难幸存70周年，国内外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2015年9月6日，上海犹太纪念园开园仪式在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举行。该园是上海乃至国内唯一的全面展示近现代犹太人在上海生活和经历的纪念景点。纪念园开园后，将向海内外参观者免费开放，成为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新地标，为增进中犹友谊作贡献。同年11月17日，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与中美教育基金联合主办了“纪念犹太难民来沪避难幸存70周年”论坛。进入2016年，这股热潮仍在持续，德国总统高克、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等贵宾都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表示要永远记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综上所述可见，当人类迈入21世纪之际，历史上那些中犹交往的友好篇章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彩。许许多多普通人长期以来辛勤工作，收集、整理、研究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记忆中的活资料，为后世写下那难忘的历史篇章，使子孙后代能记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使

世界更美好而奋斗。他们的工作又通过宣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歪扶正的感人业绩，以及人类文化中共同的真善美价值观，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之间，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这两大古老文化之间传统友谊的不断发展。

附录：关于来华犹太人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排列不分先后）

I. 中文

1. 潘光、王健著：《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2. 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潘光旦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江文汉著：《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5. 洪均著：《元史译文证补》，1897年版（光绪二十三年）。
6. 王一沙著：《中国犹太春秋》，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7. [法] 荣振华和 [澳] 莱斯利著，耿升译：《中国的犹太人》（中文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张绥著：《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9.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初版，2005年、2015年再版（中英法德文）。

10.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初版,2005年、2015年再版（中英文）。
11. 曲伟、李述笑主编:《犹太人在哈尔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6年再版（中英文）。
12. 宋安娜主编:《犹太人在天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中英文）。
13. 宋安娜著:《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 潘光、王健著:《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5. 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
16. 张仲礼、陈曾年著:《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 聂宝璋著:《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 黄苇著:《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0. 汪敬虞著:《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2. 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3. 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24. 王渭泉、吴征原、张英恩编著:《外商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25. 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哈同先生荣哀录》,上海,1932年版。
27. 阿文著:《哈同全传》,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
28. 徐铸成著:《哈同外传》,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
29. 沈寂著:《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30. 白慕申著:《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中文版）,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31. 赫尔穆特·斯特恩著:《弦裂》（中文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 格·卡明斯基著:《老上海浮世绘》（中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33. 瑞娜·克拉斯诺著:《上海往事（1923—1949）,犹太少女的中国岁月》（中英文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版。
34. 饶立华著:《〈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流亡者的精神家园》,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35. 泽夫·苏赋特著:《中以建交亲历记》（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36. 高斯坦主编:《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7. 冯彩章和李葆定著:《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38. 黄瑶和张惠新著:《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9. 叶丽茶主编:《来自异国的朋友——在中国有过特殊经历的外国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40. 格·卡明斯基主编:《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文版),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42. 李敦白等著:《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3. 金诗伯著:《我在中国的六十年》(中文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44. 叶华著:《世纪之恋——我与萧三》(中文版),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45. 沙博理著:《我的中国》(中文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6. 沙博理编著:《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中文版),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47. S. 罗森塔尔编:《尼尔斯·玻尔》(中文版),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48.《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
49.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50. 王耿雄著:《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1. 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52. 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六十年》,上海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53. 尚明轩和唐宝林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54. 王渭泉、吴征原、张英恩编著:《外商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55.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合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56. 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7. 汪之成著:《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58. 王铁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9. 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0. 魏子初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61. 刘爽著:《哈尔滨犹太侨民史》，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
62. 特迪·考夫曼著:《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中文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3. 曲伟、李述笑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4. 曲伟、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5. 张铁江著:《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6. 李述笑编著:《哈尔滨历史编年，1763—1949》，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
67. 李述笑等编著:《哈尔滨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68. 韩天艳、程洪泽、肖洪著:《哈尔滨犹太家族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9. 刘欣欣、刘学清著:《哈尔滨西洋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70. 《上海外事志》编辑室编:《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71. 许步曾著:《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72. 汪之成著:《俄侨音乐家在上海 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73. 汤亚汀著:《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74. 赵立中、许良英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6. 苗苗编著:《黑龙江百年故乡音乐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7. 吴亮著:《老上海》，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78. 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79.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正、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
80. 罗小未主编:《上海建筑指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81. 杨嘉佑著:《上海老房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2. [丹麦] 曹伯义和韩悦仁著:《从光辉灿烂的昨天到生机盎然的今天——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1846—200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中英文）。
83.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4. 李德滨、石方著:《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5. 杨荣秋、谢中天著:《天街异彩·哈尔滨中央大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86. 万斯白著:《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中文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7. 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8.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9. 潘光、金应忠主编:《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90. 潘光、余建华、王健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年版。
91.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再版。
92. 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93.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94. 潘光主编:《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

95. 潘光主编:《离散与避难：犹太民族难以忘怀的历史》，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
96. 潘光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
97. 王健著:《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98. 王健著:《上海的犹太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99. 王健著:《救亡与拯救——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00. 王健主编:《犹太难民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1. 张艳华、王健著:《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02. 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著:《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103. 宋妍主编:《虹口记忆：1938—1945 犹太难民的生活》，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104. 张艳华编著:《提篮桥——犹太人的诺亚方舟》,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5. 史丁著:《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6. 程维荣著:《近代东北铁路附属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07. 郭少棠、沈思编:《光耀百年》,中华电力有限公司，香港,2001年版。

108. 威廉·比瑟著:《香港经济与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
109. 蒋作斌主编:《国际义人何凤山》,岳麓书社2007年版。
110. 山姆·莫辛斯基著:《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111. 张至善编译:《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2. 王韬著:《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
113. 薛福成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
114. 梁启超著:《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5. 陈天华著:《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6. 康有为著:《万木草堂诗集·南兰室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7. 崔国因著:《出使美日秘日记》,黄山书社1988年版。
118. 单士厘著:《归潜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
119. 陈垣和叶瀚著:《开封一赐乐叶教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120. 白石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
121. 布拉恩著:《犹太民族史》(中文版),倪秀章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II. 英文

1. lpher, Joseph ed., *Encyclopedia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1973. 约瑟夫·阿尔夫编:《犹太历史百科全书》,

纽约，1973年版。

2. Gilbert, Martin, *Atla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1993. 马丁·吉尔伯特编：《犹太历史地图集》，纽约，1993年版。
3. Leventhal, Dennis, *Sino-Judaica: Whence and Whither*, Hong Kong, 1986. 罗狮谷著：《中犹研究：从何处来，向何处去》，香港，1986年版。
4. Goldstein, Jonathan ed., *The Jews of China, Vol. On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rmonk, New York, 1999. 高斯坦编：《中国的犹太人，卷1 历史和比较研究》，纽约州阿蒙克，1999年版。
5. Hochstadt, Steve,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 from the Third Reich*,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斯蒂芬·霍奇斯塔特著：《避难上海：逃离第三帝国的故事》，麦克米兰出版社，2012年版。
6. Goldstein, Jonathan ed., *The Jews of China, Vol. Two, A Sourcebook and Research Guide*, Armonk, New York, 2000. 高斯坦编：《中国的犹太人，卷2 资料文献和研究指南》，纽约州阿蒙克，2000年版。
7. Pollak, Michael ed., *The Sino—Judaic Bibliographies of Rudolf Loewenthal*, Cincinnati and Palo Alto, 1988. 迈可·波拉克编：《罗文达中犹研究文献目录》，美国辛辛那提希伯来联盟学院和加州帕罗奥托中犹研究会合作出版，1988年版。
8. Shapiro, Sidney ed., *Jews in Old China: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 New York, 1984. 沙博理编：《旧中国的犹太人：中国学者的研究》，纽约，1984年版。
9. Pollak, Michael,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1980. 迈可·波拉克著:《中国官员、犹太人和传教士：犹太人在中华帝国的经历》,费城,1980年版。

10. Beth Hatefusoth,the Nahum Goldmann Museum of Jewish Diaspora ed., *The Jews of Kaifeng: Chinese Jews on the Banks of the Yellow River*, Tel Aviv, 1984. 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编:《开封犹太人：黄河岸边的中国犹太人》,特拉维夫,1984年版。
11. Needle, M. Patricia ed., *East Gate of Kaifeng: A Jewish World inside China*, Minneapolis, 1992. 帕特里夏·尼德尔编:《汴梁祖风：中国的一个犹太世界》，明尼阿波利斯,1992年版。
12. Chan Sui-Jeung, *The Jews in Kaifeng: Reflections on Sino-Judaic History*, Hong Kong, 1986. 陈瑞璋著:《开封犹太人：关于中犹历史的思考》,香港,1986年版。
13. Dicker, Herman, *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1962. 赫尔曼·迪克著:《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犹太人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世纪》，纽约,1962年版。
14. Liberman,Yaacov (Yana), *My China: Jewish Life in the Orient 1900—1950*, Jerusalem, New York, 1998. 雅科夫·利伯曼著:《我的中国：犹太人生活在东方1900—1950》，耶路撒冷，纽约,1998年版。
15. Beth Hatefutsoth, The Nahum Goldmann Museum of the Jewish Diaspora ed., *Passage Through China,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Harbin, Tientsin and Shanghai*, Tel Aviv, 1986. 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编:《移居在中

国：哈尔滨、天津、上海的犹太社团》，特拉维夫，1986年版。

16. Malek,Roman ed., *From Kaifeng to Shanghai,Jews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2000. 罗曼·马雷克编：《从开封到上海：犹太人在中国》，圣奥古斯丁，2000年版。
17. Widener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ed., *China and the Jews, exhibition catalog*, Cambridge, Mass., 1992. 哈佛大学维德纳图书馆编：《中国和犹太人，展览目录》，剑桥，马萨诸塞州，1992年版。
18. Zhou Xun,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Jews and Judaism: A History of the Youtai*, Cuzon Press, 2001. 周迅著：《中国人看犹太人和犹太教：中国人犹太观的发展史》，库森，2001年版。
19. Kupfer, Peter ed., *Youtai — Presence and Perception of Jews and Judaism in China*, Frankfurt and Main, 2008. 彼得·科普佛主编：《犹太人和犹太教在中国：存在和感知》，德国法兰克福和美因兹，2008年版。
20. Meyer, Maisie, *From the Rivers of Babylon to the Whangpoo: A Century of Sephardi Jewish Life in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梅西·麦耶著：《从巴比伦河到黄浦江：塞法迪犹太人在上海的一个世纪》，美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 Chan Heng Chee, *A Sensation of Independence: David Marshall · Political Biography*, Singapore, 2001. 陈庆珠著：《独立之激情：戴维·马歇尔政治传记》，新加坡，2001年版。
22. Bieder, Joan, *The Jew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2008.

J. 比德著:《新加坡的犹太人》,新加坡,2008年版。

23. Nissim, Matook, *An Oral History*, Making History Associates, U.S.A., 2000. 马托克·尼西姆著:《口述史》,美国,2000年版。
24. Kranzler, David, *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 New York, 1976. 戴维·克兰茨勒著:《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纽约,1976年版。
25. Ristaino, Marcia, *Port of Last Resort: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 Stanford, 2001. 玛莎·瑞斯塔诺著:《最后求助的港口:上海的离散者社团》,斯坦福,2001年版。
26. Tokayer, Marvin and Swartz, Mary, *The Fugu Pl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London, 2004. 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著:《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纽约,伦敦,2004年版。
27. Clegg, Authur, *Aid China, 1937—1949: 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9. 亚瑟·克勒格著:《援助中国,1937—1949:一场被遗忘的运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9年版。
28. Krasno, Rena, *Strangers Always: A Jewish Family in Wartime Shanghai*. Berkeley, 1992. 瑞娜·克拉斯诺著:《总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伯克利,加州,1992年版。
29. Ben-Eliezer, Judith, *Shanghai Lost, Jerusalem Regained*, Israel, 1985. 朱迪丝·本—埃利泽著:《上海失去,耶路撒

冷重获》，以色列，1985年版。

30. Warhaftig, Zorach. *Refugee and Survivor: Rescue Efforts during the Holocaust*, Jerusalem, 1988. 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著：《难民和幸存者，大屠杀期间的拯救努力》，耶路撒冷，1988年版。
31. Reinisch, George, *Shanghai Haven*, Cheltenham, Australia, 1984. 乔治·莱尼西著：《上海避难地》，切尔坦海姆，澳大利亚，1984年版。
32. Ginsbourg, Anna,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Shanghai, 1940. 安娜·金斯伯格著：《上海犹太难民》，上海，1940年版。
33. Skall, Lily, *My Story*, Makou Jewish Community Library, 2000. 丽莉·斯卡尔著：《我的故事》，澳大利亚，2000年版。
34. Finnane, Antonia, *Far From Where? Jewish Journeys From Shanghai to Australia*, Victoria, Australia, 1999. 安东尼娅·芬娜尼著：《来自何方：犹太人从上海到澳大利亚的旅程》，维多利亚，澳大利亚，1999年版。
35. Grebenschikoff, I. Betty, *Once My Name Was Sara: A Memoir*, Ventnor, 1997. 贝蒂·格雷本希科夫著：《我曾经叫萨拉，回忆录》，文特诺，1997年版。
36. Kaplan, William, Tanaka, Shelly and Taylor, Stephen, *One More Border: The True Story of One Family's Escape from War-torn Europe*, Vancouver, 1998. 威廉·卡普兰、谢利·坦那卡和斯蒂芬·泰勒著：《更宽的边界：一个逃离战时欧洲的家庭的真实故事》，温哥华，1998年版。
37. Tobias, Sigmund,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Urbana, Ill., 1999. 西格蒙德·托帕斯

著:《陌生的避难所：战时上海一个犹太孩子的生活》，尤巴那，伊利诺斯州，1999年版。

38. Ross, James, *Escape to Shanghai, A Jewish Community in China*, New York, 1994. 詹姆斯·罗斯著:《逃往上海，中国的一个犹太社区》，纽约，1994年版。

39. Rubin, Evelyn, *Ghetto Shanghai*, New York, 1993. 伊夫琳·鲁宾著:《上海隔离区》，纽约，1993年版。

40. Heppner, Ernest, *Shanghai Refuge: 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 Lincoln, Nebraska, 1993. 欧内斯特·哈帕纳著:《上海避难所，回忆二战时的犹太隔离区》，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1993年版。

41. Leo Baeck Institute and Austrian Cultural Institute ed., *Destination Shanghai: Refuge for Stateless Jews 1938—1948, exhibition catalog*, New York, 1996. 利奥·贝克研究所和奥地利文化研究所编:《目的地上海：无国籍犹太人的避难所 1938—1948，展览说明》，纽约，1996年版。

42. Kipen, Israel, *A Life to Live*. Australia, 1989. 伊斯雷尔·基彭著:《颠簸人生》，澳大利亚，1989年版。

43. Lewin, Ossie ed., *Almanac-Shanghai 1946—1947*, Shanghai, 1947. 奥西·列文编:《上海年鉴1946—1947》，上海，1947年版。

44. *Council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Shanghai, Report*, Shanghai. 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年度报告（简称“犹联”年报），上海。

45. Miller, Frieda ed., *Shanghai: A Refuge during the Holocaust, Teacher's Guide*, Vancouver Holocaust Education Center, 1999. 弗里达·米勒编:《上海：大屠杀期间的避难所，教

师指南》，温哥华大屠杀教育中心，1999年版。

46. Hong Kong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ed., *A Vision Fulfilled*, Hong Kong,1995. 香港犹太社团中心编：《美景成真》，香港，1995年版。

47. Moustafine, Mara, *Secrets and Spies: The Harbin Files*, Australia, 2002. 玛拉·穆斯塔芬著：《秘密和间谍：哈尔滨档案》，澳大利亚，2002年版。

48. Leventhal, Dennis and Mary ed.,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988. 罗狮谷夫妇编：《香港犹太社区》，香港，1988年版。

49. Leventhal, Dennis and Mary ed., *Faces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China*, 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 1990. 罗狮谷夫妇编：《犹太人在华经历面面观》《香港犹太社团记事》出版，1990年版。

50. Vancouver Holocaust Education Center ed., *Diplomat Rescuers and the Story of Feng Shan Ho*, Vancouver, 1999. 温哥华大屠杀教育中心编：《外交救命恩人：何凤山的故事》，温哥华，1999年版。

51. Asia-Pacific Jewish Association ed., *Asia-Pacific Survival Guide*, Melbourne, 1988. 亚太地区犹太协会编：《亚太地区犹太遗址指南》，墨尔本，1988年版。

52. *Betar in China 1929—1949*, Commemorative Anthology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Betar (1923—1973), Israel, n.d.. 《贝塔在中国1929—1949》，纪念贝塔成立50周年文集，以色列出版。

53. *Commemorative Anthology for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Beth Rivkah Schools Lubavitch*, New York, 1981. 《贝

思・瑞夫卡赫鲁巴维契学校40周年纪念文集》，纽约，1981年版。

54.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Jewish Journalists ed., *Our Press*, Tel-Aviv, Israel. 世界犹太记者协会编:《我们的报刊》，以色列特拉维夫。
55. Roth, Cecil, *The Sassoon Dynasty*, London, 1941. 塞西尔・罗思著:《沙逊王朝》，伦敦，1941年版。
56. Friedman, I.S.,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I.S. 费里德曼著:《英中关系，1931—1939》，纽约，1940年版。
57. Levy, Daniel, *Two-Gun Cohen: A Biography*. New York, 1997. 丹尼尔・列维著:《双枪科亨》，纽约，1997年版。
58. Clifford, N.,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nover, London, 1991. N. 克利福德著:《被宠坏的帝国孩子：上海的西方人和20年代的中国革命》，汉诺威，伦敦，1991年版。
59.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Shanghai, 1935.《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全貌》，上海，1935年版。
60. Kounin,I.I., compiler, *Eighty 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Shanghai, 1938. I.I. 库宁编:《上海万国商团85年》，上海，1938年版。
61. Lamberton, M., *St.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New York, 1955.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纽约，1955年版。
62. Nance, W.B.,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1956. 文乃史:《东吴大学》，纽约，1956年版。

63. *Report: Tientsin Jewish School, Fifteen Years of Progress 1925—1940*, New York, 1941.《天津犹太学校报告：15年发展历程 1925—1940》，纽约，存纽约依浮研究所，1941年版。

64. Matzat, W., *Short Chronicle of the German School in Tsingtao 1924—1946*, Bonn,2001. 马查特：《青岛德国学校简史 1924—1946》，波恩，2001年版，作者自行印制。

65. Lerner, Joe, *Farewell To Russia: The Memories of An Alleged American Spy*, London, 1999. 乔・伦纳著：《告别俄罗斯：一个"美国间谍"的回忆录》，伦敦，1999年版。

66. Curtis, Michael & Gitelson, Susan Aurelia ed., *Israel in the Third World*, New Jersey, 1976. M. 柯蒂斯和S. A. 吉特尔森编：《以色列在第三世界》，新泽西，1976年版。

67. LeFevour. E,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A Selective of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s Operartions, 1842—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勒费窝著：《清末西人在华企业》，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68. Crisswell, C, *The Taipans, Hong Kong's Merchant Princes*, Oxford, 1981. 克里斯韦尔著：《大班们：香港的商业王侯》，牛津，1981年版。

69. Moshinsky, Sam, *Goodbye Shanghai, A Memoir*, Mind Film & Publishing, Australia, 2009. 莫辛斯基著：《再见吧，上海：回忆录》，澳大利亚，2009年版。

Ⅲ. 德文、法文、希伯来文、日文

1. Juedisches Museum im Stadtmuseum Berlin ed., *Leben im Wartesaal: Exil in Shanghai, 1938—1947*, Berlin, 1997. 柏

林市犹太博物馆编:《流亡在上海1938—1947》,柏林,1997年版。

2. Armbruester, Georg, Koehlstruck, Michael and Muehlberger, Sonja ed., *Exil Shanghai 1938—1947, Juedisches Leben in der Emigration*, Teetz, 2000. 格奥尔格·阿姆布鲁斯特,米歇尔·科尔施特鲁克和索尼娅·米尔贝格尔编:《逃亡在上海1938—1947,流亡中的犹太生活》,蒂兹,2000年版。
3. *Flacht nach Shanghai, Vom Ueberleben Oesterreichischer Jueden in einer asiatischen Metropole, 1938—1949*, Salzburg, 1995. 《逃往上海:奥地利犹太难民避难东亚大都市,1938—1949,学术讨论会和展览会简介》,萨尔茨堡,1995年版。
4. Kaminski, Gerd and Unterrieder, Else, *Von Oesterreichern und Chinesen*, Wien, 1980. 格尔德·卡明斯基和爱尔丝·约特瑞德著:《奥中友谊史》,维也纳,1980年版。
5. Kneucher, Alfred, *Zuflucht in Shanghai*, Wien, Koln, Graz, 1984. 阿尔佛雷德·克瑙科:《上海避难地》,奥地利,1984年版。
6. Kaminski, Gerd, *General Luo Genannt Langnase, Das abenteuerliche Leben des Dr. med. Jakob Rosenfeld*, Wien, 1993. 格尔德·卡明斯基著:《罗生特将军传》,维也纳,1993年版。
7. Kaminski, Gerd, *China gemalt — Chinesische Zeitgeschichte in Bildern Friedrich Schiffs*, Wien, 1983. 格尔德·卡明斯基著:《绘画中的中国——弗利德里希·希夫画笔下的中国现代史》,维也纳,1983年版。
8. Kreissler, Francoise,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Paris, 1989. 弗兰西丝·克瑞斯勒著:《德国文化

在中国的影响》，巴黎，1989年版。

9. Kahn, Michele, *Shanghai-la-juive*, Paris, 1997. 米雪尔·卡娜著:《上海犹太城》，巴黎，1997年版。

10. Fradkin, Abraham, *Periods in the Circle* (Hebrew), Israel, 1990. 亚伯拉罕·弗拉特金著:《流散生涯》(希伯来文)，以色列，1990年版。

11. Marinsky, Arieh, *In Light and in Darkness* (Hebrew), Isreal, 1993. 阿里耶·马林斯基著:《光明和黑暗》(希伯来文)，以色列，1993年版。

12. Manchuria Railway Authorities, *The Jews in Manchuria, Past and Present Economic Status* (Japanese), Dalian, 1940. 满铁调查部:《在满犹太人：经济的过去和现在》(日文)，大连，1940年版。

13. Bando, Hiroshi, *Japan's Policy Towards Jews, 1931—1945* (Japanese), Tokyo, 2002. 阪东宏:《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　1931—1945》(日文)，东京，2002年版。

14. Maruyama, Naoki,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Japanese), Tokyo, 2005. 丸山直起:《太平洋战争和上海的犹太难民》(日文)，东京，2005年版。

15. Maul, Heinz Eberhard, *Warum Japan Keine Juden verfolgte, Die Judenpolitik des Kaiserreiches Japan wahrend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5*, Iudicium Verlag GmbH, 2007. 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日本为何没有迫害犹太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日本帝国的对犹政策1933—1945》，德国，2007年版。

16. Schomanmn, Stefan, *Letzte Zuflucht Shanghai*, Germany,

2008. 斯特凡·舒曼:《最后的避难所：上海》，德国，2008年版。

IV. 报刊和其他印制资料

1.《申报》。
2.《大公报》。
3.《冀中导报》。
4.《东方杂志》。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档案》,南京出版。
6.《国际人才交流》,北京出版。
7.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
8. *Israel's Messenger*《以色列信使报》。
9. *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上海犹太早报》。
10. *Die Gelbe Post*《黄报》。
11. *Our Life*《我们的生活》。
12. *The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
13.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14. *Jewish Times Asia*《亚洲犹太时报》。
15. The Women's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ed., *Hadassah*, New York. 美国妇女锡安主义组织编:《哈达萨》，纽约。
16. Igud Yotzei Sin in Israel (Association of Former Residents of China) ed., *Bulletin* , Tel-Aviv. 以色列前中国居民协会编:《简报》,特拉维夫。
17. The Israel-China Friendship Society ed., *Israel-China Voice of Friendship*, Tel-Aviv. 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编:《以中友好之声》,特拉维夫。

18. The Shanghai Reunion ed., *The Hongkew Chronicle*, Van Nuys, California. 上海联谊会编:《虹口纪事》,美国加州。
19. Washington Stat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ed. *Bulletin*, Seattle, U.S.A. 华盛顿州犹太历史协会编:《简报》,美国出版。
20. The Sino-Judaic Institute ed., *Points East*, Seattle & Menlo Park, California. 美国中犹研究会编:《向东方》,美国出版。
21. Rickshaw Reunion ed., *Rickshaw Reunion News*, Philadelphia, U.S.A. 美国"黄包车联谊会"编:《黄包车联谊会新闻》,美国费城。
22. Center of Jewish Studies Shanghai (CJSS) ed., *Jewish Studies Bulletin*, Shanghai, China.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编:《犹太研究简报》,中国上海。

V. 档案文献

1. 上海档案馆资料汇集。
2. 天津档案馆资料汇集。
3. 黑龙江省档案馆资料汇集。
4. 开封博物馆资料汇集。
5.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资料汇集。
6. 上海图书馆资料汇集。
7.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资料汇集。
8. 香港犹太社团中心资料汇集。
9. China Collection at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依浮研究所中国资料档案,纽约。
10. Shanghai Collection of United Nations Archives, New York. 联合国档案馆上海资料汇集,纽约。

11. China Collection at the Beth Hatefusoth,the Nahum Goldmann Museum of Jewish Diaspora, Tel Aviv. 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中国资料档案，特拉维夫。
12. Shanghai Collection of Yad Vashem Archives, Jerusalem. 耶德·瓦谢大屠杀档案馆上海资料汇集，耶路撒冷。
13. Shanghai Collection at Hoover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胡佛研究所上海外侨资料汇集，美国斯坦福大学。
14. Shanghai Collection at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New York. 利奥·贝克研究所上海资料档案，纽约。
15. China Collection of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Jerusalem. 锡安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国资料汇集，耶路撒冷。
16. China Collection of Jabotinsky Institute in Israel, Tel-Aviv. 贾波丁斯基研究所中国资料汇集，特拉维夫。
17. Old China Hands Archiv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老中国通”文献委员会，美国加州北岭州立大学。

后　记

2016年的七八月，上海特别热，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了九月上旬。我和几位副主编几乎没有休息，全力以赴战高温，终于在中秋节前完成了《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四卷：专家视点》的统稿工作。三位副主编张健荣、陈心仪、张忆南辛勤工作，为本书最终完稿付出了大量精力。至此，《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四卷的通稿工作已全部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① 本书汇集的各篇论文凡出现繁体字的，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都把它们转为了简体字；② 本书中的英译中名词往往在不同的论文中有不同的译法，还有一些在旧时的译法与现在的译法并不一样，为了保持论文的原汁原味，我们没有加以改动或强求统一；③ 本书中不同的著述里可能提到同样的事件和人物等，出现重复的现象，也是为了保持论述的原汁原味，我们没有将重复内容加以删除；④ 本书中论文的注释体例不尽相同，如有的注释引用的外文书加上了中文译名，有的则没有，有的注释引用的著作刊物加上了页数，有的则没有。由于每篇论文的注释均具有其独立体系，因此我们对所有注释一般不加改动或删除，对不同论文中出现的相同资料来源一般也不用“同上”的简化提法。

历史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是为学术精品打基础的，但也是最为艰苦的工作。要将浩如烟海的文件、档案、报刊、口述记录等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没有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是难以取得成果的。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副主编外，我还要感谢为本书资料收集和整理提供了各种支持的王健、虞卫东、汪舒明、周国建、沈国华、黄崇峻、罗爱玲、戴轶尘、陈俭、史蒂夫·霍赫斯塔德、索尼娅密欧伯格、廖光军、周晓霞、刘夏妮、郑文韬、袁帆、赵倩倩、赵静、张健、郭晴霞等其他课题组成员、合作伙伴及各方朋友。

我特别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谈毅董事长、刘佩英社长、钱方针主任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戎礼平、冯媛，没有他/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愿我们这本资料集能为促进对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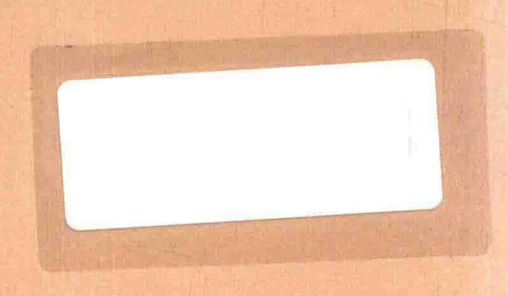
主编：潘光

2016年9月15日

中秋节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4卷

专家视点







扫描二维码
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



ISBN 978-7-313-16559-6

9 787313 165596 >

定价：9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4卷　专家视点
作者=潘光主编
页数=278
SS号=14282706
出版日期=2017.08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号=978-7-313-16559-6
中图法分类号=K18
原书定价=98.00
主题词=犹太人-难民-史料-中国-现代
参考文献格式=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4卷　专家视点[M].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08.